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2014年9月号

IMF 70周年,《金融与发展》50周年

五位诺贝尔奖得主在担心什么?

25位值得关注的经济学家

# 金融与发展

## 回顾过去 展望未来 世界经济的未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金融与发展》是IMF的季刊，  
用英文、阿拉伯文、中文、法文、  
俄文和西班牙文出版。

英文版刊号 ISSN0015-1947

Jeremy Hayden

主编

Marina Primorac

责任编辑

Khaled Abdel-Kader Hyun-Sung Khang

Gita Bhatt Natalie Ramirez-Djumena

Jacqueline Deslauriers James L. Rowe, Jr

Glenn Gottselig Simmon Willson

高级编辑

Maureen Burke

助理编辑

Lijun Li

印刷/网络产品专员

Sara Haddad

社交媒体经理

Jeamine Yoo

编辑助理

Luisa Menjivar

创意主管

Catherine Cho Michelle Martin

美术设计

编辑顾问

Bernardin Akitoby Laura Kodres

Bas Bakker Paola Mauro

Helge Berger Gian Maria Miles-Ferretti

Tim Callen Paul Mills

Paul Cashin Inci Otker-Robe

Adrienne Cheasty Laura Papi

Stijn Claessens Uma Pamakrishnan

Luis Cubbedu Abdelhak Senhadji

Alfredo Cuevas Janet Stotsky

Domenico Fanizza Alison Stuart

James Gordon Natalia Tamirisa

Thomas Helbling

欲知广告事宜，请与IMF出版部联系。

地址：700 Nineteenth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431, USA.

电话：(202)623-7430

传真：(202)623-7201

电子邮件：publications@imf.org

©版权所有，IMF 2014年。翻印本刊文章

应向主编提出申请。地址：

Finance &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20431, USA

电话：(202)623-8300

传真：(202)623-6149

网址：http://www.imf.org/fandd

本刊对非经济目的的翻印一般会迅速

免费予准。

本刊的文章及其他材料仅为作者本人观点，

并不反映IMF的政策。

中文版由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翻译出版。

地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28号新知大厦

电话：88190916

传真：88190916

邮政编码：100142

网址：http://www.cfeph.cn

中文版刊号：ISSN 0256-2561



**金融与发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季刊

2014年9月号·第51卷·第3期

## 特辑

### 世界经济的未来

#### 6 变化的世界

对过去50年的一些思索

M.阿汉·科斯、艾斯基·O. 乌兹图克

#### 12 水晶球的预言

对趋势和不确定性的研究有助于为未来的经济挑战做好准备

卡尔帕纳·科克哈尔、孙艳、埃里迪基·特松塔斯、尼古拉斯·维斯特利

#### 14 危机迫在眉睫

五位诺贝尔奖得主讲述他们眼中未来全球经济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乔治·A.阿克洛夫、保罗·克鲁格曼、罗伯特·索罗、迈克尔·斯宾塞、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 20 下一代

25位45岁以下的经济学家正影响我们对全球经济的看法

卡门·罗林斯

#### 22 构建全球化

如构建得法，全球化能够带来空前的和平与繁荣；如构建不当，将会招致危机与灾难

马丁·沃尔夫

#### 26 直言不讳：关注、灵活、服务

IMF成立于70年前，通过不断调整自身来适应可直接影响全球经济的最新挑战以此始终忠实其使命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

#### 28 危机潜藏之地

最近的金融危机教会我们去关注那些经济可能会严重失调的黑暗角落

奥利维尔·布兰查德

#### 32 新兴力量

各种新能源的供应正在重塑当前的经济局势，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赢家和输家

杰弗里·鲍尔

#### 35 衡量标准

不平等或许是一个热点问题，不过描述它的确是一个难题

乔纳·D. 奥斯特拉、安德鲁·G. 伯格

## 回顾

#### 39 对抗危机

全球合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故事：乔·普罗科皮奥，绘画：尼克·加利费安纳基斯

#### 46 《金融与发展》的五十年

时代在改变，《金融与发展》的焦点在过去半个世纪中也在改变，至少从杂志中出现的高频词就可以看出



6



22



32



35

- 48 图表释义：用声音赚钱  
现场音乐会作为一个重要的出口创汇产业  
西蒙·威尔森
- 50 在舞台中央  
在过去70年里，国际货币体系已经历显著的变革，而IMF亦依此进行了相应调整  
阿蒂斯·雷克斯·戈什

## 其他内容

### 2 经济学人物

#### 开创者

珍妮特·斯托斯基采访肯尼斯·J. 阿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论学家，在经济学的诸多领域做出了富于开创性的研究工作



### 53 回归基础

#### 什么是凯恩斯经济学？

这个学派的核心思想是政府干预能够稳定经济  
沙娃·贾汗、艾哈迈德·萨比尔·马哈茂德、  
克里斯·帕帕耶奥尔尤

### 55 书评

《布雷顿森林会议：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战役——闭门密战》，艾德·康威

《金钱与严厉的爱：IMF纪行》，里亚克特·艾哈迈德

《创建学习型社会：经济增长、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新途径》，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布鲁斯·C. 格林沃尔德

插图：第 28–30 页，Margaret Scott；第 39–45 页，Nick Galifianakis。  
摄影：封面，Paul Cooklin/Getty Images；第 2 页和第 4 页，Noah Berger/IMF；第 6 页，FreezeFrameStudio/iStock；第 12 页，iStock；第 14 页，Michael Spilotro/IMF；第 15 页，Paul Vallejos/El Comercio de Peru/Newscom；第 16 页，Basso Cannarsa/LUZPhoto/Redux；第 17 页，Andrea Merola/epa/Corbis；第 18 页，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第 20 页，Barcelona Graduate School of Economics, Baltel/SIPA/Newscom, Ed Quinn, Dan Dry；第 21 页，Princeton University, Steve Castillo, TT News Agency/Reuters/Newscom, London Business School, Genevieve Shiffar, University of Michigan；第 22 页，Bartosz Hadyniak/Getty Images；第 26 页，Stephen Jaffe/IMF；第 32 页，Larry W. Smith/EPA/Newscom；第 35 页和第 38 页，Oktay Ortakcioglu/Getty Images；第 46–47 页，Wordle.net；第 48–49 页，Keystone Press/ZumaPress/Newscom；第 48 页，Getty Images, Daily Mirror Mirrorpix/Newscom；第 49 页，Robert Whitaker/Getty Images, Robert Whitaker/Getty Images, iStock；第 50 页，IMF file photos；第 51 页，Padraic Hughes/IMF, Stephen Jaffe/IMF；第 55–57 页，Michael Spilotro/IMF。

本刊在线阅读网址：[www.imf.org/fandd](http://www.imf.org/fandd)

浏览《金融与发展》的Facebook：  
[www.facebook.com/FinanceandDevelopment](http://www.facebook.com/FinanceandDevelopment)。

## 风将吹向何处

你可以将本期杂志称为鲍勃·迪伦的一期。一本经济类杂志从这位传奇歌手/曲作者那里汲取灵感似乎有些奇怪，但当我们在准备本期有关全球经济的过去与未来的内容时，他最为著名的那首《时代正在发生变化》不停在我们的走廊里回荡。

我们并不是在歌唱过去的时光。回首 IMF 和世界银行成立 70 周年以及《金融与发展》创刊 50 周年，这首歌的歌词似乎特别契合。在过去 70 年间，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

因此，考虑到这两大周年纪念以及空中飘扬着的迪伦的这首歌曲，我们将本期焦点定在全球经济的变革上，回顾过去并展望未来。我们想知道，再过 70 年全球经济将是什么样子的？

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请教了几位在经济学领域最敏锐的思想者。我们请五位诺贝尔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保罗·克鲁格曼、罗伯特·索罗、迈克尔·斯宾塞以及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分享了各自心中影响未来经济的最严重的问题。他们的答案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

此外，IMF 总裁克里斯汀·拉加德在“直言不讳”栏目指出 IMF 在未来几十年的发展方向；IMF 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从近期最为重大的经济事件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中汲取教训，并强调经济学家需要改变其看待世界的方式。阿汉·科斯和艾斯基·乌兹图克用歌手迪伦的歌词对过去 70 年经济变化进行了概括和分析。

有关全球经济的过去与未来的内容还包括由《金融时报》的马丁·沃夫撰写的关于全球化的风险与优势的文章；卡尔帕纳·科克哈尔、孙艳、埃里迪基·特松塔斯以及尼古拉斯·维斯特利对经济趋势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为应对未来挑战做好准备；雷克斯·戈什对战后货币体系进行了简单介绍。另外，该主题还包括杰弗里·鲍尔有关全球经济中能源的未来，乔纳·奥斯特拉和安德鲁·伯格有关近来讨论最为激烈的经济问题——衡量不平等的文章。

为了与“改变”这一主题保持一致，我们还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漫画家尼克·加利费安纳基斯和乔·普罗科皮奥以漫画形式讲述了 IMF 的起源，这是《金融与发展》从未有过的。为了把音乐这一主题向前更进一步，本期“图表释义”栏目讲述了甲壳虫乐队及其出口创汇者的身份。

最后，我们采访了经济学界的巨人、诺贝尔奖得主、斯坦福教授肯·阿罗。他早期对数学充满热情，在二战期间从事气象学方面的工作，随后在经济学方面有不少贡献。要改编迪伦先生的歌曲，肯·阿罗当然知道风将吹向何处。

杰弗里·海登  
(Jeffrey Hayden)  
主编

# 开创者



珍妮特·斯托斯基采访肯尼斯·J.阿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论学家，在经济学诸多领域做出了富于开创性的研究工作

肯尼斯·J.阿罗(Kenneth J. Arrow)对二战后世界经济理论所作出的开创性贡献，为后来整个经济学界理论和应用科学学者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已故经济理论学家弗兰克·哈恩(Frank Hahn)曾援引莎士比亚对凯撒大帝的描述，称他的同事阿罗“如同一位巨人雄踞世界之巅”，几乎任何领域他都曾研究过并进行了根本上的改变。”以其名字命名的各种完全不同的经济理论，如阿罗—德布鲁模型、阿罗不可能性定理、阿罗证券等证实了哈恩的这一说法。

尽管阿罗最喜爱的是数学和数理统计学，但他最终由于经济原因成为了一名经济学家。二战爆发前夕，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数理统计学研究生时已身无分文，是经济系为他提供了补助金。

## “出价最高者”

当时，经济学家哈罗德·霍特林(Harold Hotelling)负责教授多门统计学课程，并“讲授数理经济学课程”，阿罗说，他是“出于好奇”而选这门课程的。不过，正是这门课程让阿罗喜欢上了经济学，因此当他身无分文时，便向霍特林求助。霍特林告诉阿罗，他对数学系的补助金发放情况无法发挥影响力，但若阿罗转到经济系，他也许可以帮上忙。“于是，我就转到了经济系。大家对此都很惊讶。我就说，‘你们都是经济学家——为什么我不能转向出价最高者？’”在斯坦福大学办公室接受的最近一次采访中，阿罗如是回忆道。阿罗职业生涯中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斯

坦福大学度过的。

转到经济系后，阿罗开启了新的职业生涯。1972年，在他51岁时，阿罗与另外一名经济学家共同荣获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当时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贝尔评奖委员会表彰了阿罗和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在两个领域的工作，即“一般均衡理论”和“福利理论”。一般均衡理论旨在解释某个经济体中价格的确立方式，而福利理论旨在分析某个经济体中商品和服务的最佳配置方式。此外，诺贝尔评奖委员会还指出，两位经济学家在其他领域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就阿罗而言，这种评价非常中肯。他研究了当交易中的一方比另一方掌握更多信息时可能发生的情况，揭示了经济活动是如何导致技术变革的，并在均衡分析中引入了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概念。他还在种族歧视和医疗保健的经济学分析中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外，在他首次开展的主要经济学分析，即其博士论文中，阿罗从根本上创立了“社会选择理论”这一全新领域，分析了个人偏好如何汇集为社会选择决策(如投票选举)。

几乎是尽一人之力，阿罗引入了数学严格性这一概念，同时在让经济学理论以数学为导向方面(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阿罗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阿罗于1921年出生在美国纽约市，其父母是来自罗马尼亚的移民。与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他在“大萧条”时期长大，期间发生的很多变化使其深受影响。他的父亲作为银行家的舒适安逸的生活很快被打破，全家也由于他父亲收



入的起伏不定而经常搬家。“我在许多不同的地方上过学，”阿罗回忆道。不过，全家最终回到纽约定居。在这里，他就读于一所三年制公立高中——汤森哈里斯高中（“每天多上一小时的课”）。也是在这里，他喜欢上了数学。1936年当他从这所高中毕业时，“那时候我们仍然很穷……于是，上大学的唯一选择”就是去读免收学费的纽约市立学院。

与经历过“大萧条”劫难的许多年轻人一样，“我也很担心能不能找到一份工作……当时的的问题是，我在哪里能找到一份有保障的工作？那时也确实有这样的工作，就是当一名高中数学老师。”因此，他在大学主修的是数学和教育学，不过他发现教育学的课程“并不令人激动。”

## 数学教师之梦破灭

不过，如同几年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所发生的情况一样，阿罗的数学生涯并不顺利。由于1933年通过了数学教师资格考试的申请者太多，此后纽约就一直没再举办过此类考试。因此，阿罗说他决定“最好还是不要将一切赌注押在这份工作上。于是，我开始学统计学，并且对它产生了兴趣……刚好哥伦比亚大学是学习统计学的好地方。”当他1940年从纽约市立学院毕业后，他的父亲借钱为他支付了在哥伦比亚大学上学的学费，阿罗说，“我很快就被数学系录取了……但是我发现，数学家是瞧不起统计学的，我在此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正是在这个时候，霍特林极力鼓励阿罗学习经济学。在获得数学硕士学位后，阿罗开始努力学习经济学。他学习了所有他有资格学习的课程，并在1941年年底通过了博士学位的答辩。不幸的是，二战开始了，他的学业也由此暂时中断。“很明显，我得去参军。”于是，他没有被动地等待分配，而是决定主动寻找他感兴趣的事做。“我可以找到的最适宜的事就是预报天气了。”对于当时还是美国陆军旗下的美国空军来说，天气预报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活动。

由于阿罗曾在纽约大学学过气象学，因此被分配到一个研究中心，其中一项工作是“验证怎样才是好的天气预报。”不过，他也发现了“一个真正的问题：怎么利用风力预报来指导飞机的飞行，使飞机能更好地利用风力？”将飞机从北美洲更为快速地调往欧洲地区，这一点并不十分重要，更为重要的是如何节省燃油。阿罗说，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可以将飞机的燃油消耗降低20%。他从未劝说军方使用这一技术，但“我发现，自此以后这一技术已经在商业上得到了使用。”此外，他的研究工作也为1949年发表的论文《用于飞行计划的风力最佳利用》提供了基础。这位未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首次发表的论文刊载在《气象学杂志》上。

战争结束后，阿罗重返哥伦比亚大学，并获得了一笔可观的奖学金。事实上，在他还在军队服役时就已获

得这笔奖学金，但由于战争的缘故一直为他保留到战后。他认为“我必须做点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只是没有自己原创的理论。”

## 几乎任何领域他都曾研究过并进行了根本性的改变。

1947年，当阿罗还在考虑博士论文的选题时，他加入了芝加哥大学考尔斯经济学研究委员会，担任教师兼研究员。该委员会由美国商人阿尔弗雷德·考尔斯(Alfred Cowles)创办于1932年，负责研究经济学理论与数学和统计学之间的关系。在那里，阿罗遇到了同在此做研究工作的塞尔玛·施韦策(Selma Schweitzer)。1947年，阿罗迎娶了塞尔玛，而后，塞尔玛又将阿罗引荐给统计学家M.A. 格斯奇科(M. A. Girchik)，后者邀请阿罗在次年夏季到全球著名的政策智库兰德公司工作。“1948年夏季，我的事业真正开始腾飞。”

在兰德，阿罗在与德国哲学家和未来学家奥拉夫·赫尔墨(Olaf Helmer)的交流过程中受到启发，并撰写了有关社会选择理论的博士论文。由于这种理论很新，以至于他的博士生导师艾伯特·哈特(Albert Hart)对阿罗所开展的研究一无所知。“但他对我很有信心……他说，‘哦，我对这个理论不清楚，不过我相信你，’”阿罗说道。

1951年，阿罗获得博士学位。在他的博士论文以及当年出版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一书中，阿罗为社会选择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社会选择论主要通过数学方法探讨了各种问题，如单个选民对候选人和各种问题的不同看法如何才能很好地体现在选举结果中。在如今被称为“阿罗不可能性(或可能性)定理”中，阿罗假定，当强加某些理性的公平性条件时，投票选举系统就不可能准确地体现社会偏好。主流经济学家往往认为个人是理性的。其中一个推论就是，个人的偏好是具有可传递性的，比如，当选民喜欢史密斯胜过琼斯，而喜欢琼斯胜过威廉姆斯，那么他们就会喜欢史密斯胜过威廉姆斯。阿罗不可能性定理认为，当仅有四种理性的条件强加给三种或三种以上的选择上时，个人的理性偏好就不可能汇集成为保持决策传递性的社会偏好。也就是说，没有一种方法可确保个人偏好很好地形成社会偏好(如选举的获胜者)。阿罗的社会选择理论可用于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集体的决策过程，并制定良好的投票选举规则。

## 一帆风顺

完成博士论文对于阿罗的成功至关重要。“完成了有关社会选择的博士论文后，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扫清了前方的道路。”

阿罗将高等数学应用于一般均衡理论中。一般均衡理论最早可追溯至1874年，由经济学家莱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创建，在某种意义上证实了亚当·斯密的正确性。亚当·斯密认为，很多经济参与者寻求推动自身的目标，并未造成混乱，而是由“无形的手”所引导，形成整个经济体范围内商品、服务和就业机会相对有序的提供。

在经济学中，市场均衡是指使所有商品供需平衡的一整套价格。局部均衡分析在其他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将某种商品的需求（或供应）视为其价格的函数。而一般均衡分析则将所有价格视为变量，并认为所有市场的供需平衡。例如，全球天然气市场的需求不仅可能依赖于其价格，还可能依赖于石油和其他化石燃料的价格，以及那些对能源市场不具有直接关系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甚至可能依赖于工资和利率水平。

1954年，阿罗与法国经济学家杰拉德·德布鲁（Gérard Debreu）共同建立了制定价格的一般条件，即在一个经济体中，各个商品的总供应量与总需求量保持平衡（现称之为“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莱昂内尔·麦肯西（Lionel McKenzie）独立工作，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得出了类似的研究结果。阿罗和德布鲁（1983年共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借鉴了约翰·纳什（John Nash）在博弈理论中的理念。当时，博弈理论是数学界的又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旨在分析一个参与方的行动结果取决于其他参与方行动的竞争策略，纳什因此而荣获199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后来的作品中包括与里奥尼德·赫维克兹（Leonid Hurwicz）共同撰写的书籍中，阿罗分析了市场的稳定性以及价格本身如何进行调整来保持供需之间的平衡。

一般均衡理论导致众多理论和实证模型的建立，这些模型将经济体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明确地纳入其中，包括那些将消费和生产要素纳为一体的模型。

此类一般均衡模型被应用于许多经济学领域。在公共财政和国际贸易中，这些模型可以评估各国因税收和关税政策调整将变得更为富裕还是更为贫穷。20世纪70年代初，阿罗在斯坦福大学长期共事的同事约翰·肖文（John Shoven）以及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沃利（John Whalley）共同建立了有关美国经济的首个应用型一般均衡模型，评估税收变化所产生的影响。这些模型应用于经济发展中，可评估出口行业的不断发展对工人工资的影响水平。

一般均衡理论也大大地影响了现代人对宏观经济或整个经济发展的看法。经济学家力求从研究个人市场行为的微观经济学中发现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将一般均衡作为其认为整个经济从

根本上是处于均衡状态，而个人市场的价格和工资水平处于灵活变动状态这一看法的基础。均衡的偏离很快出清（自行分离）。凯恩斯或新凯恩斯学派（见本期《金融与发展》，“什么是凯恩斯经济学？”）也借鉴了一般均衡理论，但并不认可市场通常或很快出清（即达到均衡）的看法。他们认为，价格和工资的变动速度往往比较缓慢，可能让经济长期处于失衡状态，从而为积极主动的财政和货币干预政策提供了理由。“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旨在分析宏观经济发展中内在的变化和不稳定性。阿罗认为，宏观经济模型必须应对市场失衡的趋势，如同这些模型在“大萧条”时期用来应对长期失业状况一样。

## 福利突破

1951年，在刚刚推出社会选择理论后，阿罗开始将高等数学应用于福利经济学领域。福利经济学关注所谓的“帕累托最优”现象，即只有在使其他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才可能使自己的境况变好的现象。“帕累托最优”是衡量某个经济体是否运转正常的一项标准。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描述的是竞争性一般均衡导致资源的帕累托最佳配置的状况；而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描述的则是通过竞争性均衡和资源的部分再配置可以实现某个经济体的所有帕累托最佳成果的状况。阿罗对这些定理进行了一般化处理，在当不需要或未能提供部分商品或服务时也可适用，而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即经济学家所称作的“角解”。

最初，一般均衡理论并不包括不确定性或风险要素。在难以防止市场风险的基础上，阿罗推出了“未定”商品的概念，将商品的物理特征与未来该商品将交付的状况两者联系在一起（比如，旱灾期间生产的小麦与丰收之年生产的小麦存在差异）。然后，阿罗提出了金融证券的概念，金融证券的支出大小取决于当时的状态。这个所谓的“阿罗证券”理论成为现代金融学理论的基石。按照“阿罗证券”理论，市场参与者可以减少其必须交易的商品数量。例如，农民可以达成在未来以某个特定价格出售小麦的合约，以防止小麦价格暴跌的风险。然后，这些期约可以在期货市场上进行交易，在期货市场上，参与方对价格的变化状况存在不同的预期。

经济学分析中的一个关键工具是生产函数，描述的是劳动力和资本等投入可以共同产生多大的最终产出。各种增长理论认为，生产力增长（利用更少的投入形成某项具体的产出）的一个重要驱动力——技术变革并非是经济活动的结果，而是来自于外部的结果，尽管常识表明许多技术改进来自于经济活动。阿罗在1962年发表的一篇有关“边干边学”的





论文建立了这样一种理论，即工人和企业通过自身的经验可以提高其生产力，同时这些部分知识可以为整个经济体带来效益。这种理论有助于解释某些现实情况，如各国之间的生产力长期存在巨大的差异。

“毫无疑问，阿罗的学生们都很喜欢他。他总是把他的聪明才智和真知灼见与我们共享。”

阿罗在1963年发表的有关不确定性和医疗福利经济学的论文阐释了难以设计出一个良好运行的医疗市场的原因，是部分参与者比其他参与者了解的知识更多（如医生与患者在医疗知识方面的差距），同时该市场缺乏价格竞争。此外，阿罗验证了道德风险在医疗市场中的重要性。例如，拥有保险的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更大。一个由著名经济学家组成的委员会，这篇论文是美国经济学会旗舰刊物《美国经济评论》第一个百年中最有影响力的20篇论文之一。

## 拓展至其他领域

在其他重大领域，阿罗与莫迪凯·库尔茨（Mordecai Kurz）共同制定了优化公共投资的方法。同时，阿罗分析了导致工作场所内外长期存在种族歧视现象的部分经济和非经济因素。

阿罗对经济学的各种现实问题以及各种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关注，使得他的研究工作涵盖从气候变化到发展中经济体药品补贴的各个领域。他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首批撰稿人之一，该委员会负责提供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权威评估结果。

阿罗有关气候变化的研究工作绝大部分侧重于个人对未来可能发生何种情况的评估方式。在近期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阿罗及其合作者认为，美国政府低估了碳的成本。奥巴马政府现利用碳成本作为限制发电厂碳排放这一计划的基础数据。

近年来，阿罗担任过一家医学院的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支持向抗疟治疗提供补助，使这种治疗在低收入国家能够让患者负担得起。同时，阿罗也是“经济学者和平与安全”组织的创始理事。该组织致力于为应对世界各种挑战的非武力解决方案提供支持。

除了1968—1979年这11年期间是在哈佛大学外，阿罗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斯坦福大学度过的。他于1949年进入斯坦福大学任教，此后很快成为经济学、统计学和运筹学教授，并帮助斯坦福大学成为经济理论、计量经济学和应用数学的研究中心。

在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期间，他有四名

学生先后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分别是：约翰·海萨尼（John Harsanyi，1994年）、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2001年）、埃里克·马斯金（Eric Maskin）和罗格·梅尔森（Roger Myerson，2007年）。斯宾塞在他的诺贝尔获奖自传中回忆道，阿罗的学生们都对他心存敬畏。“描述肯·阿罗对20世纪下叶经济学的贡献，几乎相当于描述这一时期经济学的发展演变过程。”阿罗此前在斯坦福大学的学生罗斯·斯塔尔（Ross Starr）进一步拓展了一般均衡理论。他回忆了所感受到的来自阿罗对学生深厚的感情。在电话采访中，斯塔尔说，“毫无疑问，阿罗的学生们都很喜欢他。他总是把他的聪明才智和真知灼见与我们共享。”

同时，阿罗大家庭中的其他成员也是非常著名的学者。阿罗的妹妹安妮塔·萨默斯（Anita Summers）现为美国宾州大学退休教授，安妮塔的已故丈夫罗伯特·萨默斯（Robert Summers）也曾是一名经济学教授。阿罗的外甥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此前曾任哈佛大学校长，现为哈佛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而罗伯特·萨默斯的已故兄长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在1970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是首位获此殊荣的美国公民。

阿罗的同事和学生对他在系研讨会上与众不同的表现记忆犹新。例如，在某个研讨会刚开始时，阿罗可能会看上去心不在焉，甚至似乎在打盹。突然间，他会将注意力转向黑板，仔细考虑几分钟报告人在黑板上所写的内容，然后彬彬有礼地指出报告人在推理中的致命错误。1991年，阿罗退休后仍然继续为学生提供指导，但不再授课。不过，他对自己的授课技巧总是一带而过。阿罗先前的部分学生还清楚地记得他通常会在黑板上几乎同时列出许多概念，手上则自始至终把粉笔抛上抛下，但粉笔从不落地，这确实是一大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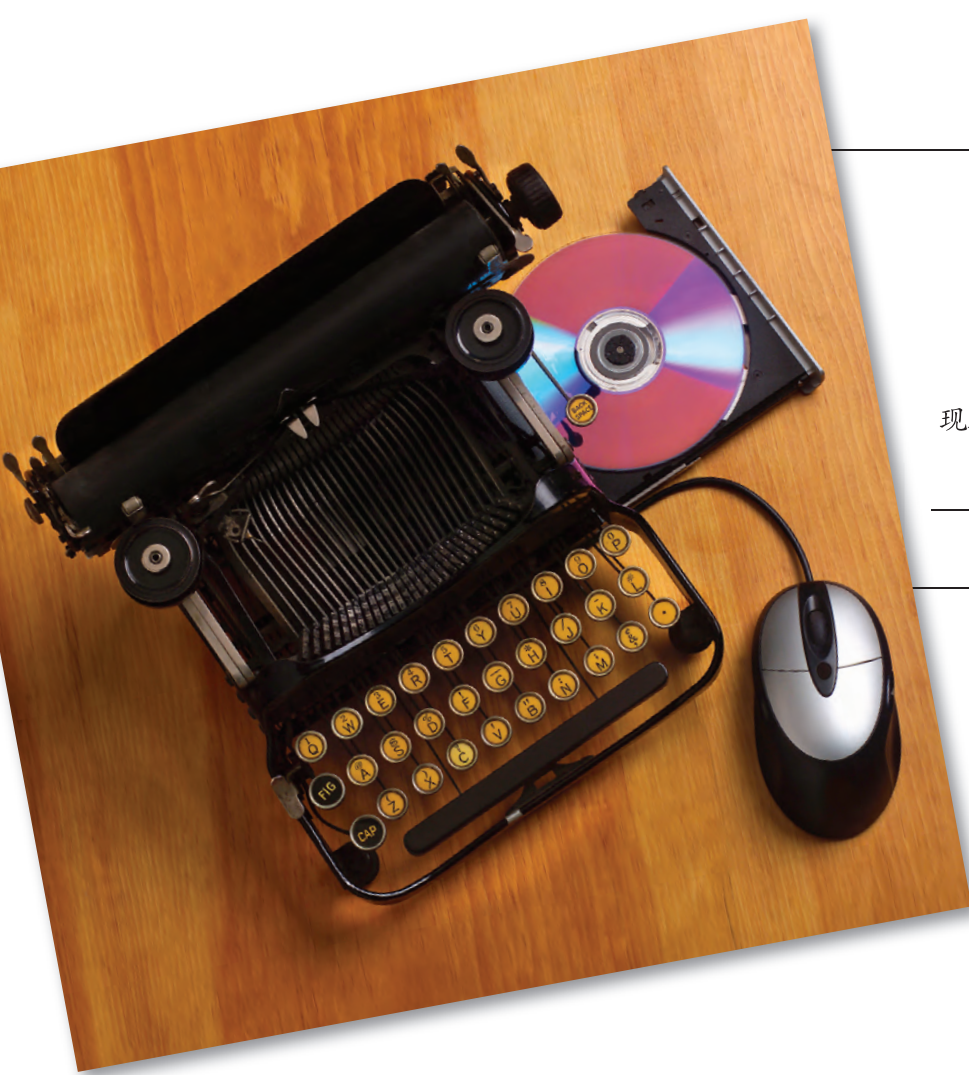
最近几年，阿罗还经常骑自行车到学校，他以前的学生还记得他戴着自行车头盔，背包里还背着打气筒来上课的情景。

如今，阿罗已经93岁高龄，不过他说，这更加激发了他解决问题的灵感，然而，一旦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答案，“我不得不说，我就有些失去兴趣了。”正因如此，即便他因在一般均衡理论方面的建树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对自己在社会选择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更为自豪。

在阿罗和德布鲁模型构建他们的模型时，其他几位研究者（包括已故的莱昂内尔·麦肯西）也在研究一般均衡理论中的同样问题。“在某些方面……如果我没有做那方面的工作，可能就不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阿罗说。

不过，没有其他人进行社会选择问题的研究，“因此，我对此深感自豪”。■

珍妮特·斯托斯基（Janet Stotsky）最近刚卸任IMF预算与计划办公室顾问一职，现为财政政策、妇女与发展以及发展宏观经济学咨询顾问。



现在较慢的人  
以后会变快  
就像今天的现在  
以后会成为过去  
顺序在迅速改变  
现在的第一名以后会变成最后一名  
因为时代正在发生变化  
——摘自《时代正在发生变化》，  
鲍勃·迪伦，1964年

# 变化的世界

对过去50年的一些思索

M. 阿汉·科斯、艾斯基·O. 乌兹图克

当《金融与发展》于1964年6月创刊时，世界经济正在经历二战之后的最好10年增长期。之前10年大规模的战后重建带动了欧洲和亚洲的蓬勃发展。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全球产出中占据约1/3的份额，当时正是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扩张期。

也是在这一年，鲍勃·迪伦这首历久弥新的歌曲成功捕获到了那个迅速变迁的时代特征。尽管当时迪伦在写歌时并没有考虑到全球生产这一因素，但全球经济在随后的半个世纪中确实经历了一些令人无法想象的变化。一些存在着长期发展问题的低收入国家开始实现快速增长，并最终成为全球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全球经济秩序经历了结构性转变，同时伴随着，也受益于科学技术的开创性进展以及全球化的兴起。

全球经济在1964年之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通过总结过去50年中发生的一些主要变革，我们为这一问题给出了一个折衷的答案。在这段时期内，全球经济所取得的进展是令人瞩目的。当然，在很多领域还存

在着许多迫切的改进需求，但我们同时也有保持乐观态度的理由。

## 新技术

如果是在1964年，我们应该用打字机写这篇文章，而非计算机；如果需要做背景资料研究，可能会依赖于期刊杂志和书籍等硬拷贝的媒介形式。将相关数据整合在一起并转变成图表的形式可能会花费几周的时间。此外，可能还需要花费好几周的时间将印刷好的刊物运送至遍布在全球各地的读者手中。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出现了许多技术进展，这使得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得各种信息资源并能够在转瞬之间便实现与全球各地之间的新知识分享。通信和交通技术的迅猛进步促进了许多其他领域的重大创新，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工作方式，提高了生产率并加强了国际贸易和金融联系。



我们的通信方式所经历的变化最为显著，因为计算机和移动技术领域的进步使所有通信媒介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1965年，第一台在商业上获得成功的小型电子计算机经通货膨胀调整之后的价格为135,470美元。该计算机能够运行基本计算，如加法和乘法。其容量约为4,000个12字节的单词。而今天，一般的智能手机的容量就达到了上述早期计算机容量的300万倍，而价格才不到600美元。

1991年，互联网开始走进公众视野，并开启了通信技术的新时代。互联网接入的巨大增长将人们、企业和各国之间联系得更加紧密，而移动通信则变得更加成本低廉且更加普及。1965年，美国发射了首颗商业通信卫星，可提供240个双向电话线路。今天，全球共有约400颗商业通信卫星用于信息处理和传送，其容量远远超过了1964年时的水平。1980年，每百万人中拥有手机的仅有5人，而现在每百人中手机拥有人数超过90人（见图1）。新技术使早期的通信方式变得过时。随着无线通信的快速发展，在过去的10年中，固定电话呈现出衰退趋势。

## 计算机和移动技术领域的进步使所有通信媒介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在过去的50年中，运输行业经历了重大变化。我们现在旅行和运输货物的速度比起50年之前大大提高，而且成本也更加低。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从迈阿密到新奥尔良的往返机票价格为927美元（经通货膨胀调整）；现在的机票价格约为330美元。由于通信成本变得更加低廉，通信速度也大为提高，同时运输成本也在下降，即使小型企业也能够涉足海外市场。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尽管全球对来自化石燃料、自然能源和核能等一次能源的能源消费增长了两倍以上，但能源领域的技术进步使生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富有效率。2011年时，生产1,000美元的产出需要137公斤石油当量，比20年之前减少50公斤。随着天然气、核能和地热、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供应量增加，全球石油供应量在全部一次能源供应量中的百分比也出现了下降。

## 全球化的兴起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这句话在1964年时并没有太大的分量。但随着全球化的兴起，这句话在过去的20年中已经变成了老生常谈；全球化是指全球经济出现的不断增长的贸易和金融方面的整合（见图2）。通信和运输技术的进步与不断加速的全球化同步进行并推动了其发展，各国之间通过迅猛增

长的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跨境移动而变得更加相互依赖；同时，各种理念和文化产品的传播也更加快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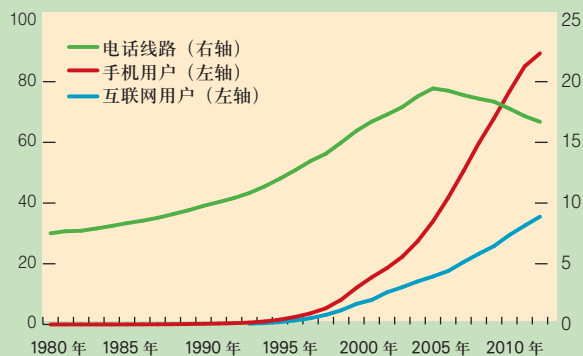
在过去的50年中，国际贸易的数量、方向和性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政策自由化的支持下实现了快速增长。区域间贸易流动随着区域间贸易协定的不断签署也变得更加活跃。制造业产品贸易迅速增长，并促进了跨境供应链的形成——公司现在可以将生产流程的不同阶段分别安排在不同国家来完成。

国际金融流动领域所出现的变化更为显著：在过

图1  
新的通信方式

互联网和手机的使用出现了显著增长，一些客户放弃了固定电话。

（互联网和移动电话用户，每百人） （电话线路，每百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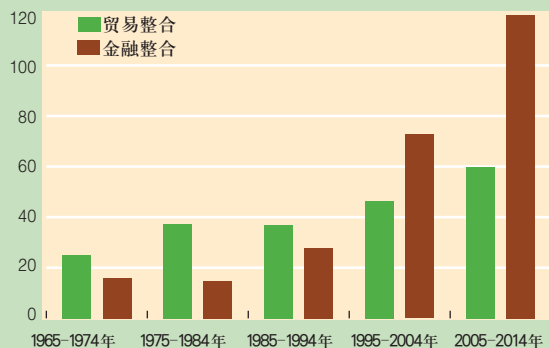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图2  
全球联系变得愈发紧密

在过去的50年中，全球贸易和金融方面的联系迅猛增长。

（占全球GDP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Lane, Philip R.和Gian Maria Milesi-Ferretti, 2007年, “The External Wealth of Nations Mark II: Revised and Extended Estimates of Foreign Assets and Liabilities, 1970-2004”,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第73卷第2册, 第223-250页; IMF, 《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注：贸易整合程度通过进出口总值占全球GDP的比例来衡量。金融整合程度则通过金融流入流出总量（包括银行贷款、直接投资、债券和股权）占全球GDP的比例来衡量。金融整合数据截至2011年。2014年金融整合数据为预测数据。

去的50年中，一小部分国家实施了金融体系的自由化，其国际金融流动已经增长了三倍。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认同资本自由流动及其带来的好处，国际金融流动出现了显著增长。全球金融总资产已经从1970年的2,500亿美元增长至2010年的约70万亿美元。国际

金融流动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股票投资组合的比例增加了很多。

尽管全球各国之间劳动力市场的整合程度要远远低于贸易和金融市场的整合程度，但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劳动力的跨境流动同样出现了相当大的增长。目前，大约2.3亿人口移居至其他地方，而这一数字在1970年仅为7,700万。20年以前，人们一般是从发展中经济体移居至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区域性人口流动目前超过了向发达经济体的人口流动。

#### 专栏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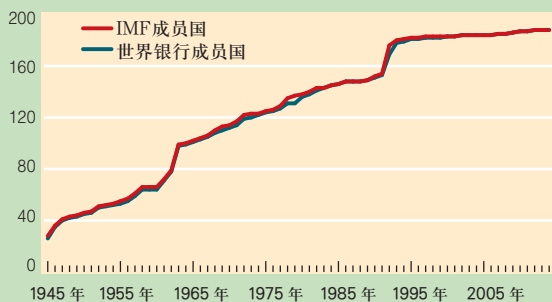
### 新国家，新成员

战争、政治和社会冲突以及苏联的解体使独立国家的数量从1965年的139个增加到2014年的204个。这些新近独立的国家迅速承担起在国际政策论坛中的职责。在1965年年末，IMF和世界银行的成员国都刚刚超过100。在过去的50年中，这两个国际组织各自均增加了约85个成员国，先是那些刚刚独立的非洲国家加入进来，后来则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加入。这两个国际组织目前的成员国数均为188。

#### 规模渐增

IMF和世界银行的成员国数量已经从1946年的不足40个增加至目前的188个。

(成员国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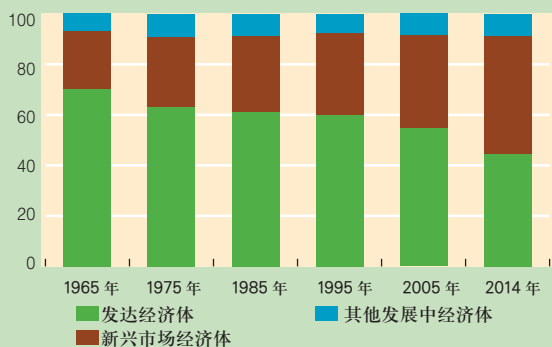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IMF和世界银行。

图3

### 新兴市场的崛起

自1965年以来，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GDP中的份额稳步增长。

(在全球GDP中所占份额，百分比)



资料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注：上述数据是根据购买力平价来衡量的；购买力平价是指在各个国家购买相同数量的产品和服务时对其货币进行转换的比率。2014年的数据为预测数据。

### 新的全球参与者

在过去的50年中，许多国家获得独立（见专栏1）。不过，在这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全球经济出现两极分化，由位于南半球的发展中国家和位于北半球的发达国家构成，并形成常态。南部国家大部分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贫穷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向北半球供应农产品和原材料。北半球的国家更为富庶和发达，这些国家生产商品并在全球贸易和金融流动中占据主要份额。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南部的一些国家，即所谓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在迅速融入全球经济的同时以令人瞩目的速度实现了增长。同时，这些国家也开始实施多元化生产，将出口产品从农产品向制成品和服务转型。

尽管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人口和劳动力中的占比一直保持相对平稳的水平，但其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均已扩大了影响力。从整体上来看，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GDP中的份额几乎翻了一番（见图3）。在1965年至1974年之间，它们对全球增长的贡献率平均达到30%，几乎达到了发达经济体贡献率的一半。在过去的10年中，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全球增长的贡献率超过70%，而发达经济体的贡献率则下降至约17%（见图4）。新兴市场经济体在迅速与世界其他地区银行业和其他金融体系加强联系的同时，也成为了全球贸易的主要驱动力量。

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表现更佳。例如，在过去的10年中，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在内的金砖四国占全球增长的一半。中国目前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巴西为第七大经济体，而在1970年时，这两个国家的排名分别为第8位和第16位。全球前20大经济体目前包括韩国和印度尼西亚，而在10年之前，这两个国家还远远排在后面。

### 痛苦的发展中断期

相比半个世纪以前，全球经济的规模增长了五倍，在此期间年增长率达到4%。新技术的发展为许多行业



领域提高生产效率铺平了道路并促进了经济增长。在1965年至2013年间，全球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约为2%，而在过去的50多年中，全球的增长速度要超过上述平均增长率。所以，尽管世界人口出现了大规模增长，但全球人均GDP在1965年至2013年期间翻了一番以上（见图5）。

然而，全球经济增长这一过程本身从来不是一帆风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许多国家在经历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增长都出现了巨大回落（见专栏2）。全球经济还经历了数次严重的增长中断期。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每一个10年，都出现了一次全球性的衰退（见图6）。在1975年、1982年、1991年和2009年，全球人均产出出现下降，全球性经济活动的其他衡量指标也同时下滑（Kose和Terrones，即将出版）。

在上述全球性衰退出现的时候，全球许多国家都会同时发生严重的经济和金融混乱。石油价格的急剧飙升引发了1975年的经济衰退。这对全球和许多国家都造成了冲击，如1979年石油价格再次飙升，美联储在1979年和1980年努力遏制高通胀，拉丁美洲出现债务危机——这对1982年的经济衰退影响巨大。

尽管1991年的经济衰退与许多不利的全球和各国的具体情况有关，但这场衰退还是成为了一起全球性的事件，因为发生在个别国家的各种困境被传递至其他国家：美国、日本和几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出现金融混乱；德国统一；苏联解体。2009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始于美国2007年的金融危机，但很快就通过贸易和金融领域的联系及其他发达经济体以及部分新兴市场。

每次全球性经济衰退仅持续一年时间，但却会引发长期的深层次人力和社会成本：数以百万计的人口失去工作，企业倒闭，金融市场急剧下跌。最近这次全球性经济衰退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影响最

为严重的一次：从全球范围看，在2007年至2009年期间，全球失业人口的数量增长了近20%。2009年，8,300万年轻人失业——这种局面的严重程度超过了以往20年中的任何时期。时至今日，危机爆发已有七年

专栏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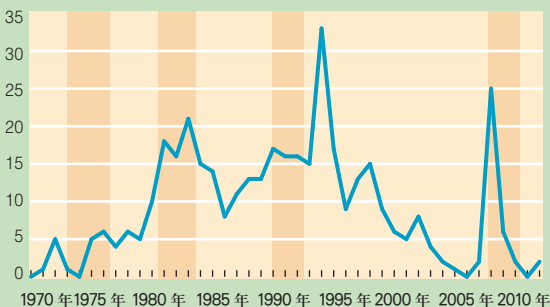
周期性的金融危机

经济危机扰乱了全球的经济增长。在1970年至2013年之间，全球大约共发生了400次经济危机。发达经济体仅经历了35次经济危机，其中一半发生在2007年之后。新兴市场经济体发生了218次金融危机，其中大部分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尤其是发生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货币危机是最常见的，在全部经济危机中占到1/2。银行和债务危机占据了另外1/2。目前尚无法预测下一次金融危机发生的地点和时间。

金融危机四处蔓延

在1970年至2013年期间，发生过超过400次银行、货币或债务危机。

(金融危机的次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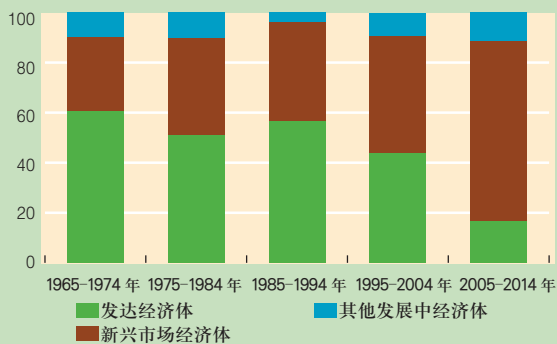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Laeven和Valencia（2013年）。  
注：带阴影的柱形代表1975年、1982年、1991年和2009年爆发的全球经济衰退的前后三年。

图4  
实现增长

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份额不断增长。

(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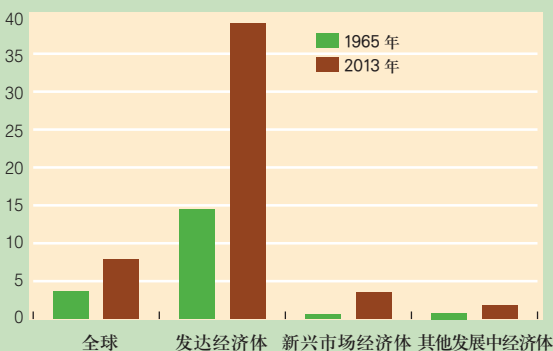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注：2014年的数据为预测数据。

图5

共享繁荣？

尽管总体而言人们的富裕程度较1965年有所提高，但那些身处发达经济体的人的状况要远远优于新兴市场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人。

(人均GDP，千美元，2005年定值美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人口增长放缓，但寿命延长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预期寿命稳步增长。

	1965-1974年	1975-1984年	1985-1994年	1995-2004年	2005-2014年
人口增长（百分比变化）	2.1	1.7	1.7	1.3	1.2
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岁）	59.0	63.0	65.5	67.6	69.9
出生率（每千人）	32.1	27.6	25.7	21.7	19.8
死亡率（每千人）	12.0	10.2	9.2	8.6	8.1
产出增长（百分比变化）	5.0	3.3	3.4	3.6	3.7
人均产出增长（百分比变化）	2.9	1.5	1.4	2.2	2.5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注：产出是指根据各国购买力平价加权后的GDP。购买力平价是指在各个国家购买相同数量的产品和服务时对其货币进行转换的比率。2014年的产出增长数据和人均产出增长数据为《世界经济展望》中的预测数据。与人口相关的数据截至201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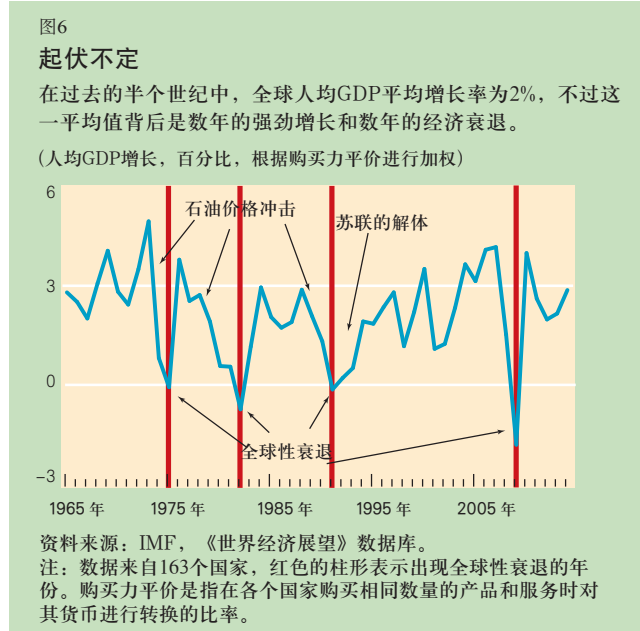
之久，但全球经济，尤其是劳动力市场，却依然在承受着这场经济衰退的影响。

## 贫困和不平等

全球人口从1965年的30亿增长至2013年的约70亿，而全球经济的增速快于全球人口增长，于是全球实现了普通公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尽管出生率出现下降，但由于医疗技术、卫生条件和预防接种方面的改善降低了死亡率，人们的寿命普遍延长，全球人口依然保持着持续增长的态势。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大约为55岁；而现在新生儿的预期寿命约为70岁（见表）。

在学校教育方面也取得了进步。全球完成小学教育的儿童在全部学龄人口中的占比从20世纪80年代的80%上升至2012年的92%。在低收入国家，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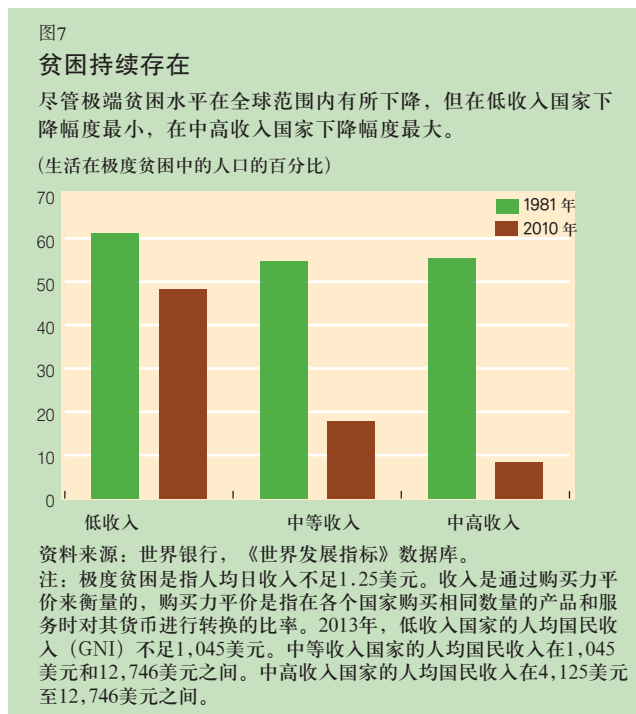


一比例的变化更加显著——在过去的30年中，从45%提高至略高于70%。

总体来说，由于过去50年中全球经济所取得的进展，普通公民的富裕程度得到提高。不过，全球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福利并未得到均匀分配——其结果造成了持久的贫困和不平等。

2000年达成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之中包含这样一个目标，即在1990年和2015年之间将全球极端贫困水平降低一半。尽管该目标已经提前五年完成，但在许多低收入国家，极端贫困依然是一个广泛存在的问题。1981年，在中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中，每日生活费用不足1.25美元（极端贫困线）的人口约占一半（见图7）。30年之后，主要由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迅速发展，中高收入国家在减贫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但在低收入国家，还有接近一半的人口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从全球范围来看，超过10亿人口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他们主要分布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南亚。

在大多数国家，不平等现象也有所加剧。例如，在1990年至2010年期间，在可获取相关数据的国家





中，超过 2/3 的国家出现了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多国的不平等现象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达到了最高水平，然后开始下降，但是依旧高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的水平。此外，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中，收入最高的 1% 人口的收入份额持续上涨（见图 8）。比如，现在美国最富有的 1% 人口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约 18%，而在 50 年之前，这一比例仅为约 8%。

全球经济还存在着另外一种类型的重大挑战，这就是气候变化。在过去的 20 年间，二氧化碳排放出现了显著增长，并且引发了海平面上升、冰川融化和极端气候事件等各种问题。自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所报道的与气候相关的自然灾害的数量增长了三倍以上。低收入国家除了存在极端贫困的现象，还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所带来的风险的影响。尽管在过去的 25 年中，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监管方面已取得了进步，但要缓解气候变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还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自从 1964 年以来，世界经济经历了一个伟大变革的时期。技术进步和国际整合的速度令人目不暇接，这使整个世界真正变成了一个地球村。通信方式不断改进，速度也不断提高，各国之间的贸易和金融往来不断加强，这在 50 年之前完全无法想象。鉴于此，各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世界经济从两极化转向了多极化，新兴市场经济体目前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在提高全球各地人们生活水平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不过，我们还需要更加努力来改进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以便更好地应对金融危机并降低贫困

和不平等程度。

## 尽管实现经济增长对于战胜许多挑战而言至关重要，但增长必须涵盖社会的所有阶层。

值得欣慰的是，当今世界已经对上述重大挑战具备了清晰的认识。同时，在 IMF 和世界银行等多边组织（这两个组织到今年已经具有 70 年历史了）的协调下，已经形成了战胜上述挑战的合力。IMF 已经采取措施来改进其针对危机干预和管理的政策建议并提高了其针对宏观经济和金融领域的监督能力。世界银行也已经采取措施以实现其最近设置的双重目标，即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在全球层面消除极端贫困并倡导“共享繁荣”，以期改善社会中较贫困阶层的福祉。此外，还达成了以下共识：尽管实现经济增长对于战胜许多挑战而言至关重要，但增长必须涵盖社会的所有阶层，同时环境友好并具有可持续性。

在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关于世界经济的未来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些观点认为，由于一些误导性的政策，发达经济体可能会进入一个长期经济停滞的阶段。还有一些观点认为，迅猛增长的时代已经远去，因为现在的创新与以往时代的重大创新相比用处不大。不过，还有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全球经济具有巨大的潜力，能够在未来的数十年中实现健康的增长。创新、设计良好的政策以及欣欣向荣的新市场和前沿经济体有助于开发这一潜力。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没有人能够准确预测世界经济可能经历的变化，也没有人能够预测 2064 年，也就是再过半个世纪之后，人们在类似本篇文章的经济分析中会做出怎样的评价。但是，有一个预测会像今天一样依然成立，就像迪伦在其 50 年前的歌中所写到的那样：“时代正在发生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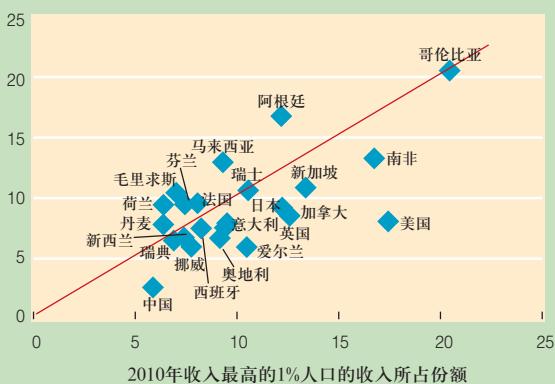
M. 阿汉·科斯 (M. Ayhan Kose) 是世界银行发展展望小组的主任，艾斯基·O. 乌兹图克 (Ezgi O. Ozturk) 是 IMF 研究部的研究官员。

图8

### 不平等程度的加剧

在过去的50年中，大多数国家收入最高的1%人口的收入所占份额都有所增加。

(1965年收入最高的1%人口的收入所占份额)



资料来源：Alvaredo和其他人（2014年）。

注：数据来自23个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1965年的数据和2010年数据是当年数据或可获得数据中的最接近年份的数据。

### 参考文献：

Alvaredo, Facundo, Tony Atkinson, Thomas Piketty, and Emmanuel Saez, 2014, *The World Top Incomes Database*. <http://topincomes.g-mond.parisschoolofeconomics.eu>

Kose, M. Ayhan, and Marco E. Terrones, forthcoming, *Collapse and Revival: Understanding Global Recessions and Recoveries*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Laeven, Luc, and Fabián Valencia, 2013, "Systemic Banking Crises Database," *IMF Economic Review*, Vol. 61, No. 2, pp. 225-70.

# 水晶球的预言

对趋势和不确定性的研究有助于为未来的经济挑战做好准备

卡尔帕纳·科克哈尔、孙艳、埃里迪基·特松塔斯和尼古拉斯·维斯特利

“所有预言都是错误的；这是人类可享有的为数不多的确定事实之一。”

——米兰·昆德拉

全球经济正在经历一系列的转变，这使未来的经济前景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其中有些转变是周期性的，比如从全球金融危机中复苏；另一些转变是长期性的，且从本质上看更具结构性，比如人口的发展和相互间联系的快速增长。这些转变在构建未来的同时相互影响，导致通过外推以往的经验窥探未来的方法越来越不可靠。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渐行渐远，IMF 在去年发起了一个行动，旨在更好地调整 IMF 的近期工作重点，以求处理好从金融危机到长远发展的过渡。重点工作内容是在未来几十年中，确认将塑造我们生活的世界的潜在趋势及相关的确定性。了解它们的性质、速度，以及最重要的部分——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对于迎接未来挑战和警惕可能导致新危机的风险至关重要。

当然，对能够构建未来世界经济的趋势和不确定性进行选择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广泛的内外部磋商协助下，IMF 员工团队将其工作重点缩小为几个关键点：人口统计、权力分散、资源及环境的可持续性、相互关联性和收入不平等问题。这几项重点尤其切合 IMF 及其成员的工作，原因是它们对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具有巨大的潜在影响力。不应将这几个关键点解读成对未来世界经济的预测，因为随着时间的变迁，它们的发展也充满变数。

## 人口压力

预计到 2030 年，世界人口将超过 80 亿，并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步入老龄化。到 2020 年，年龄在 65 岁及以上的人口数量将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过 5 岁以下儿童的数量（NIA，2007 年）。除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外，其他地区老年人口的数量都将增长，并超过适龄工作人口的数量，这抬高了与年龄相关的成本。与

此同时，预期寿命的提高意味着工作年限的延长。因适龄工作人口减少，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新兴市场可能尚未致富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但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南亚，尽管人口迅速增长，但仍不得不为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新人创造就业机会。不断变化人口结构模式也会影响各国的储蓄和投资，并改变未来全球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

## 单一的全球权力不复存在

全球权力的重心逐渐从发达经济体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转移。同时，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和城市的国内和国际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

1992 年，发达经济体占全球 GDP 的 2/3（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但 2012 年这一比例下降至不到全球 GDP 的一半（IMF），随着城市逐渐成为权力的中心——如今，全球 GDP 中约有 60% 来自 600 个中心城市（McKinsey，2011 年）。

但是，未来全球权力转移的动向远未明朗。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发展轨迹可能参差不齐，这将





给城市和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不断扩大的权力带来考验。权力的分散对国际社会协作应对共同问题的能力有益还是有害，仍有待我们去发现。权力从发达经济体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转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维护全球稳定、增强适应能力和发展潜力的机会，因为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家与全球的繁荣休戚相关。同时，不同经济体的关注点多种多样，有可能造成更多的冲突和不稳定或政策上的惰性和无为。

## 拯救地球

过去十年中，商品价格的上涨和反复无常再次引发了对自然资源短缺的忧虑。气候变化的迹象也日益明显，预计其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国家界限；自1997年起，全球气候经历了有史以来最温暖的12年，此外还出现了海平面上升、冰川融化的问题（GISS, 2012年）。如现在不采取纠正措施，不断增长的世界人口和收入给自然资源（如水和环境）带来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大。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可能会给发展中经济体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过去技术创新曾经发挥了作用，但可能不足以维持支持经济增长和保护环境之间的平衡。当前我们需要采取及时的协同措施，以避免本世纪后半叶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

## 同舟共济

全球金融危机敲响了警钟。世界正以一种日益复杂的方式整合为一体，推动了繁荣和风险的传播。国家之间的贸易和金融联系更加紧密，现在的世界出口量是20年前的6倍（IMF）。通过子公司、分支机构和公司网络发展起来的金融中介机构加速了全球化的步伐。劳动力流动也不断加强：目前到国外定居的人口数量达到空前的2.32亿，比2000年高出33%（UN, 2013年）。技术拓宽了信息的使用渠道，增强了数据传输和处理的速度。

相互关联性可能会继续增长，但其增长速度、性质和隐含的风险都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虽然对全球经济有益，但相互关联性会导致系统性风险的累积，推动冲击的传播，提高潜在的危机成本。我们对相互关联性的认识能否跟上其不断变化的步伐和性质，尚不能确定。

## 分享财富

过去几十年中，收入不平等的问题显著增加。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已使数十亿人口摆脱了贫困，但同时也加剧了收入的不平等。有很多理由让我们相信

这种收入上的不平等将会持续下去，考虑到这种不平等的惰性，以及收入不平等和政治极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更加难以达成再分配政策方面的共识。持久的不平等威胁着经济的增长和宏观稳定性。

## 充满挑战的未来

这些趋势和不确定性将以怎样的方式发展、相互作用并构建起未来的全球经济？使用情景分析工具（出于战略性目的，常用于构建未来发展趋势的管理工具）不难构建出一个未来，这个未来存在着不同维度的紧张关系和风险，它们的发展更加突然且互为基础，并向我们提供持续稳定性和共同繁荣的能力提出了挑战。例如，相互关联性和权力的分散指的可能是一个日益一体化的、但政治和社会方面分化的未来，对不同级别的政策合作具有深远的影响。另外，经济增长能够提高生活水平，也会给环境、社会和政治成本带来重创，削弱它的某些优势，进而破坏可持续性。

## 全球公共产品是不可或缺的。

经济前景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给IMF及其成员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全球公共产品是不可或缺的。举例说明，这类产品包括在互联性更强的世界的更大的全球金融安全网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性解决方案。IMF必须继续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和需求，坚定不移地履行其使命——维护全球经济和金融的稳定。

美国民权活动家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 X）指出，未来属于那些现在就开始准备的人。在充满改变和变革的时代，这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正确。■

卡尔帕纳·科克哈尔（Kalpana Kochhar）是IMF组织战略、政策和检查部副主任；孙艳（Yan Sun）是该部副组长；埃里迪基·特松塔斯（Evridiki Tsounta）和尼古拉斯·维斯特利（Niklas Westelius）均为该部高级经济学家。

参考文献：

Goddard Institute for Space Studies (GISS), 2012, *Surface Temperature Analysi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Washington, various years).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11, *Urban World: Mapping the Economic Power of Cities* (Seoul, San Francisco, London, Washington).

National Institute on Aging (NIA), 2007, *Why Population Aging Matters: A Global Perspective* (Washington).

United Nations (UN), 2013,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Contribu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New York).

# 危机迫在眉睫

五位诺贝尔奖得主讲述他们眼中未来全球经济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 全球变暖： 另一个难以忽视的真相

乔治·A. 阿克洛夫

人类通过故事（或叙事）进行思考。故事讲不好就会给自己带来麻烦。20世纪20年代，美国业余语言学家及人类学家本杰明·李·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记述了这种现象。他的正职是防火工程师。在工作中，他注意到火灾事故大多发生在加油站。沃尔夫将语言学与他的工作相结合，发现负责搬运油桶（这些油桶随后将用于运输汽油）的工人们会在他们“认为”的“空桶”附近吸上一根烟。

现在，类似的语言学现象已经让我们的世界陷入了困境。每隔几年，世界领导人就会聚在一起召开会议：里约热内卢、京都、约翰内斯堡、哥本哈根。他们做出了严正的声名，但全球变暖的行动再一次被甩到了一边。一方面，当今全球变暖的语言表述并没有激发出个体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没有促使其政府采取行动。

## 我们讲给自己听的全球变暖的故事太过冷淡、太过谨慎。

一个简单的故事就能做到引人注目、真实可信。地球大气就像一张裹住我们的保护毯。来自太阳的能量可以穿透这张保护毯给地球带来温暖，而地球的大气温和地减缓了其辐射强度。

我们人类共有个宝宝，那就是我们的地球。年复一年，不可阻挡地，保护在我们这个宝宝周围的大气毯越来越沉重。即便是消耗5加仑汽油的50公里短途自驾之旅，也会给大气增加100磅重的二氧化碳。以普通的美国家庭为例，这种没有恶意的行为每周会给地球的保护毯增加1,800磅重的二氧化碳。全世界所



乔治·A. 阿克洛夫（George A. Akerlof）2001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是IMF研究部客座学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名誉退休教授，同时还是一位作家。其最新著作是与瑞秋·克兰顿（Rachel Kranton）合著的《认同经济学——身份如何影响我们的工作、薪酬和幸福感》（Identity Economics: How Our Identities Shape Our Work, Wages, and Well-Being）。

有家庭累计起来，通过我们对地球宝宝和保护毯的直观理解再加上一定程度的科学知识，很容易想清楚这个世界的气候极有可能变得越来越暖和。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父母都会急于拯救这个宝宝。但是我们讲给自己听的全球变暖的故事太过冷淡、太过谨慎。我们阅读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宣言。我们尊重“科学家”提出的结论。科学家们已经用几乎完全一致的、富有激情和力量的声音传递了他们的信息，但科学的专业冷静却压抑了这样的声音。大约20年前的一次晚宴，我曾与一位著名的天文学家比邻而坐。因为不知道要和一个天文学家聊些什么，于是就提起了气候变化。当时他告诉我说：“目前我们还不确定人为气候变化会造成全球变暖。”

就科学语言来讲，他的话是正确的。一定程度的质疑中包含着适度的秘而不宣。但以公共政策的目的看来，考虑到人为全球变暖的极大可能性，这种慎重

（转第19页）



## 增加需求： 尚未解决的危机

保罗·克鲁格曼

21 世纪第二个 10 年走到半途，世界经济——至少是那些相对富裕的国家——要面对的最大问题是许多经济学家从未想过会发生在我们眼前的问题。上世纪 30 年代以来，世界首次遭遇持续的需求不足；人类的消费不足以充分利用我们拥有的生产能力。这本应是一个已经得到解决的问题，一个曾经困扰我们祖父那一代人但不会卷土重来的问题。可是这个问题回来了，而且应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依旧难以捉摸。

让我提供一些粗略的汇总数字。从《世界经济展望》(WEO) 数据库中查找 IMF 的“发达经济体”产值总和，我们会发现 2000—2007 年间，发达经济体的实际 GDP 总值增长了 18%。当时的经济规划要求在中期阶段应继续相似速度的增长。然而，实际上 2007—2014 年间发达经济体的总体增长将只有 6% 左右，相对于之前设想的上涨趋势而言产生了 10% 的缺口。

### 我们的经济政策制定机构丝毫没有做出调整，以应对巨大的持续的需求缺口。

实际上，人们普遍认为经济短缺的实际量应远远低于这个数值；据 WEO 数据库估计，当前发达经济体的总体产出缺口仅为 2.2%。但若认为产出缺口的估计值较低就代表政策并未失败，这是相当严重的错误，归根结底有两个原因。

首先，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实际能力低于产能多少。美国劳动参与率或英国生产力的显著下降是否具有长期性，还是具有周期性？工人们离开是因为他们看不到工作机会吗？通货膨胀稳定性低就代表经济运营接近生产能力吗？还是由于工人不愿接受减薪，造成菲利普斯曲线（失业率和相应的通货膨胀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在低通货膨胀率之下呈现出平直状态？没有人知道答案——如果认为低产出和高失业率不可避免，而实际上它们可能仅仅是由于需求不足造成的，那将会是一个悲剧。

其次，生产潜力增长的实际跌幅与预估值相同，



保罗·克鲁格曼 (Paul Krugman) 是 2008 年诺贝尔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和国际事务专业教授以及《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他的最新著作是《马上终止这场萧条！》(End This Depression Now!)。

验证了所谓短期经济困境的强大的长期效果：随着时间的变迁，放任全球经济深度衰退有可能导致长期经济前景的严重恶化。这反过来说明维持足够的需求非常重要，不仅短期内如此，从长远来看也是一样。

因此，无论如何提高需求都应该是当务之急。不幸的是，据我们所知，自 2007 年以来，我们的经济政策制定机构丝毫没有做出调整，以应对巨大的持续的需求缺口。

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斯托克 (James Stock) 和马克·沃顿 (Mark Watson) 将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美国宏观经济波动的下降称为“大缓和”。在这个时期，我们以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已经得到控制。当时需求管理是委派给独立中央银行技术专家的任务，而财政政策只关注长期问题。但是，面对持续的巨大冲击，这种政策失败了。一方面，中央银行受到零下限的约束（即利率不可能为负这一事实），并对自身资产负债表的规模有所担忧。另一方面，财政政策不但没有帮助，反而迅速使情况恶化。此政策受到了借贷双方不对称的阻碍——前者被削减，后者没有义务再增加，同时也受到政治内讧的阻碍。我有时会开玩笑说欧洲和美国在比赛谁应对当前危机的能力更差劲；目前欧洲获此殊荣，但美国也没好到哪里去。

如果相信这些问题都是暂时的，一切将会多么美好，而且也许它们本来就是暂时的。不过现在我们已经意识到，大缓和的稳定性以空前增长的国内债务和相对快速增长的适龄工作人口为基础，但这两方面并未得到恢复，而且目前几乎不存在政策转变的迹象。

因此，需求不足仍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并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将持续存在。我们必须找到应对这种形势的方法。■

# 长期性经济停滞： 富裕经济体陷入中性发展

罗伯特·索罗

未来 50 年内，世界不可能从紧迫的经济问题中脱离出来。任何国家的短期目标都可能包括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源和后果，应对或未能应对国民经济内部日益加剧的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而对于富裕经济体来说，他们的目标还包括改变和调整以适应明显的技术与需求相结合的趋势，以便为处于技能 / 薪资范围的顶端和底端的劳动者创造就业机会，但对于中端部分仍做得还远远不够。

然而，我要提出一个不是很深奥的问题，但它的确是一个问题：欧洲、日本和北美这样的富裕经济体现在是否已陷入所谓的可能并不短暂的长期停滞时期？我选择这个问题的理由是，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如果不能及时找到这个困境的出口，成功应对更严重问题的可能性就会被大大降低。

回顾上世纪 30 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的文章，他对长期停滞这个术语的解释是：国民经济（或其中一部分）的一种持续趋势——不仅增长缓慢，而且更严重的是国家的生产潜力很难或无法得到充分地利用。当年长期停滞的定义是，为投资者提供满意回报率的投资机会的缺乏。如今一般将其简单描述为，与生产潜力的充分利用相协调的实际利率为负值，且并非总能实现。

## 近年来，只有泡沫经济能够创造繁荣，而且我们知道这种繁荣难以持续。

认为长期停滞在现阶段是一个威胁的证据何在？其证据包含两个部分。第一，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提出了最有力的论点——与繁荣美好的旧时代相比，人口和全要素生产率在未来的增长将更加缓慢。他对人口的预测非常可靠，而对全要素生产率在资本和劳动力效率方面的增长持有的悲观情绪是不无道理的，因为当前的信息技术浪潮无法实现过去的伟大技术浪潮（内燃机、电气化、城市化）在那个时代所创造的产出 / 福利增长。即便缓慢增长在未来极有可能发生，但长期停滞的观点仍会持续存在。

第二部分是第一部分的延续。人口增长（通过资



罗伯特·索罗（Robert Solow）是麻省理工学院名誉退休教授，因对经济增长理论的突出贡献荣获 1987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本‘拓宽’）和技术进步（通过对新能力的需要）是保持私人投资回报率不会下降的主要力量，尽管资本强度仍在不断增长，资本回报却在不断下降。在增长缓慢的未来，储蓄仍将继续，回报率将会下降，私人投资的实力将会减弱。

另外，还有人认为近年的发展情况印证了这种悲观主义情绪。近年来，只有泡沫经济（网络、房地产）能够创造繁荣，而且我们知道这种繁荣难以持续。看看当前的形势，在持续衰退正式终止五年后，无论美国还是欧洲——尤其是日本，已经具备全面恢复的能力（比如充分利用的能力）。无论如何，经济的这种长期疲软与长期停滞的观点是一致的。

但也不完全一致。大部分个体需求的不足可直接追溯到建设支出的缺口，包括住宅建设和非住宅建设（这还会导致许多薪酬良好的工作机会流失）。其原因并不神秘。危机前经历过房地产泡沫的经济体只剩下过量的房产和已被扰乱的抵押贷款市场。办公建筑和其他商用建筑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然而，目前形势仍存在一些迷惑。至少在美国是如此，尽管企业利润已非常强劲，但商业投资仅部分地从衰退中恢复过来。其结果正如布鲁斯金学会高级研究员马丁·贝利（Martin Baily）和巴里·博斯沃思（Barry Bosworth）在其未发表的文章中所指出的，2009 年以来，商业储蓄已超过商业投资。企业部门一般是净借款方，后来变成了其他经济部门的净借出方。正如停滞假说所暗示的，这更像是对预期投资回报率下降的一种反映。

我们得出了谨慎的结论（谨慎是一种时尚吗？），即这种停滞假设并不是确凿无疑的，但也不表示它就会长期持续。汉森的担忧被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政府扩张洗刷殆尽。现在我们应该开始考虑恰当的应对政策了。■



## 包容性： 促进并适应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

迈克尔·斯宾塞

全球经济中存在着众多紧迫的挑战，但对我来说，核心的、决定性的挑战是接纳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完成从二战后开始的融合过程。这样我们不仅有希望缓解大规模的贫困，还有可能为战后首次经历显著经济增长的85%的世界人口提供更多享受健康、丰富并具有创造性生活的机会。这种包容性的大规模扩展有可能成为本世纪的决定性特点。但要实现这种包容性，说着容易做起来难。

包容性需要思维模式、应对政策及国际和国内机构的改变。我们的目标是，在重大转变迫使相对价格发生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发生戏剧性变化以及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也发生改变的同时，尽可能让发展中世界的崛起带来全面的效益。

如能取得成功，此融合过程将在未来25—30年中将全球经济规模提高三倍——如果我们的基准是融合的初始阶段（即1950年）而不是今天，那么全球经济规模的增长倍数会更大。如不对全球自然资源的利用进行调整就试行融合过程，将会导致增长速度迟缓并最终停止，甚至出现更糟的结果，即超越环境和生态临界点后的毁灭性失败。环境的可持续性对适应发展中世界的发展而言至关重要。

所有经济体都依赖有形和无形资产这个基础。在投资并允许这些资产缩减或至少持平的情况下，通常经济增长可能持续一定的时间，但并不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我们已经知道自然资本是支撑全球经济的资产的一个重要子分类。对自然资本的投资不足不仅会降低增长的质量，而且最终会破坏经济增长，甚至会将经济增长推向负值区。因此，在朝向全球化可持续增长模式发展的过程中，当前对自然资本的测量工作是一个重要的步骤。

其次是分配问题。在发达经济体中，通过自动化、减少中间商及不断发展的全球供应链中的离岸外包，技术和全球市场的力量正在减少或淘汰一系列岗位。这一切发生得太快，导致劳动力市场措手不及，失去了平衡；人力资本与发生转变的全球经济需求匹配不佳。加速恢复平衡状态几乎成为各地经济增长和公平分配的首要任务。即便恢复工作的进展速度比现在快，不平等现象依然会持续。

目前，对如何处理当下存在的各种形式的不平衡问题尚未达成共识。有人认为我们应该重点解决贫困



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外交关系委员会杰出访问学者、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以及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问题，将其他问题留给市场效应来决定。另有一些人为彻底的输家（比如失业的青年群体）和责任分担问题而担忧，特别是在近期这种重大经济冲击之后。还有一些人把注意力放在绝对和相对的收益和损失上，并着重强调绝对收益和损失。尽管存在这些分歧，大部分社会（包括发达和发展中的社会）都有共同的代际向上流动的愿望。不同国家的发展趋势多种多样，其中许多国家的趋势令人担忧。

### 包容性需要思维模式、应对政策及国际和国内机构的改变。

如果偏向技能的、劳动力和资本节约型数字技术像我们所认为的一样强大，这些技术将会显著提高生产率。由此产生的“盈余”应该用于生产并消费更多的商品和服务，这种表现并不明显，至少在高收入国家中如此。也许应该将其用于增加休闲的时间。或许我们的平均每周工作时间将会，或者说应该缩短。这样我们将需要采取更多的综合福利措施，应超出可记录的市场交易所需的商品和服务的总价值。如果就业模型保持不变，加之传统意义上大多数人口从事全职工作和少数失业人口的不断增长，这种改变很难行得通。

提到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国际协调性，将它定性为“一个失败的领域”是不公平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在开放全球化经济、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和促进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政府和中央银行在危机条件下确实展开了合作，作出了至关

（转第19页）

## 不平等问题： 经济应服务社会

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

二战后世界经济的主要冲突是经济制度二选一的较量：哪种制度能够为我们提供实现增长和繁荣的最好方法，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场争斗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宣告结束。然而，一场新的较量现已露端倪：哪种形式的市场经济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的民主资本主义看似取得了成功。美国通过一系列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向全世界推行放松管制、私有化和自由化。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是政府将市场从过剩中拯救出来。将政府作用最小化的尝试遭遇惨败，迫使政府采取了史无前例的行动。

在经济危机的余波中，许多人仔细研究了美国的经济制度。在25年里，美国的平均收入停滞不前，事实很明显，其经济制度对于大多数公民来说并不适用，只利于处于社会上层的公民。甚至其政治制度也受到了质疑：经济不平等转化为政治不平等——引发经济危机的诸银行有能力抵制在大部分经济学家看来对防止危机再次发生非常必要的改革，可谓证据确凿。民主不仅仅是选择政治领导人的定期选举，而美国的民主成果看起来越来越符合“一美元一票”，而非“一人一票”。

### 美国的政策是其不断加剧的高度不平等状态的根源。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认为高度不平等代表了资本主义的自然状态——它只是二战后形势发生变化后的一个短暂的插曲，是战争带来的团结一致的结果。皮克迪肯定了其他经济学家的观点：过去的30多年中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急剧增长，以及日益增长的继承财富的重要性。他预测这些趋势将会持续下去。

我认为这种不断增长的高度不平等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也并非是不可阻挡的经济力量的负面效果。有些国家的不平等水平相对很低——但经济增长却同样强势——这类国家的公民，尤其是收入处于下半段的公民，他们的生活状态远远优于美国的下半



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2001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和作家。他的最新著作是与布鲁斯·C. 格林沃德（Bruce C. Greenwald）合著的《创建学习型社会：增长、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新途径》（Creating a Learning Society: A New Approach to Growth,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gress）。

段公民。近年来，部分国家的不平等状态已明显缓和，比如巴西。美国的政策和政治是其不断加剧的高度不平等状态的根源，效仿美国的国家（如英国）也见证了类似的后果。这种不平等是由国家的伪资本主义——充斥着垄断和寡头垄断、政府向企业或富裕阶层提供津贴、对银行提供救助、公司管理中的缺陷，以及国家税法——允许最富有阶层将其款项转移到离岸避税港并且仅需支付远远低于应缴额的税款造成的。

IMF最近强调了这种不平等对经济表现的负面影响。在《不平等的代价》（The Price of Inequality）一书中，我阐述了如何才能同时获得更强劲的增长、更大的稳定性和更多的平等，特别是在像美国这样不平等已经达到极限的国家。滴入式经济学无法发挥作用——美国的数据已充分显示出这一点。在多数不平等问题的来自于寻租行为（顶层组群私占国家资源的份额越来越大）和缺乏平等机会时尤其如此，这说明国家底层人口始终没有机会实现他们的潜力。

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出现的伪资本主义是民主缺陷的结果，这个结果是可预测的，并且已经被预测出来。这种缺陷使经济不平等轻易地转化成政治不平等，这是一种恶性关系——一种形式的不平等的加剧强化了另一种形式的不平等。

未来几十年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不仅仅是抑制市场经济的过剩，还包括预防近年来金融机构表现出来的过度冒险、掠夺性贷款和市场操纵。这里所说的主要挑战是凭借能够提高生活水平的竞争驱动型创新活动让市场发挥应有的作用，这种创新活动不以占

（转第19页）



---

（乔治·A·阿克洛夫，接第14页）

是不明智的。父母不会通过测量宝宝的体温来确定室内温度是不是过高；同理，对于全球变暖，我们需要一个故事来刺激采取必要行动。

我们需要一种更有激情的语言表达方式，不仅为我们自己，也让我们的政府有理由、有意愿采取行动。像任何经济学问题一样，人们对全球变暖的经济学已经有了充分的认知。对抗这一问题的最佳方式（但仍需巨额费用）就是对碳排放统一征税；在碳排放量下降到理想水平以前，这项税收可逐步增加。最优政策还要求将研发补助用于减排方法的开发。

但全球变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碳排放无处不在，

因此税收和补贴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每个国家必须将其作为自身义务欣然接受。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全球联盟，并团结一致。我们必须告诉自己要齐心协力。不管别人做什么，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为什么？因为地球是我们美丽的宝宝。

因此，我们要面对两个难以忽视的真相。第一是全球变暖本身。第二是我们还没有讲述一个能够迫使我们对抗全球变暖的故事来。■

---

（迈克尔·斯宾塞，接第17页）

重要的积极贡献。凭借对全球经济和金融系统行为的日益了解，国际金融机构已为新兴经济体的贫困缓解和经济稳定作出了极大贡献，并显示了政策上的灵活性。

但这些机构的治理改革步伐非常迟缓，落后于主要新兴经济体不断变化的相对规模和影响力。这就会破坏机构的可靠性和权威性，进而破坏其政策协调能力。其次，伴随结果大都被主要的国内政策制定实体所忽略，特别是在金融和货币政策领域，这些实体的使命要求其将关注点聚焦在国内。政策制定者好似在对独立网络的中心进行监管，没有考虑到这些决策的更广泛的影响力和反馈循环。

有效的超国家治理充其量是一项正在进行中的工

作。只要看看欧盟和欧元区就足以窥见以不断提升的全球化经济或网络依存性为依据的监管和宏观经济管理所面临的难题。主权、身份和民主自决都是潜在的问题。

我们的子孙后代将会生活在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中——其规模更大，内在联系更紧密、经济质量和实力的分配更加公平，收入水平、发展阶段与文化丰富多样。学习如何保证这段历程的可持续性、稳定性和公平性，对所有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及这些国家的公民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经济难题。■

---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接第18页）

有国家收入更大份额为中心，也不以规避促使经济良性运转的法规为目标。不仅要确保强劲的经济增长，还要确保实现共同繁荣。此外，还需要确保经济为社会提供服务，而不是相反。当经济“增长”时——无论是关系到全球经济一体化还是欧元的创造——需要大幅削减工资或全社会的共同福利，此时我们必须自

问是否混淆了发展的目的和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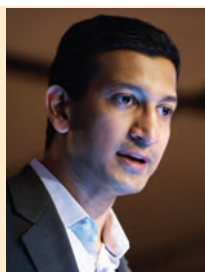
我们的国际政治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确保民主进程真正代表普通公民的利益。打破金钱在政治中的力量并非易事。但如果不这样做，我们的经济和民主将会让我们大失所望。■

# 下一代

## 25位45岁以下的经济学家正影响我们对全球经济的看法

亲爱的读者、各位国际经济学家以及报刊杂志编辑，请告诉我们：哪些45岁以下的经济学家将在未来几十年里在对我们理解全球经济方面最具影响力？《金融与发展》研究员卡门·罗林斯（Carmen Rollins）从大量的资料中收集信息并汇集成一份值得关注的经济学家名单（该名单并不详尽），供大家参考。

**尼古拉斯·布鲁姆（NICHOLAS BLOOM）**，41岁，英国人，斯坦福大学，采用量化研究衡量和解释公司和国家实施的管理。他还研究不确定性的原因和后果，以及创新和信息技术。



**拉杰·切蒂（RAJ CHETTY）**，35岁，印度和美国双重国籍，哈佛大学，23岁时获得博士学位。他将实证研究与经济理论相结合，以研究如何改善在诸如税收政策、失业保险、教育以及机会均等领域的政府决策。

**梅丽莎·戴尔（MELISSA DELL）**，31岁，美国人，哈佛大学，通过国家和非国家参与者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贫困和不安全问题，以及研究诸如政府镇压毒品暴力的改革将如何影响经济产出。



**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42岁，法国和美国双重国籍，麻省理工学院贫困行动实验室（Jameel Poverty Action Lab），其重点关注发展中经济体的微观经济问题，包括家庭行为、教育、融资渠道、健康以及政策评估。

**伊曼纽尔·法里（EMMANUEL FARHI）**，35岁，法国人，哈佛大学，宏观经济学家，重点关注货币经济学、国际经济学、金融和财政学，包括研究全球失衡、货币和财政政策以及税收。



**艾米·芬克尔斯坦（AMY FINKELSTEIN）**，40岁，美国人，麻省理工学院，研究有关医疗制度公共政策的影响、政府干预医疗保险市场以及市场失灵。

**克里斯汀·福布斯（KRISTIN FORBES）**，44岁，美国人，英格兰银行和麻省理工学院，她同时在美国学术领域和英国经济政策领域任职，将其研究应用在与国际宏观经济学和金融相关的政策问题上。

**罗兰·弗莱尔（ROLAND FRYER）**，37岁，美国人，哈佛大学，重点关注美国种族与不平等的社会政治经济学。通过新建立的经济理论和随即实验来研究经济差异。

**泽维尔·加贝克斯（XAVIER GABAIX）**，43岁，法国人，纽约大学，研究行为经济学、金融以及宏观经济学，包括企业高管的薪酬水平和资产定价。



**马修·根茨科（MATTHEW GENTZKOW）**，39岁，美国人，芝加哥大学，将微观经济实证研究方法应用于新媒体经济学，包括经济力量推动媒体产品的产生、媒体和数字环境，以及媒体对教育和市民参与的影响。

**吉塔·戈皮纳特（GITA GOPINATH）**，42岁，美国和印度双重国籍，哈佛大学，研究国际宏观经济学和贸易，重点关注主权债务、对汇率变动的国际价格响应，以及世界各种货币相对价值的快速变动。





**奥列格·伊斯特胡克 (OLEG ITSKHOKI)**, 31岁, 俄罗斯人, 普林斯顿大学, 专门研究宏观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 重点关注全球化、不平等和劳动力市场产出、国际相对价格和汇率, 以及开放经济体中的宏观经济政策。



**伊莲娜·雷伊 (HÉLÈNE REY)**, 44岁, 法国人, 伦敦商学院, 重点关注对外贸易和金融失衡的决定性因素和后果、金融危机理论, 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组织。



**乔纳森·莱文 (JONATHAN LEVIN)**, 41岁, 美国人, 斯坦福大学, 产业组织和微观经济理论专家, 尤其是在缔结合约、组织和市场设计经济学方面。



**伊曼纽尔·赛斯 (EMMANUEL SAEZ)**, 41岁, 法国和美国双重国籍,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因采用理论和实证法研究收入不平等和税收政策而闻名。

**阿蒂夫·米安 (ATIF MIAN)**, 39岁, 巴基斯坦和美国双重国籍, 普林斯顿大学, 研究金融与宏观经济间的关系。他是广受好评的《债务满屋》(House of Debt) 一书的合著者。该书构建了强大的新数据, 以描述债务是如何导致大衰退以及将继续威胁全球经济。

**阿米特·赛鲁 (AMIT SERU)**, 40岁, 印度人, 芝加哥大学, 研究金融中介和监管, 以及有关公司金融方面的问题, 包括企业内及企业间的资源分配、组织激励。

**艾米·纳卡穆拉 (EMI NAKAMURA)**, 33岁, 加拿大和美国双重国籍, 哥伦比亚大学, 宏观经济学家, 其研究领域包括货币和财政政策、商业周期、金融、汇率, 以及宏观经济度量。

**阿米尔·苏菲 (AMIR SUFI)**, 37岁, 美国人, 芝加哥大学, 《债务满屋》的合著者。他的研究将金融和宏观经济联系起来, 包括房价对支出的影响以及公司金融对投资的影响。

**南森·纳恩 (NATHAN NUNN)**, 40岁, 加拿大人, 哈佛大学, 研究经济历史、经济发展、政治经济和国际贸易。尤其是历史事件的长期影响, 如奴隶贸易和殖民统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伊凡·沃宁 (IVÁN WERNING)**, 40岁, 阿根廷人, 麻省理工学院, 宏观经济学家, 通过理论经济模型研究改进税收和失业保险政策。他还研究最适课税, 稳定和货币政策, 包括宏观审慎政策。

**帕拉格·帕塔科 (PARAG PATHAK)**, 34岁, 美国人, 麻省理工学院, 在将工程法应用到微观经济学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研究关注市场设计、教育以及城市经济学。



**贾斯汀·沃尔弗斯 (JUSTIN WOLFERS)**, 41岁, 澳大利亚和美国双重国籍, 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密歇根大学 (离开), 研究劳动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法律和经济社会学、社会政策以及行为经济学。除了研究之外, 他还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

**托马斯·菲利蓬 (THOMAS PHILIPPON)**, 40岁, 法国人, 纽约大学, 研究金融与宏观经济学之间的相互作用: 风险溢价和公司投资、金融危机和系统性风险, 以及金融中介的演变。

您认为还应该将谁列入此名单之中? 您可以通过写信, 或者更好的方法是登陆《金融与发展》Facebook 主页, 留下您的建议并参与讨论。■



**托马斯·皮克迪 (THOMAS PIKETTY)**, 43岁, 法国人, 巴黎经济学院、巴黎高等社会科学学院, 因与伊曼纽尔·赛斯 (Emmanuel Saez) 对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共同研究而闻名。他的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指出, 全球不平等将会加剧, 因为发达经济体的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 使财富不均进一步恶化。

# 构建全球化

马丁·沃尔夫

如构建得法，  
全球化能够带来空前的和平与繁荣；如构建不当，将会招致危机与灾难

全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主题。它不仅是对经济的构建，也是对社会、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构建。

很多人认为，无论其结局是凶是吉，全球化都是不可阻挡的力量。但从历史经验来看，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全球化会持续下去，也不能假设它在各个方面都能尽如人意。但我们必须有这个共识：全球化的构建需要我们的共同努力。

如能妥善实现全球化的构建，本世纪将会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和平、协作与繁荣的时代。如处理不当，整个世界就会彻底瓦解，重现1914—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局面。

全球化是跨国经济活动的一体化。此外还伴有其他形式的一体化，尤其是

人口的流动及观念的传播。技术、机构和政策，这三种相互作用的力量共同成就了全球化。

纵观历史，技术和知识的创新是全球化背后的驱动力。它降低了运输及通信的成本，增加了远距离盈利型经济交流的机会。从长远来看，这些机会将会得到充分的利用。

甚至早在工业革命以前，人类驾帆船航海的能力促进了全球帝国、远洋运动及全球贸易扩张的诞生。但是，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变革的步伐越来越快，不断创造新的机遇。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推进全球化的动力是蒸汽机车、轮船和电报。当今时代，全球化的推动力是集装箱船、喷气式飞机、互联网和移动电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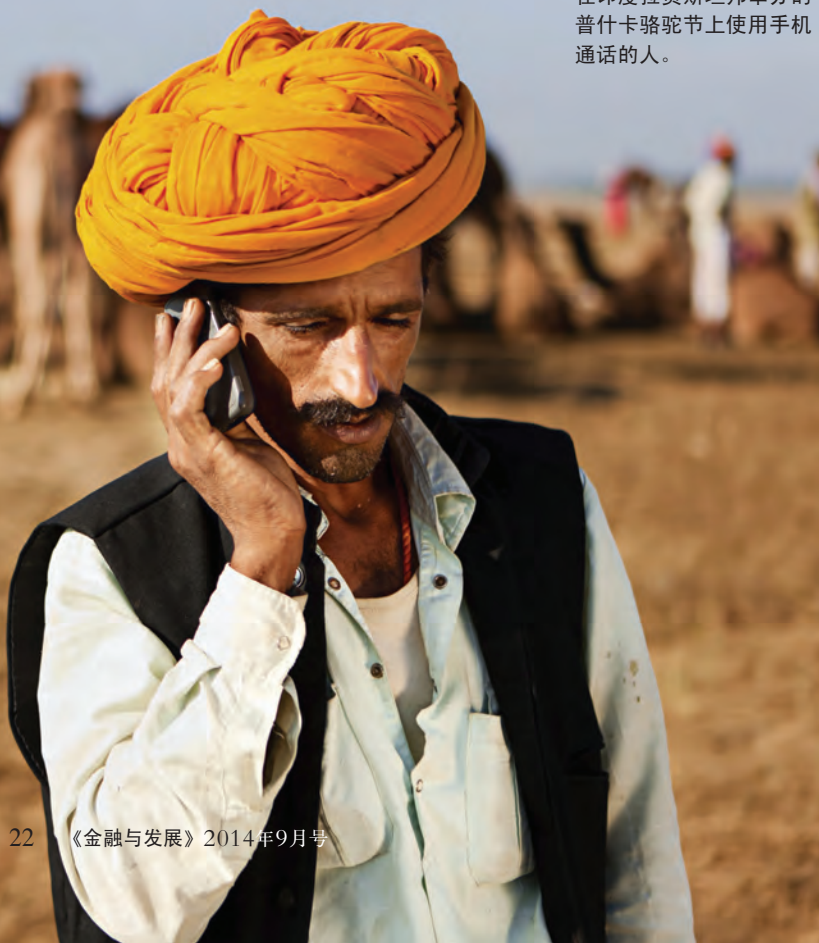
通信技术与计算机应用的结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技术变革。到2014年，全球每100位居民中有96位为移动电话用户，40位为互联网用户。20年前，这两类用户的人数都不多。信息越来越朝向数字化发展，世界各地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这是一种革命性的转变。

机构同样很重要。回顾历史，帝国推动了远距离贸易的发展。进入现代之前，情况确实如此，尤其是16—20世纪的欧洲海上帝国。当今时代，推动远距离商业往来的机构是协商和多边组织：WTO、IMF和欧盟等区域组织。

半公开和纯私有机构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特许贸易公司，尤其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以及19世纪起出现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有组织的市场也是非常重要的机构，特别是金融市场，已经从初期的简单服务发展到如今提供24小时服务的全球化网络。

技术之矢已经转移方向——朝着经济一体化的机会前进——但我们的机构并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帝国的繁华已

在印度拉贾斯坦邦举办的普什卡骆驼节上使用手机通话的人。





经落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帝国不复存在，大部分新独立的国家以其具有剥削性为由拒绝了国际商业交流。

这就需要第三个推动力——政策。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在政策上自给自足的倾向是一种倒退。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倒退是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后全世界范围的全球化的瓦解。金融秩序随即分崩离析，贸易活动受到的限制越发严格。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的支持下，有限的自由化在高收入经济体蔓延，主要表现在贸易和经常账户方面。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和90年代，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国内市场自由化、国际贸易的开放和外汇管制的放宽。

这个历程中最关键的步骤包括：70年代末中国在邓小平领导下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出任英国首相，1980年罗纳德·里根出任美国总统；1985年欧盟发布“单一市场”计划；1986年开始，历经八年才结束的多边贸易谈判的乌拉圭回合；1989—1991年苏联解体；印度在1991年外汇危机后开放国门；1992年成立欧洲货币联盟；1995年WTO的成立；2001年中国加入WTO。

## 拥抱市场

在这些变革的背后，是对中央计划经济和自给自足政策的拒绝，是对市场、竞争和开放的接受。这不是全球帝国，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通过一体化的世界经济连结了众多以经济繁荣为共同目标的独立国家的活动。

虽然尚不完善，但它发挥了作用。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4年）的数据表示，就在大衰退到来之前，商品、服务和资金的流动占全球总产出的比率从1980年的24%增长到2007年的峰值——52%。1995—2012年间，商品贸易占世界产出的比率从16%上涨到24%。

实际上，所有经济体都放宽了对贸易的限制。金融危机期间经济骤降之前，中国商品贸易（包括进口和出口）占GDP的比重从上世纪70年代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水平增长到1996年的33%，到2006年已增长到63%。印度贸易额与GDP的比率从1996年的18%增长到2008年的40%（见图1）。

贸易扩张的重要驱动力是新兴经济体中低成本劳动力的可利用性。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最大的机遇是将未开发的地区（尤指美洲）纳入面向全球市场的生产当中。而这一次，最大的机遇是将从前相距遥远的亿万劳动者联结起来，然后是消费者和储户。

新兴经济体参与的贸易活动迅猛发展。1990年，60%的商品贸易发生在高收入经济体之间，另外34%

商品贸易集中在高收入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之间，而新兴市场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活动只占6%。2012年，以上比值分别调整为31%、45%和24%。

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核心参与者。这一点单从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增长即可显示出来，FDI带来了企业跨境所有权。1980年，FDI很少，可以忽略不计。如今，FDI不仅是巨额资本流通（2005—2012年，平均占全球产出的3.2%），还是稳定的资本流通。事实证明，它起到了三重作用——它是知识转移的来源、推动跨境经济一体化的媒介以及稳定的融资形式。

## 人们与本国同胞间的贸易交流比与外商合作更多。

金融领域的其他方面远远谈不上稳定。2007年，跨境资金流动占全球产出的21%，达到最高点，2008年降至4%，2009年至3%。随后，接连出现适度的经济复苏。但直到2012年，跨境贷款、债券保险和有价证券流动仍未恢复至危机前的水平。跨境贷款的主要来源是银行，非常不稳定，危机中通常都会如此（见图2）。

在贸易、金融和通信迅速发展的同时，人口的流动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尽管如此，国际旅行者、留学生的数量明显增加，移民的实际增长速度也几乎与全球人口的增速同步——但实际收入方面仍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贸易和资本的流动代替了人口的流动。从贫困国家向较富裕国家移民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压力，尤其在格兰德河和地中海沿岸地区。

另外，全球化意味着跨境经济活动的不断增多。但提到经济的繁荣，情况就复杂得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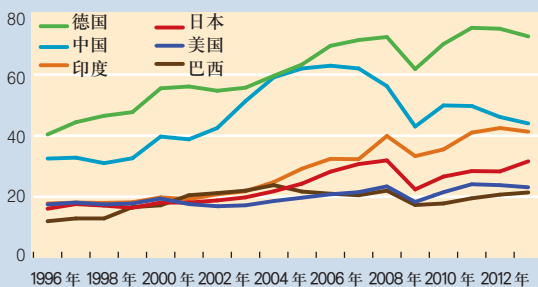
全球化时代推动了经济活动区域的快速转变。按购买力平价（简称PPP，在各国购买同样数量的商品

图1

### 开放

2008年全球经济衰退前，世界大型经济体的贸易开放程度日益上升。

（商品贸易，占GDP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库（201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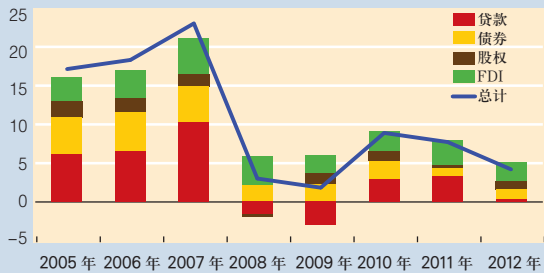
注：商品贸易包含一个国家所有的出口和进口。

图2

## 变化无常的金融业

除外国直接投资外，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几年中，跨境金融高度不稳定。

(资金流动，占全球GDP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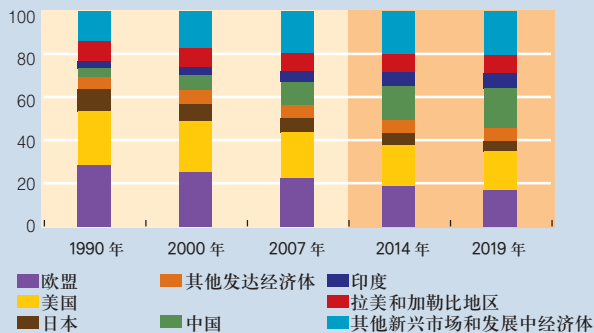
注：FDI是指外国直接投资，包含企业的外资所有权。

图3

## 力量转移

包括美国与欧盟在内的发达经济体占世界GDP的份额在不断缩小，而中国和印度的份额则在不断增大。

(占全球GDP的份额，百分比)



资料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2014年4月。

注：2014年和2019年数据为预测值。GDP的测量依据是购买力平价——在各国购买同样数量的商品和服务时需转换的货币的汇率。

和服务时需转换的货币的汇率)衡量，1990年高收入经济体的份额占全球产出的70%，其中欧盟占28%，美国占25%。根据IMF的预测，2019年高收入经济体的总份额将下降至46%。

同一时期，预计中国所占份额将从4%增长到18%，印度所占份额将从3%增长到7%。如果不参与贸易，不采用全球化带来的技术，大部分取得成功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就不可能实现快速发展，进而引发这场变革（见图3）。

此外，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生活水平趋同状况（见图4）。与美国相比，预计中国的人均GDP将从1980年的2%增长到2019年的24%。无论以哪种标准衡量，这都是非凡的成绩。按购买力平价预测，2019年中国人均GDP高于巴西，中国将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印度也同样表现出这种趋同性，但范围较小。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也有不俗的表现。但预计到2019年，相较于美国，巴西和墨西哥比1980年时更加贫困。事实证明，

要抓住全球化的机遇并非易事。

## 普遍贫困有所下降

全球化的时代实现了普遍贫困的显著下降，主要原因还是中国。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每日生活在1.25美元以下的人口比率已有所下降，从1981年的77%下降到2008年的14%（World Bank, 2014年）。南亚地区极端贫困人口比率从1981年的61%下降到2008年的36%。但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1981年极端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51%，到2008年，此比率仍高达49%。

最终，全球化还涉及不同国家间及国家内部收入分配方面的复杂变化。世界银行的布兰科·米兰诺维克（Branko Milanovic, 2012年）认为，全球个体之间的不平等程度在全球化时代大体保持不变，相对于富裕国家，一些大型新兴经济体为提高其平均收入而取得的成就被大部分经济体中不断加剧的不平等所抵消。他还表示，1988—2008年全球收入分配排名前5%的经济体享有最大的实际收入增长，前1%的经济体享有巨额收入增长。来自底层经济体的收入分配排在第10个至第70个百分位数的经济体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然而，有两个群体在收入分配方面的表现相对较差——底层的10%，这是世界上最贫困的群体，以及来自底层的第70个至第95个百分数位，他们是高收入国家中的中低收入群体。因此，全球范围内实际收入的有益增长与许多高收入国家不断加剧的不平等相关联。原因很复杂，但全球化无疑是原因之一。

未来的前景如何？

技术将会继续推动一体化的发展。很快，几乎每个成年人，还有许多孩子都很有可能会拥有一部智能移动设备，以便他们及时地查看全球网络所提供的所有信息。这将使所有可数字化的事物——信息、金融、娱乐和许多其他事物的传递基本上实现零成本。这必然导致信息交换的激增。

虽然技术领域中的一部分正在飞速的发展，但其他方面（如商品和人员的运输成本）并未显著降低。这说明与商品或人相比，技术进步将会为理念和信息的交流带来更多的机会。

机构和政策的明天更加难以预料。

最明显的机构和政策失败也许一直存在于自由化、全球化的金融管理之中。具体如下：1970年至2011年间共发生147次银行业危机（Laeven和Valencia, 2012年）。其中，部分具有全球性影响，尤其是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2009年的经济大衰退，以及随后出现的欧元区危机。这些冲击造成了巨额经济和财政损失。尽管我们已为建设更稳固的金融体系、更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制度做出努力，但并不



不能保证会取得成功。

## 浮动汇率

货币制度与金融秩序的混乱密切相关。自1971年以来，全球货币制度一直采用某种形式的浮动汇率制度，由美元占据主导地位。事实证明这是可行的，但同时也是非常不稳定的。有许多人控诉这种制度放任美国利用政策给流向或来自不幸的局外人的资本造成不可预测且无法控制的变化。然而，不受欢迎的浮动美元标准有可能会持续下去，因为目前没有和其他货币和全球性的管理方法有望指导我们所需要的一致性，至少近期没有。

目前在高收入经济体中，贸易政策已经相对稳固，重新陷入保护主义的风险已得到了很好的控制。然而，为完成多边贸易谈判多哈回合所做出的努力基本上已经失败，雄心勃勃（且颇有争议）的多边贸易协定计划前途未卜。贸易自由化的高潮或已退去，而世界商品贸易的增长也可能会永久性地放缓。

一些国家政府正在设法控制互联网的发展。但这一努力可能不会阻止商业活动的传播，尽管它可能会限制公民接触令人不安的政治观点的途径。同时，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在未来若干年中很可能只增不减。

在经济体之间相互联系越来越紧密的同时，政府也在持续地提供保障、实施法律、监管商业、管理货币。商业自由交流的地方，受到影响的管辖区不只一个，当然有关各方必须遵守交易所在地的法律和规章制度。

在我们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中，经济和政治维度间的反差是不可预见性的根源。贸易交流越多，就有更多的国家必须同意机构和政策上的深度合作，欧盟的表现非常明显。这种一体化也会带来矛盾，欧元区危机已经验证了这一点。同等程度的一体化对如今的许

多国家来说仍然是不可想象的。

由于这些原因，全球化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受限。人们与本国同胞间的贸易交流比与外商合作更多。空间距离是部分原因。同时还存在相互信任和透明度的问题。边境问题很重要，并且在未来仍会如此。

最终，政府必须同意这种开放。在开放的同时，他们会考虑国内的政治现状。在一个众多国家面临增长缓慢、不平等加剧的世界里，尤其是在高收入国家，无法确定这种同意意见能否持续下去。人类的种族意识始终存在，国与国之间仍然是竞争对手。

1910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全球化的顶峰时期，英国政治家和记者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在撰写的《大幻觉》（The Great Illusion）一书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战争没有任何经济价值。他是对的。理智上，几乎所有国家的首脑都同意这一点：冲突无法促进国家的繁荣。但是，1914年的战争证实，战争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并不能保证人类会从此避免战争，尽管核武器已将冲突的代价提升到了不可想象的高度。

虽然大国间仍维持着和平的关系，但要实现深度一体化的、繁荣的世界经济所需要的国家间的合作可能无法维持下去。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设法应对西方国家的经济衰退和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的崛起。从历史经验看，在短期到中期内，无论技术还是经济学都无法保证全球化的未来；只有政治决策可以。明智地把握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

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是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兼首席经济评论员。

参考文献：

Laeven, Luc, and Fabián Valencia, 2012, "Systemic Crises Database: An Update," IMF Working Paper 12/163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14, Global Flows in a Digital age: How Trade, Finance, People, and Data Connect the World Economy (Seoul, San Francisco, London, Washington).

Milanovic, Branko, 2012, "Global Income Inequality by the Numbers: In History and Now—An Overview"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6259 (Washington). <http://elibrary.worldbank.org/doi/pdf/10.1596/1813-9450-62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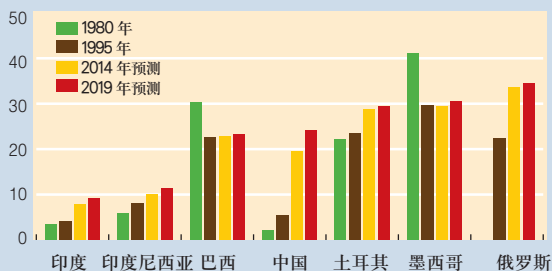
World Bank, 2014,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ashington). <http://data.worldbank.org/sites/default/files/wdi-2014-book.pdf>

图4

### 不断趋同的生活水平

自1980年起，相对于美国的情况而言，一些（远远不是全部）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已提高了其人均GDP。

（人均GDP，占美国人均GDP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2014年4月。

注：GDP的测量依据是购买力平价——在各国购买同样数量的商品和服务时需转换的货币的汇率。国家的顺序根据2019年人均GDP预测值从低（印度）到高（俄罗斯）排列。

# 关注、灵活、服务

IMF成立于70年前，通过不断调整自身来适应可直接影响全球经济的最新挑战以此始终忠实其使命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  
(Christine Lagarde)  
是IMF总裁。

IMF 的独特性在于其具备调适自身以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IMF 始建于二战末，其目的是通过合作与一体化来确保经济稳定和繁荣。事实证明，在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签订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设计是一卓越功绩，主要表现在此协定经得起时间检验，以及多年来使得 IMF 有足够的灵活性应对成员所面临的多种形式的挑战。

最初 IMF 致力于二战后的欧洲重建工作。在此之后，IMF 转而帮助那些新独立的国家，协助它们在摆脱殖民统治后可以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争得立足之地，并且随着冷战铁幕的落下，因其协助前共产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从而使得其成员数量增加。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原固定汇率系统瓦解，IMF 帮助全球经济适应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此后，IMF 还支持不同区域成员战胜各类金融危机，如 20 世纪 80 年代的拉美金融危机、90 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21 世纪初再一次爆发的拉美金融危机以及大衰退时的全球经济复苏。

## 前所未有的危机应对反应

最近的危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 IMF 也通过早期呼吁全球财政刺激，大规模的金融支持，为低收入成员提供零息贷款等新工具，以及为中等收入成员提供防范危机的保险等形式进行应对。同时，在能力建设方面 IMF 也是一个深受其成员欢迎的合作伙伴：近些年所有成员都有向其寻求技术咨询

和培训课程的需求。

此次危机促使 IMF 重新思考其分析和调适其政策建议。IMF 更加清楚地看到日益增长的全球经济的互联性，以及意识到一个国家的政策是怎样通过经济和金融的外溢性影响其他国家的。风险和脆弱性分析目前是 IMF 监督工作中的重点，而跨国工作经验是其政策建议的品质保证。

## 展望未来

短期来看，IMF 将继续帮助其成员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一系列影响，特别是低经济增长率和高失业率。

在财政政策方面，关键是通过协调经济增速以及对居民生活产生的影响来减少沉重的公共债务负担。在货币政策方面所面临的挑战是采取“新的标准”——在破坏最小的情况下，摒弃过度灵活的和非传统支持。对于金融部门，目标是促进和支持那些能够确保经济体系更加安全、完善和更加具服务导向性的改革得以完成。

长期来看，激动人心的信息与通讯技术的进步将促进金融一体化朝着一个尚未量化的规模发展，并且延伸到世界上还未触及的角落。深化金融一体化将促进增长和增加风险。经验表明，更大程度的一体化将增加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和规模。因此，更需要完善 IMF 预防危机的工具和加强其对解决危机的支持力度。

随着全球贸易和更大宗的资金流动，新的经济和金融中心的出现最终可



能导致全球金融体系新模式，替代40年前以黄金为基准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新的多边机制必定有能力与更广范围的经济体合作，并很可能提高用来稳定区域经济的现金准备金上限额度。作为全球货币体系最主要的监护机构，为了更好地为成员服务，IMF必须继续关注自身使命，且保持方式灵活，使其机构改革适应世界经济。

IMF的指导准则中将继续保持关注、灵活、服务的宗旨。

除了金融领域，IMF成员国将不得不对大量涌现的其他重大挑战：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严重的气候变化，以及在很多地区的经济生活中仍存在的性别歧视。

## 减缓收入不均

日益增长的贫富差距是当今经济中最突出的问题。据我们已有的数据表明，30年来在全球26个国家中的24个里占人口数量1%的富人的收入均有所上升，特别是在很多发达经济体中，收入不均已达到了镀金年代时期的水平。

IMF近期一项对173个国家在过去50年间的研究表明，越是收入不均的国家的经济增长越是缓慢。

因IMF更加关注增长和稳定，因此对极度的收入不均表示担忧。通过转移支付、所得税等财政政策能有效地减少社会差距，以及保持优先向教育、医疗方面增加投入。关键是要进一步优化IMF的监督和贷款项目的设计。

## 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气候变化已经成为21世纪阻碍可持续增长和繁荣的第二个重要问题。伴随着平均气温的升高，更频繁的自然灾害、波动更大的农业产量以及更严重的粮食和水不安全的风险也在提升。气候变化将使最贫困国家本就脆弱的状态更加恶化。

再者，气候变化对增长和稳定有着重要的影响，对IMF也是如此。使价格回归正常是解决方法的一个重要部分，包括所有外延商品的价格。这将有助于减少对当前产生的破坏，并刺激对未来的低碳技术的投资。

废除能源补贴是解决方案的重要部分。多数情况下，不良的政策选择导致恰恰是那些正在毁灭地球的生产活动得到了政府的补贴：仅2011年对化石燃料开采进行的直接补贴和税收减免就有近2万亿美元。更糟的是，大部分补贴使相关富人受益。因此，我们在缓解气候变化和减少贫困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 增加女性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

由于收入不均和环境恶化对增长和稳定的威胁日益逼近，全球经济将需要通过其他途径注入活力，其中包括让女性更多地参与到劳动市场当中。从人口统计资料来看，这一点尤其重要，更多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当中可以抵消老龄化所引起的增长缓慢的影响。

## 危机促使IMF重新思考其分析和调适其政策建议。

任重而道远。虽然女性占全球一半人口，但在可测的经济活动的参与人数中占比远远不到一半。劳动力参与方面的性别差异是全球普遍存在的——差距程度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体的12%到某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区域的50%。在中东和北非或者南亚，消除这些差距可使人均收入增加25%。

这就是IMF对两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平等参与的各项政策给予支持的原因。再者，通过公共资助的产假制度，提供负担得起的高质量的儿童保育以及低收入员工的税收优惠等财政政策在应对此问题方面非常重要。发展中经济体的政策通常集中于提高高质量的医疗、教育以及金融服务的获取。

收入不均、气候变化以及劳动市场对女性的排斥，这些问题越来越威胁到IMF成员国的宏观经济健康。在此方面，应对这些问题是我们工作中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在这些领域与其他国家展开有效的合作，寻找出可以直接帮助解决问题的大量方法。

## 代表性与治理

20年或30年后，世界经济的格局将不会如此集中在发达经济体，而是更多分散在所有区域。IMF必须在这些转变中更具代表性，以此来保持与世界经济体的相关性。作为一个拥有188个成员国家，为75亿全球公民服务的机构，其治理需要保持代表性并忠实于章程。

短期来看，这意味着批准于2010年IMF的改革必须尽快完成，其中包括第14届份额审核。长期看来，这将有助于保证IMF有足够的资源和合法性继续完成其确保全球经济金融制度稳定的使命。■

# 危机 潜藏之地

奥利维尔·布兰查德

最近的金融危机教会我们去关注那些经济可能会严重失调的黑暗角落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日益将产出和就业的经济波动视为良性。危机表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而且需要作深度的再评估。

这种良性观点反映了多年来经济的内部因素和外部经济环境似乎的确日益变好。

先说内部因素。我们所采用的方法对我们思维的影响是深远的且不易觉察。在危机发生前几十年里，宏观经济就是这种情况。这些方法最适用于经济波动的发生是有规律的且基本上能自我调节这样一种世界观。问题是我们开始相信世界确实就是这样运转的。

要理解这种观点是如何产生的，我们需要回到20世纪70年代所谓的理性预期革命。它的主要观点是个人和企业的行为不仅取决于当下的经济现状，同时也取决于他们对未来的预期。这一观点并不新颖，而新颖的是在假设个人和企业会尽最大努力去评估未来的前提下，形成一套方法去求解这类模型（大概看一看为什么这种观点有技术上的困难：个人和企业当前的决策取决于他们对未来的整个预期，但他们对未来的整个预期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又取决于当前的决策）。

然而，这种方法只在经济波动有一定的规律并且非常简单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如果经济波动有一定的规律，当个人和企业（以及将统计学应用在经济学上的计量经济学家）回顾过去时，他们就能理解这些事件的本质和对未来形成预期，如果经济波动非常简单，小的冲击会有小的影响，双倍的冲击就有双倍的影响。这种假设的理由称作线性关系，有点技术性：非线性模型——那些小冲击能产生大影响（诸如房价下跌）的模型，或者那些冲击的影响需取决于经济环境的其他因素的模型——十分不容易在理性预期下去求解，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

对宏观经济学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受到那些假设的影响。我们这一行通常认为经济大致上是线性的，常常受不同冲击的影响，不断波动，但自然地都会回归常态。我们愈来愈多地使用“商业循环”这个词，而不谈波动。尽管我们后来已制定出方法去解决非线性的问题，但这种波动的良性观点仍是主流。

然而，如果没有外部因素的作用，这种情况不会形成（或者至少不会持续那么久）。这个世界的现状，起码以经济领域来说，让宏观经济学家缺乏质疑其世界观的动力。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大部分发达经济体都经历了所谓的“大缓和”，产出及其主要构成部分（诸如消费与投资）的波动都稳步下降。对于这种稳定的成





因至今依然有不同观点。中央银行对此乐于居功，并且更好的货币政策确实可能减少了部分波动，从而导致通货膨胀波动更小且次数更少。其他人则认为运气（如经济受到非常小的冲击）是造成下降的一部分原因。不论是什么导致大缓和，过去的1/4个世纪里，这种波动的良性和线性观点看来是没有问题的。（这是主流观点。但一些研究人员不接受这种前提。已故的剑桥大学知名的经济学家弗兰克·哈恩（Frank Hahn）经常提醒我对线性模型的厌恶，这也包括我的在内，他把它们称为“米老鼠”模型。）

## 黑暗角落

经济学家并没有完全忽视那些有时会引致巨大后果和能使情况变得很糟的小冲击。但人们认为这都已经过去了，并且不会再生，或者至少不会在有着稳健经济政策的发达经济体里发生。

即使是一些小的冲击，或者根本没有任何冲击的时候，银行挤兑也会导致储户恐慌，从银行取走资金，进而对整个经济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这常为宏观经济学所津津乐道。但在宏观经济学里，人们常以此来解释引进银行存款保险是如何在最大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的。如果问题再次发生，有观点认为，中央银行可能会在有良好担保的前提下快速为银行提供流动性（借钱给银行），从而让有偿付能力的银行满足储户，缓解恐慌，避免灾难的发生。

资金流入突然停止——在流入一国的资金日渐枯竭的情况下，所有投资者试图马上撤资——也不能忽视。这种情况仍然经常发生在新兴市场经济体，如20世纪80年代的拉丁美洲，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墨西哥和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亚洲。但这些都视为新兴市场的问题，而不是发达经济体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本文的第一段写上“美国”）。作为美国主流宏观经济学主要特征的一个例子，一些学生可能专攻宏观经济学博士班的课程，而不知汇率为何物，更别说什么新兴市场经济体了。

总而言之，流动性问题——长期资产与短期债务之间的潜在错配——并不被认为是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这样的资产—负债流动性错配可能极为普遍，不仅使银行受到影响且波及其他金融机构和公司，而且人们没有很好地理解这种错配。已对流动性在公司融资领域发挥的作用进行了重点研究，但其与宏观经济分析的整合尚未提升到主流地位。

中央银行想把名义利率降到零以下，但无法做到的几率非常小（名义利率不能降到零以下，因为如果降到零以下，人们宁愿持有现金而不是债券——即术

语所谓的“零下限”制约）。危机之前，名义利率大概是4%（其中2%为通货膨胀，另外2%是通胀调整后的实际收益率），大多数中央银行相信他们在应对负面冲击时仍有很大的操作空间去调整利率。有观点认为，如果需要进一步采取措施，中央银行可以保持名义利率为零而同时提高通胀预期，这样就可以降低利率的实际部分。

人们也意识到了其他非线性因素。比如，经济学家认为银行监管的限制，诸如这些机构需要持有的最低资本金（本质上是指银行的净资产；即吸收损失的能力），会使银行在降低资本时比增加资本时的反应更快。当企业和家庭的信用额度快要用完时，他们面临的信贷限制会使其采取更加谨慎的行为。人们想出了这种方法并将其用于研究个人消费行为等用途。但这些非线性因素又没有被认为是波动的核心要因。

**我们都知道那些“黑暗角落”的存在……但我们总觉得可以最大程度地忽视它。**

简而言之，小冲击会产生巨大的不良后果，或者会引发长期并且持续衰退，这一概念并不是主要问题。我们都知道那些“黑暗角落”的存在——出现经济严重失调的情况。但我们总觉得那离我们很远并且可以最大程度地忽视它。日本就很不幸地身处其中，这一发达经济体长期遭受衰退和通货紧缩。然而，这种情况通常都被解释为是政策失误的结果，而不是难以解决的问题所导致的。

## 毫无防备地受到危机的打击

此次危机的主要教训是我们其实要比想象中更接近那些黑暗角落——而那些角落则比我们想象的更为黑暗。

大缓和不只蒙蔽了宏观经济学家。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同样低估了风险。结果就是金融结构越发受到潜在的冲击的影响。换言之，全球经济的运行越来越接近那些黑暗角落，而不为经济学家、政策制定者和金融机构所察觉。

当美国的房产泡沫破灭时，复杂而不透明的金融债权架构引发对哪些机构拥有什么债权以及哪些机构有偿债能力的担心。而这导致了大规模的流动性危机，与银行相比而言，它更多地影响了众多非银行金融机构，譬如投资银行——它们当中有很多多年来像银行

一样运营，但却没有受到像银行一样的监管和保护。一般的银行存款保险并不能满足所需。

若要为相关机构提供足够的流动性让其能满足债权人的要求，需要大规模运用创新的货币政策。幸运的是，已大规模采取经常创新的货币政策。但这仍然不足以避免大量的信贷枯竭以及需求和经济活动的急剧下降。

采取财政政策，以大量增加公共支出的形式来抵消私人需求的下降。但政府债务水平的急速上升引发了政策制定者和投资者的担忧。许多国家的可预见的主权债务风险（政府不履行其债务的可能性）有所增加，而在危机之前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这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使得运用财政政策去维持需求变得愈加困难，而与此同时又为债权人的资产负债表制造了风险，譬如那些持有主权债务的银行。

在公共债务与私人债务之间形成的所谓“魔鬼循环”：弱势政府削弱了在资产组合中持有政府债券的银行；而被削弱的银行需要更多资金，这通常来自于公共资金，从而进一步削弱政府。

由于中央银行试图采用降低政策性利率（比如，美国的隔夜拆借联邦基金利率）来维持经济活动，这样很快就达到零下限，结果我们卡在那儿已经五年多了。决策者未能成功地提升通胀预期，来使其进一步降低有效实际利率。欧元区依然弥漫着通货紧缩的风险，并且在部分欧元国家这已经成为现实。通货紧缩提高了公共与私人债务的实际价值，从而使债务偿付

加重并迫使债务人减少开支，其结果是经济活动减少——开始了新一轮“魔鬼循环”。

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宏观经济政策的要务之一就是慢慢地、稳步地把债务降到危险程度较小的水平。

在这样的环境中，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已有着一点魔法的味道。一些政策，比如最近欧洲央行的举措是减少银行放在这里的存款手续费（换言之，一个小小的负利率），表面上看，这没什么实质效果。然而，如果我们认为这代表着央行下定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正如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基（Mario Draghi）在2012年一次著名的演讲上所说——刺激放贷，这样就能有更大效果。然而，这在心理上所产生的效果有多大却是极难预估和控制的。

## 何去何从？

这次危机有一个明显的政策启示：官方应该把远离黑暗角落作为政策——宏观经济、金融监管或宏观审慎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

我们仍然距离那些角落太近。危机本身导致大量的公共和私人债务积累。当前，“魔鬼循环”已经消退，但一个小小的负面冲击就能让它再次发生。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宏观经济政策的要务之一就是慢慢地、稳步地把债务降到危险程度较小的水平，从而远离那些黑暗角落。

然而，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

如果金融体系能透明一些，如果资本充足率能高一些，虽然2007—2008年的美国房地产危机仍有可能发生，但其影响可能有限——最坏的情况可能就是造成美国的一次温和衰退，而不是一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金融体系能不能更加透明和稳健？答案是肯定的。官方已要求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这是防止金融体系瓦解的一条基本防线。但银行只是整个复杂的金融机构与市场网络的一部分，而风险还远未离去。金融监管的现状是，新的规则会带来新的监管套利的途径，因为机构会发现政策中的漏洞。这就迫使监管机构如猫捉老鼠般不断订立新的监管法规（在一只灵敏的老鼠和一只不太利索的猫之间）。远离黑暗角落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而非一次性监管。

宏观经济政策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危机前名





义利率较高，则货币政策操作空间更大。如果通货膨胀和名义利率在危机前能高出两个百分点，中央银行就能在达到名义利率零下限之前将实际利率降两个百分点以上。多出来的两个百分点不容忽视。它的效果大致与在达到零下限时中央银行所采用的非传统货币政策带来的效果相同——通过购买私人部门资产和长期政府债券来降低长期利率，而不是用操纵短期政策性利率的标准手段（前IMF研究部门主管、哈佛大学教授肯尼斯·S. 洛戈夫 [Kenneth S. Rogoff] 建议采用不同于提高通货膨胀的方法，比如以电子货币取代现金，这样就可以支付负利率。从而消除零下限的限制。）

从政策方面转向研究方面，这应该让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现在我们比较关注非线性因素及其带来的危险，我们应该从理论和实证上用各种各样的模型去进一步探讨。而这一切正在进行，并且从危机开始以来源源不断的研究报告来看，是在大规模地进行。可喜的是，尤其是金融学与宏观经济学的整合度更高。

但是这个答案绕开了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应该怎样去调整我们的基准模型，即我们在IMF里正在使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CE）模型来考虑备选方案

以及量化决策的效果？答案中简单且无争议的部分是，应该进一步拓展DSCE模型，从而更好地识别金融体系的作用——这已经开始在做了。但这类模型是否可以描述经济如何在那些黑暗角落里运行？

让我提供一个务实的答案吧。如果宏观经济政策与金融监管的目标是与黑暗角落保持一个安全距离，那么我们的模型在描述正常状态时在很大程度上仍十分合适。我们可使用另一类以衡量系统风险为目标的经济模型来给出太接近黑暗角落时的警告信号，从而必须采取行动来降低风险和拉远距离。以目前的专业概念和技术水平去尝试建立一个模型来整合正常状态和系统风险可能还有一段距离。

这次危机非常难熬。但可喜的是，它撼动了宏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政策。主要的政策教训很简单：远离黑暗角落。■

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是IMF的经济顾问、研究部门主管。



COLUMBIA | SIPA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 PROGRAM IN ECONOMIC POLICY MANAGEMENT (PEPM)

Confront global economic challenges with the world's leading economists, policymakers, and expert practitioners, including Jagdish Bhagwati, Guillermo Calvo, Robert Mundell, Arvind Panagariya, and many others.

A 14-month mid-career 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focusing on:

- rigorous graduate training in micro- and macroeconomics
- emphasis on the policy issues faced by developing economies
- option to focus on Economic Policy Management or International Energy Management
- tailored seminar series on inflation targeting,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financial crises
- three-month capstone internship at the World Bank, IMF, or other public or private sector institution

The 2015–2016 program begins in July of 2015. Applications are due by January 5, 2015.

pepm@columbia.edu | 212-854-6982; 212-854-5935 (fax) | [www.sipa.columbia.edu/academics/degree\\_programs/pepm](http://www.sipa.columbia.edu/academics/degree_programs/pepm)  
To learn more about SIPA, please visit: [www.sipa.columbia.edu](http://www.sipa.columbia.edu)

# 新兴力量

杰弗里·鲍尔

去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一位部长将美国石油产出的不断增加称为其组织的一个“严重忧虑”。今年春天，巴克莱银行将美国电力行业的债务降级，并发出警告称，屋顶太阳能电池板的普及率不断提高，这种情况“可能会扰乱现状”。同时，西方国家的煤炭生产商库存积压，但国内需求不振，只好到遥远的亚洲来寻求市场机会。

由于新能源技术的不断涌现和供应量的爆炸式增长，新的能源革命目前正在对整个世界产生巨大影响。这与之前半个世纪中所发生的能源转变大相径庭，之前的那次转变是由严重的供应危机引起的。资源新贵们在全球各地不均衡地涌现，他们现在已经产生了深刻的、纷纭复杂的地缘政治和环境影响。到目前为止，其最显著的影响是经济层面的：当前新能源供应对重要厂商产生的威胁至少不亚于过去能源危机的影响。从化石燃料产量的迅猛增长到可再生能源的兴起和繁荣，再到各种先进设备和商业模式的大规模推广以降低能源浪费，21世纪的能源新贵们目前所做的正是他们通常所做的，即动摇旧的经济秩序。

事实上，尽管这些新的能源供应不断出现，全球还是面临着根本性的能源危机。发展中国家的能源需求不断上涨，这在中国尤甚。这对全球石油产出带来了极大压力并使石油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如果全球经济活动回暖，这一能源压力还将更加凸显。与此同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将持续增加，主要原因在于煤炭和其他化石燃料依然是主要的全球燃料来源，而且这种情况可能在未来的许多年中都无法改观。

不过，在某些区域，资源新贵们已经开始重塑能源格局：他们将全球石油生产重心向西移动，从中东移至北美；同时，将羽翼未丰的可再生能源行业重心东移，从欧美移至中国。他们在有些情况下能够降低碳排放，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则会使排放情况更加恶化，这意味着他们对当前显著的环境问题——气候变化——的影响将在未来的许多年中无法预知。在这期间，资源新贵的不断出现始终对过去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能源集团的净利润产生威胁，这些能源利益集团包括 OPEC、领先的电力生产商以及跨国制造商。所有这些能源利益集团都在竭尽全力去适应这一局面以避免遭遇失败。

## 继续推进

从历史上看，能源转变的出现基于两个原因。有时是由于主要能源资源已经枯竭，这是一种推动作用；有时是由于出现了更好的能源来源，这属于一种拉动作用。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社会正是在这两种作用之下从木材能源转换至了煤炭能源，并实现了社会的工业化。当时，森林资源已近枯竭，之后他们发现了煤炭这种能量更高的燃料用于工厂生产更加富有效率。到了 20 世纪早期，英国海军又在上述拉动作用下，实现了从利用煤炭到利用石油的转变，这一决策后来又推动了民用运输行业也进行了这一转变：这是因为被誉为“黑色黄金”的石油比起有如岩石一样笨

日出时分，美国堪萨斯州林肯附近的风力涡轮机。

各种新能源的  
供应正在重塑  
当前的经济局  
势，在全球范  
围内产生了赢  
家和输家



重的煤炭的能源更加密集、更加清洁、也更加易于运输。

20 世纪下半叶，大规模的能源转变均是出于推动作用的影响，是对政治因素所导致的供应限制的应对。在二战中，德国和日本的主要城市被盟军的炮弹夷为平地，而这两个国家历史上都是需要进口大部分所需能源的国家。这两个国家在重建其城市基础设施的时候考虑到了能源效率的问题。20 世纪 70 年代发生阿拉伯石油禁运之后，当时缺乏化石燃料供应的国家发起了全国性的大规模运动以提高可替代能源电力的产能。法国转向核能，巴西开发乙醇，而丹麦则推动了风电的发展。可见，需要是发明的动力。

随着 21 世纪的到来，整个世界所面临的结构性能源限制要比一场战争或者一次禁运更加强烈，因为这一限制来自自然资源本身。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目前每年所消耗的能源都在大幅增长，而能源生产者则竭尽全力地去开采足够的化石燃料以跟上这一步伐。趋势线表明，我们将迎来一个能源稀缺的时代——这种担忧曾在大约 10 年前达到了高峰，当时一个地质术语“石油峰值论”出现并为大家所熟知。

“石油峰值论”是指全球已经消耗了近乎一半的地下可开采石油。根据该理论，当时正处于这一供应曲线的最顶端，所以人类未来将会面临零售石油价格飙升的局面，同时，当大自然赋予我们的另外一半石油储备即将消耗殆尽时将会爆发石油战争。“石油峰值论”的许多拥护者预测未来的世界将会逐步走向世界末日的大决战，这是对挥霍无度的人类世界的一个马尔萨斯式的应得惩罚。

## 新的富庶时代

不过，仅仅数年之后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如石油峰值论的拥护者们所做出的千禧年预测，石油价格居高不下，但这一预测也激发了许多项技术突破的实现，这些技术突破至少目前已经在全球的许多地方开始被用于大规模扩张其经济可行的能源生产和供应。当前，被石油和天然气业内人士称之为“非常规”能源的产量正在迅猛增长；“非常规能源”一词，深入浅出地讲，就是指不易从地下开采的能源。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归功于油气的高价格，这使得水力压裂和水平钻井等新式生产技术的推广成为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市场发挥了作用，同时也得益于政府研究经费的扶持。

之后便掀起了开采储量巨大的非常规油气的热潮，这一热潮波及全球大部分区域，从美国到中国，再到欧洲和拉美。仅仅在不到 10 年之前，美国政界人士还在为美国对中东石油进口的依赖不断增强而忧心忡忡，而美国的实业家则提出国内能源价格居高不下将会迫使制造业移师海外的预警。而今天，美国的政治家们

则在讨论是否应该大规模出口石油和天然气，而该国充裕的国内化石燃料也促使那些原本计划移师海外的公司继续在国内建造他们的工厂。

## 当前新能源供应对重要厂商产生的威胁至少不亚于过去能源危机的影响。

环保主义者和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其他低碳能源的倡导者的措词发生了显著变化，清晰地反映了化石燃料的蓬勃发展。多年以来，他们一直认为发展可再生能源是必须的，主要原因是化石燃料正在走向枯竭；而当前，他们依然认为可再生能源是必须的，但其出发点是化石燃料的产能在不断上升。他们在全球各地推动政府为碳排放严格设置上限，从而使燃烧化石燃料在经济上不再可行。这种观点在发展中经济体中尤其难以推行，而这些国家的能源需求持续增加。

可再生能源本身是当前蓬勃发展的新能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产量在迅速飙升，但由于基础规模较小，所以目前在全球能源构成中依然仅占据非常小的份额。不过，这一份额的扩张速度远远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测，当前针对该行业的主流预测从简单看好到非常乐观。得益于大量的政府资助，太阳能和风能是其中增长最快的。可再生能源的激励措施背后有三大动因：其一是对气候变化的担忧；其二是许多国家的政府希望能够促进国内就业；其三是上述国家出于民族主义的考虑，希望能够赢得这场技术竞赛，他们认为这将成为 21 世纪最重要的技术竞赛之一。

但是经济力量一旦释放出来，就往往会快速发展变化并失去控制。起初，可再生能源仅仅是一个讨巧的绿色环保概念，可如今已经滚雪球般发展成为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全球性行业，其发展速度和力度甚至超出了其许多拥护者的预料。起初，欧洲国家推出补贴，这使得那些风力涡轮机和太阳能板的生产厂家和销售这些新式设备所生产的高价电力的公司均有利可图。之后，那些低成本的制造业导向国家，特别是中国，充分利用欧洲的激励措施来迅速发展其自身的大型出口导向型可再生能源行业。后来，随着这种国际性拓展为这一曾经缺乏效率的新兴工业带来了规模经济效益，风能和太阳能的成本迅速下降。如今，在全球风力和太阳能资源丰富的一些地方，或者在那些常规能源电力价格非常高的地方，或者同时兼具上述两种特征的地方，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成本与煤炭或天然气发电成本相比已经开始具有竞争力。

## 光明的未来——对部分行业参与者而言

资源新贵的不断扩张可以通过设置大量的技术、政

治和经济壁垒来加以限制。不过,全球经济中的主要参与者已经开始认同这已经成为了他们不可忽视的新常态。

## 太阳能行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政府补贴,因为政府补贴促进了技术的发展。

OPEC 对此尤其忧虑。去年, OPEC 成员国尼日利亚的能源部长将迅猛发展的美国页岩石油生产称为“一个严重担忧”; 这番评论得到了媒体的广泛报道。而事实似乎越来越能证实上述担忧确实并非神经过敏。今年 6 月, 国际能源署 (IEA, 2014 年) 在一篇报告中预测, OPEC 在全球“生产性”石油产能中的份额将从 2013 年的 58% 下降至 2019 年的 57%, 而非 OPEC 国家的份额将会从 42% 上升至 43%。这些数字看似平淡, 但对于 OPEC 这一长期支配全球石油生产的垄断联盟而言, 却意味着令人不寒而栗的巨大转变。根据 IEA 的数字, 在 2012 年和 2013 年之间, 北美的石油日产量增加 135 万桶, 而 OPEC 的日产量则减少 85 万桶。同时, 尽管 OPEC 2019 年的日产量预计将在 2013 年的基础上增加 208 万桶, 这一预计增长中的一半以上来自伊拉克, 但该国目前局势并不稳定。“鉴于伊拉克风雨飘摇的政治形势和安全局势,” IEA 在报告中称, “该项预测充满了下行风险”。尽管到目前为止 OPEC 产量下降主要是由于其成员国的政治困境和地质方面的困难, 但 OPEC 成员国的担忧不断加深。他们认为, 随着美国石油产量的增加, 对 OPEC 石油的进口需求将减少。

OPEC 并不是唯一一支对美国能源生产突飞猛进感到不安的力量。欧洲业界也是如此, 因为其担心美国下降的能源价格会使欧洲作为全球商品的生产者的竞争力下降。今年 2 月, 在欧洲具有大规模业务运营的 100 多家能源密集型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联合签署了一封信, 呼吁欧洲政策制定者推进欧洲大陆的天然气生产并放宽其实施的许多降低碳排放的法令的限制; 这些公司包括力拓加铝、安塞乐米塔尔、巴斯夫、蒂森克虏伯、约翰逊控制和默克公司等行业巨头。负责组织策划被称之为“宣言”的本项活动的行业群体称, 上述两项举措将会降低欧洲的能源价格, 增强欧洲行业同美国工厂的竞争力。

可再生能源的崛起加剧了竞争, 其强度可与石油和天然气的重新兴起所产生的争斗相提并论。太阳能就是这样一个特别令人担忧的情况。

根据 IEA 的资料, 当前太阳能所提供的发电量尚不足全球年度发电量的 1%, 但是即使这个数字也是该行业五年前刚刚起步时的 8 倍。而且, 这个比例不能完全反映出在某些地区的较高的普及率。意大利的太

阳能发电在年度总发电量中的比例大约为 8%, 德国和西班牙的这一比例都是约 5%, 澳大利亚的该比例为约 2%。在加利福尼亚, 在特定的时间段, 超过 6% 的电力供应来自太阳能。据 IEA 预测, 从全球范围来看, 到今年年末, 太阳能发电在年度发电总量中所占比例超过 1%; IEA 认为, 从今年年末开始, 太阳能的未来前景将会显著改善。

太阳能行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政府补贴, 因为政府补贴促进了那些能够降低成本的技术的发展。根据各方估算, 太阳能板的平均价格在过去的数年中下降了 75%, 甚至更多。太阳能板价格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中国出乎意料地涌现出许多生产低成本太阳能电池板的厂家。这激怒了那些在太阳能行业发展早期占据行业主导地位的西方公司。其中一些公司已经向相关国际贸易机构提出了投诉, 指控中国太阳能板制造商通过中国政府的慷慨补贴获得非法帮助, 违反了世贸组织的规则。而中国否认违反了任何法规。从法律角度来看, 不管谁对谁错, 指控掀起了中国对美国与欧洲的贸易战争, 双方均对从另一方进口的太阳能组件加征关税。今年 7 月, 美国释放信号, 表示计划再次提高对中国制造的太阳能板征收的关税。

## 新时代的到来?

除了谁将从太阳能电池板的生产中获益的冲突外, 一场决定太阳能销售胜负的战争正在进行。环顾全球, 那些具有主导地位的电力生产商对价格愈发低廉的太阳能电池板的普及感到日益忧虑, 因为这会促使更多消费者自己生产电力, 进而蚕食掉公用电力公司的客户群。在德国, 大型电力公司 E.ON 将令人失望的季度收益状况归咎于屋顶太阳能电池板行业的兴起。美国电力生产商 NRG 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官戴维·克雷恩 (David Crane) 将屋顶太阳能称之为对公用电力事业的“一个致命威胁”。美国夏威夷的主要电力公司最近宣布, 将严格限制接入电网的屋顶太阳能电池板的数量。

能源可能会变得具有危险性并且不可预测: 对于壁式插座如此, 对于全球也是如此。不久之前, 人们的普遍忧虑是没有充足的能源来为这个世界提供动力。现在, 在石油生产商、公用电力事业公司以及跨国生产商之中, 出现了一个新的担忧: 新能源技术和供应的迅猛发展将会削弱世界强国的地位。■

杰弗里·鲍尔 (Jeffrey Ball) 是斯坦福大学斯泰尔-泰勒能源政策和金融中心的驻校学者, 该中心是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和商学院的联合项目。

参考文献: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2014, Medium-Term Oil Market Report 2014: Market Analysis and Forecasts to 2019 (Paris).



# 衡量标准

乔纳·D. 奥斯特拉、安德鲁·G. 伯格

巴西福塔雷萨市的贫民窟和现代摩天大楼。

尽管近年来不断加剧的经济不平等议题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和政治话题，但其精确定义却常常是模糊的，有时候用中产阶级的相对命运来描述，有时候用1%收入最高人口的收入来界定。对于该问题的衡量，在税前、税后以及转移支付前后并无明确规定。具体衡量对象与想得到的结论以及应采取何种应对政策密切相关。

此外，随着不平等的现实日益为大家所接受，人们的关注点转向了采取什么措施（如果有的话）来应对这一现象——比如是否需对收入进行再分配，如果需要，应如何分配以及收入再分配将带来怎样的潜在影响。就不平等现象而言，“再分配”的定义以及如何对其进行衡量对于分析和政策而言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 什么是不平等？

所有经济概念均会提出具有挑战性的计量和概念性问题，不过不平等可能尤甚。例如，国民生产总值(GDP)的计量本身就十分复杂，但至少其目标是明确的，即对既定经济体总产出的计算。而不平等则不然，它更类似于“竞争力”这种概念——任何简单化的计量都会将一个复杂的议题归结为一个简单的数字。

大部分有关不平等的原始数据来自调查。此类调查通常面向家庭，询问各种来源的收入、纳税和消费情况。通过这种方法获取的数据非常不完善。由于

开展调查程序复杂且造价高昂，最多也只能每隔几年开展一次，而且无法保证这样的调查具有代表性。调查人员可能更难找到那些富裕人士，即便找到了，他们参与调查的可能性也较小。

通常，研究人员希望对不同时间和国家的不平等性进行比较。这种比较十分困难，有很多原因：

- 各种调查在很多重要方面存在差异。例如，存在多种定义收入的方法。可以仅包括工资等劳动报酬以及资本收益（市场收入），也可以同时包括私人馈赠、政府补助等转移支付以及养老金或食品救济券和纳税减免等非现金资源（净收入或可支配收入）。此外，调查所反映的可能是消费方面的不平等，而非收入方面的不平等。

- 分析所使用的核算单位可能也各不相同。调查考察的可能是人均收入、家庭平均收入或每个纳税单位（通常与家庭的概念不同）的收入。通常，调查反映的是调整后家庭的收入，因为随着家庭人口规模的增加，每个家庭成员的成本会有所下降，需将这一因素考虑在内。

调查存在上述问题以及一些其他问题，其中富裕阶层人士的收入难以跟踪的问题尤为突出。因此，经济学家开始将纳税记录作为考察收入分配数据的依据（Atkinson、Piketty 和 Saez, 2011 年）。与调查数据相比，税收数据具有几大优势：所有纳税人的税收数据均可获得，所以调查中富裕阶层的收入情况就可以得到更好体现，而且可以考察较小的细

不平等或许是一个热点问题，不过描述它的确是一个难题

分阶层，如最富裕的0.1%人口。此外，税收数据基本上能够逐年获得，且通常可以追溯到20世纪早期。

不过使用税收数据也存在重大不利因素。第一，许多不缴纳所得税的贫困，甚至中产阶级人士被排除在外。第二，通常而言，很难获得有关实际纳税和获得的赠与的信息用于计算可支配收入。第三，可获得相关数据的仅限于发达经济体和部分新兴市场。第四，基于税收的数据存在其自身的与误报或使用避税方法等相关的计量问题而许多避税方式可能更便于最富裕阶层人士使用。

## 衡量对象的选择十分重要

当涉及上述各种并不完善的衡量方法时，一个关键的原则是针对所需解决的问题使用恰当的衡量方法。

我们首先根据调整后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数据对美国和德国进行一个简单比较（见图1）。可支配收入本质上是指家庭所获得的收入和转移支付减去纳税额。我们需要将相关资料进行简化并变成我们能够轻松进行比较的东西。可以采用很多办法来实现这一目标，每种方法都有各自的用途。

基尼指数是最为常见的概括性衡量指标。该指标衡量的是人口中任意两个家庭（或个人）之间的平均收入差异。基尼指数进行了归一化处理，其数值在0至1之间变动：“0”表示所有家庭都获得相同的收入，而“1”表示一个家庭获得所有的收入。由于基尼指数涵盖了所有分配情况，并且被许多国家所采用，所以其在了解整体宏观经济影响以及收入不平等的决定因素的时候尤其有用。

自从1980年前后，部分国家最为富裕的1%或0.1%人口所占有的收入份额急剧上升，这一情况在近期获得了广泛关注。收入份额的增长主要出现在基尼指数所衡量的收入分配的最上层，由于其过于集中，基尼

指数并未能非常准确地把握其动态，因为该指数是根据调查结果考察全部收入的分配情况。

最富裕1%人口的收入份额可能是一个更为有用的衡量指标，部分原因是其出于特定目的衡量了收入分配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特征，如这些巨富阶层掌控政治进程的能力。正如已故美国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布兰戴斯（Louis Brandeis）曾经所说：“我们可以拥有民主，我们也可以让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但两者之间我们必须选择其一。”他当时并没有考虑到基尼指数等衡量不平等的一般性指标。诸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2012年）一类的作家认为，一直以来对基尼指数的重视令许多分析师忽视了巨富阶层的崛起对美国政治力量的影响。不过，针对一些用途而言，更宽泛的衡量指标更加有用。例如，当采用基尼指数这一指标时，可以看到不平等程度更高的国家倾向于具有更低的代际流动性，而最富裕的1%人口这一指标则无法体现这一点。

图2显示了德国和美国市场收入不平等（在纳税和转移支付之前）的基尼指数以及最富裕的1%人口所占有的收入份额的变化情况。在上述两个国家，这两种衡量指标都出现了增长，不过美国最富裕的1%人口所占有的收入份额指标上涨更为迅速。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结果是，在这两个国家中，由基尼指数所衡量的市场收入不平等程度基本上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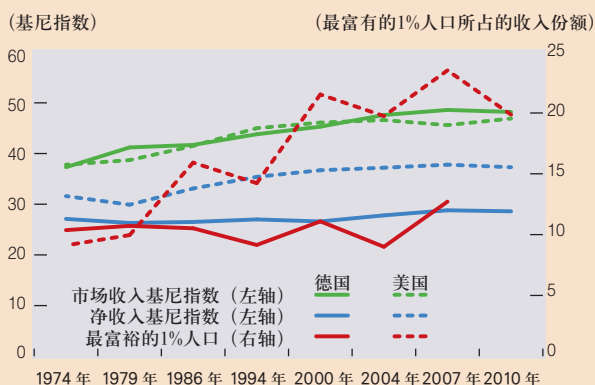
## 不平等与增长

在有关不平等的研究中，我们选择了许多国家作

图2

### 衡量高收入阶层

整体不平等程度以及最富有的1%人口所占的收入份额在德国和美国都在上升，尽管在全球经济衰退期间上述两国的该指标双双回落。



资料来源：有关最富裕的1%人口，Alvaredo和其他人（2014年）；有关基尼指数数据，Solt（200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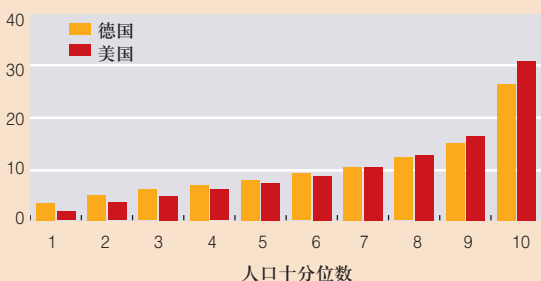
注：市场收入不平等程度所衡量的是纳税和转移支付之前的情况。净收入不平等程度考虑到了转移支付和纳税情况。最富裕的1%人口所占的收入份额衡量的是纳税和转移支付之前的情况。基尼指数衡量的是整个经济体的不平等程度。基尼指数为“0”表示所有家庭拥有相同的收入；而基尼指数为“1”则意味着一个家庭占有全部收入。

图1

### 瓜分收入大饼

在美国和德国，收入分配是不平等的。

（在总净收入中所占份额，百分比，2007年）



资料来源：联合国大学世界经济发展研究所，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WIID 3.0A），2014年6月。

注：各组柱状是按照美国和德国最贫困的1/10人口至最富裕的1/10人口的顺序排列的。基尼指数用于衡量一国的整体不平等程度，该指数在德国为0.29，在美国为0.38。基尼指数为零则意味着每个家庭拥有相同的收入，基尼指数为1则表示一个家庭拥有所有收入。



为样本，并着重考察了不平等对增长的可持续性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假定不平等和增长之间的许多相关机制可能都在起作用，其中包括不平等对贫困阶层和中产阶级积累人力资本能力的影响；对政治稳定性以及对投资激励措施的影响；对社会凝聚力以及抵御和适应冲击能力的影响；以及对有关收入再分配的政治压力的影响，这可能会弱化激励作用并进而降低增长速度。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将所有上述渠道都涵盖进来，且对各种渠道的重要性持中立态度，另外由于我们需要大量的样本国家和各种时期的数据，所有基尼指数起到了非常完美的作用。在伯格和奥斯特拉（Berg 和 Ostry, 2011 年）的著述中，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较高的不平等程度与增长缺乏持久性具有相关性；这一结论进一步加强了目前研究者们逐渐达成的、或者说不断深化的相关共识。

目前研究的重心已经从不平等程度转移至收入的再分配。我们针对不平等程度和增长的研究结果在有关再分配的影响方面不是十分明确。如果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试图加大再分配的力度，则所采取的提高税率、增加补贴等再分配措施会削弱工作和投资的动力，那么再分配就将无法成为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方法，而会成为不平等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至少在涉及增长问题时会是如此。

我们面临着两个具有挑战性的衡量问题。首先，大部分有关不平等程度的多国数据集主要包含有关（可支配）净收入不平等方面的信息。不过，要考察是否不平等程度更高的国家的再分配力度更强，需要考察市场收入不平等与再分配之间的关系，因为净收入不平等会使潜在的市场不平等和再分配的影响变得复杂。其次，我们希望衡量再分配本身，以便评估问题的下一个环节：再分配是否对增长发挥重要作用，正如阿瑟·欧肯（Arthur Okun, 1975 年）所描述的平等和效率之间的重要权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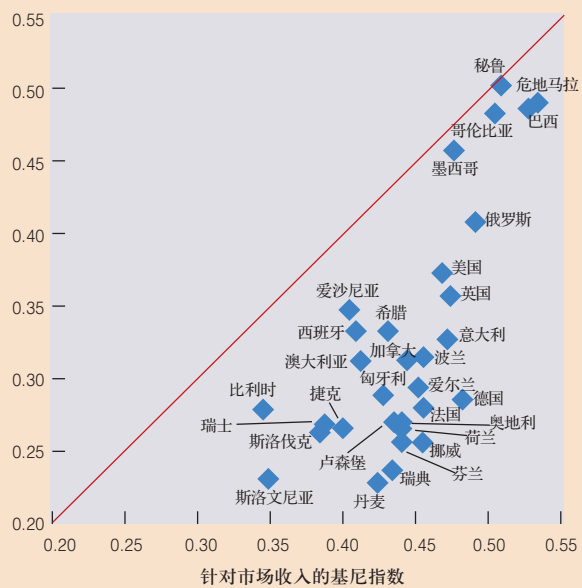
但结果表明，想全面地衡量再分配，其难度甚至大于衡量不平等程度。大部分研究力量都侧重于考察再分配的替代性指标，如政府在医疗保健、教育和社会补贴方面的支出，或者侧重于国民总收入或税率。

但这些替代性指标非常不精确。许多税收可能不是特别具有累进性，如个人所得税或营业税。同样，社会支出所带来的好处可能并不主要流向低收入群体。例如，发展中经济体的许多教育支出主要针对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所以主要受益者是经济状况较好的群体，而许多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所支持的是城市医院，并非针对贫困群体，甚至中等收入市民群体。在利用这些替代性指标来衡量再分配时，研究者发现，有很少证据表明不平等程度更高的国家的再分配力度更强。但是，在对衡量手段加以改进之后，结果就更加清晰了。米拉诺维奇（Milanovic, 2000 年）充分利用了《卢森堡收入研究》维护的主要针对工业化国家的高质量数

图3  
收入再分配

在纳税和向低收入居民户进行转移支付之后，不平等程度有所降低。

（针对净收入的基尼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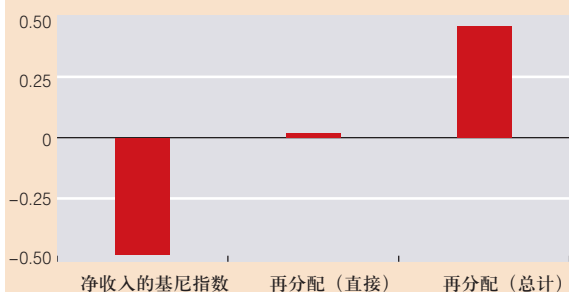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Solt（2009年）；世界不平等程度标准化数据库，4.0版。

注：基尼指数衡量的是一个经济体的不平等程度。基尼指数为“0”意味着每个家庭具有相同的收入。基尼指数为“1”则表示一个家庭占有所有收入。市场收入是指转移支付和纳税之前所获得的收入。净收入是指纳税和转移支付之后的收入。一个经济体所处位置距离45度线的右侧越远，则表明其再分配的规模越大。数据是可获得的各国的最新年度数据，时间范围在2003年至2010年之间。

图4  
平等程度越高，增长越快

较高的净收入不平等程度与较低的增长率具有相关性，而收入再分配似乎对增长的负面影响十分有限。

（增长率的变化，百分比）



资料来源：Ostry、Berg和Tsangarides（2014年）。注：第一个柱状的高度在零以下，表示在其他变量（包括再分配）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五年人均实际收入（经通货膨胀调整）的下降与不平等从第50个百分位增长至第60个百分位相关（用针对净收入的基尼指数衡量）。基尼指数所衡量的是一国不平等性的整体程度。基尼指数为“0”表示每个家庭拥有相同的收入，而基尼指数为“1”则表示一个家庭占有全部收入。“净收入”是指纳税和转移支付之后的收入。第二个柱状反映的是在净收入、不平等程度和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10个百分位的再分配增加对增长的影响（很小的正面影响）。再分配的计量用市场收入（纳税和转移支付之前）的基尼指数和净收入的基尼指数之差来表示。第三个体现的是相同的10个百分位的再分配增加对增长的预计正面影响，但因包括再分配的增加对较低净收入不平等程度的（间接）影响，所以增长率较高。本计算假定再分配的增加对市场不平等程度没有影响。

据集。该数据集主要提供了有关市场收入不平等和净收入不平等的可比数据。米拉诺维奇发现，对这组较为富裕的民主国家而言，再分配与市场不平等程度密切相关。



## 针对所需解决的问题使用恰当的衡量方法。

我们的研究一直侧重于所有国家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幸运的是，政治科学家弗雷德里克·绍尔特（Frederick Solt，2009年）所编辑整理的一个相对较新的数据集提供的信息恰恰是我们所需要的。绍尔特将可获得的基于调查的高质量不平等数据按照主要维度进行了标准化处理。绍尔特收集了世界银行、联合国以及其他组织有关基尼指数（包括市场收入和净收入等各种收入定义以及户均或人均等会计核算单位）的调查结果中的相关信息。之后他对许多案例中特定国家和特定时期有关不平等的若干可获得衡量指标进行分析，以便估测不同指标之间具有代表性的关系。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的拉丁美洲国家，消费方面的不平等与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比较具有可预测性。通过上述情况以及所考察的数百个类似关联性的存在，绍尔特就众多国家和时期推断出净收入不平等性和市场收入不平等性的标准化衡量标准。

从此类有关净收入不平等性和市场收入不平等性的信息中产生了某些非常引人注目的发现。例如，人们通常认为美国的不平等程度高于德国，拉美的不平等程度高于欧洲，可是却往往不了解上述比较在针对净收入时才是大体正确的。市场收入不平等程度（在纳税和转移支付之前）的相关研究结果与上述结果相当接近（见图3）。

更加常见的情况是，由于市场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的再分配力度可能更大，所以这些国家的净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性不一定显著高于其他国家——平均而言，再分配在这一差异中占据约60%的份额。美国具有较高的净收入不平等程度，这在富裕国家之中是一个例外情况，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中，再分配规模较小以及较高的市场收入不平等所起到的作用基本相同。

## 新的突破

在我们自己的著作（Ostry、Berg和Tsangarides，2014年）中，我们利用了绍尔特的数据并达成了三个广泛的结论。首先，不平等程度更高的社会倾向于具有更高的再分配程度，这并不仅限于富裕国家，对那些尚处于发展中的经济体也是如此（但总体来说力度较小）。

其次，在给定的再分配水平下，较低的净收入不平等与较快的更加具有持久性的增长密切相关。再次，再分配——用市场收入和净收入不平等程度之间的差异来衡量——总体上看来其对增长具有良好的影响（图4对第二和第三个结论进行了说明）。仅在一些极端的案例中有证据显示再分配可能会对增长带来伤害。因此，再分配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总体上看是有益于增长的。当然，我们应该认识到数据集本身以及多国比较所具有的局限性。此外，再分配政策的具体内容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IMF，2014年）。不过，基于我们的研究，我们不应假定在再分配和增长之间具有较大的权衡，这一点需要注意。

目前，该领域的许多重大议题也在积极探索之中。显然，工作重点是收集更多更好的数据并加以分析，其中包括来自更多国家的更多更好的有关不平等和再分配的数据，对较富裕国家财政再分配的考察（Lustig和其他人，2013年）以及对财富不平等程度（而非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更多关注。但是，我们不能坐待完美数据的出现：我们必须不断付出努力来完善数据并谨慎地利用我们目前业已掌握的数据。■

乔纳森·D·奥斯特拉（Jonathan D. Ostry）是IMF研究部的副主任，安德鲁·G·伯格（Andrew G. Berg）是该部门助理主任。

### 参考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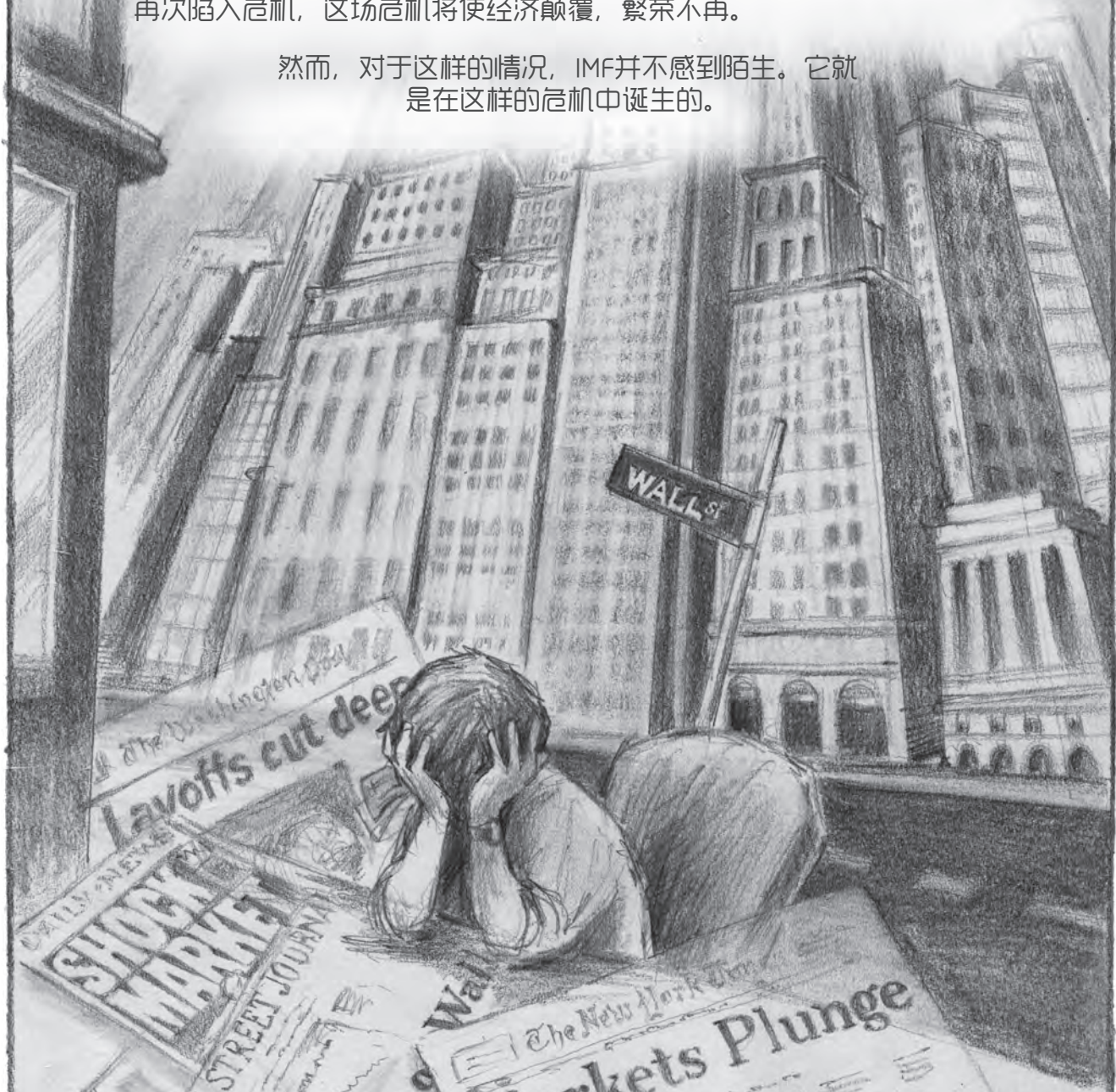
- Alvaredo, Facundo, Anthony B. Atkinson, Thomas Piketty, and Emmanuel Saez, 2014, The World Top Incomes Database. <http://topincomes.g-mond.parisschoolofeconomics.eu>
- Atkinson, Anthony, Thomas Piketty, and Emmanuel Saez, 2011, "Top Incomes in the Long Run of Histor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49, No. 1, pp. 3-71.
- Berg, Andrew, and Jonathan Ostry, 2011, "Inequality and Unsustainable Growth: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No. 11/08*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2014, "Fiscal Policy and Income Inequality," *IMF Policy Paper* (Washington).
- Lustig, Nora, and others, 2013, "The Impact of Taxes and Social Spending on Inequality and Poverty in Argentina, Bolivia, Brazil, Mexico, Peru and Uruguay: An Overview," *Tulane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No. 1316* (New Orleans, Louisiana: Tulane University).
- Milanovic, Branko, 2000, "The Median-Voter Hypothesis, Income Inequality, and Income Redistribution: An Empirical Test with the Required Data,"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6, No. 3, pp. 367-410.
- Okun, Arthur M., 1975, *Equality and Efficiency: The Big Tradeoff*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 Ostry, Jonathan, Andrew Berg, and Charalambos Tsangarides, 2014, "Redistribution, Inequality, and Growth,"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No. 14/02*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Solt, Frederick, 2009, "Standardizing the World Income Inequality Database,"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90, No. 2, pp. 231-42.
- Stiglitz, Joseph E., 2012, *The Price of Inequality: How Today's Divided Society Endangers Our Future* (New York: W.W. Norton).



# 有

时候，过去仅仅只是一个序幕。但在21世纪最初几年，并没有什么迹象表明前方等待着大家的是一场巨大的经济灾难。2007年，世界再次陷入危机，这场危机将使经济颠覆，繁荣不再。

然而，对于这样的情况，IMF并不感到陌生。它就是在这样的危机中诞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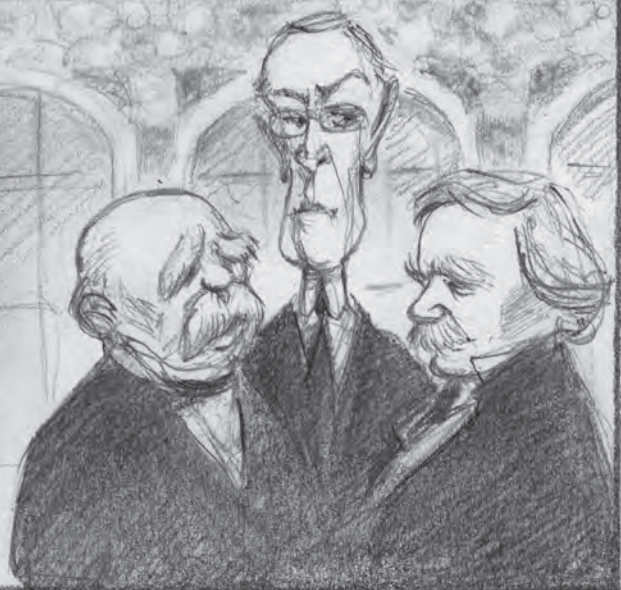
# 对抗危机

全球合作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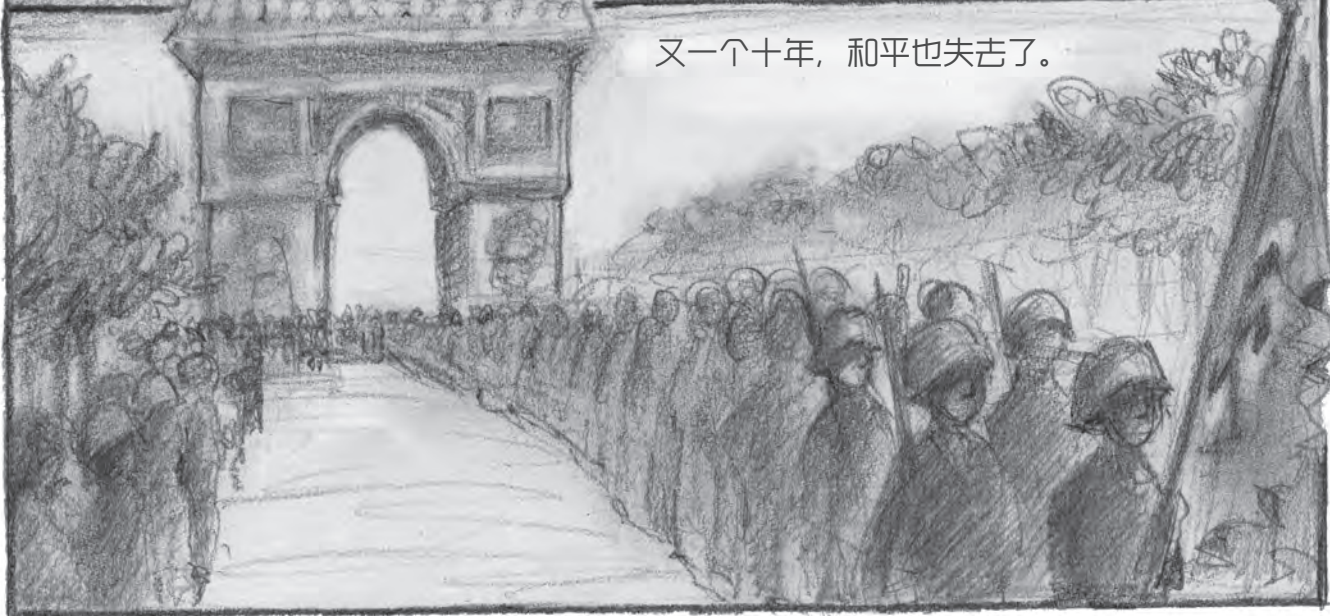
故事：乔·普罗科皮奥 (Joe Procopio) 绘画：尼克·加利费安纳基斯 (Nick Galifianakis)



当1919年各大国在巴黎汇集时，他们就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建繁荣与和平的建议展开了争论。但是一系列优柔寡断的折中方案导致此次会议的产物《凡尔赛和约》最终未能重建新秩序。



十年之内，繁荣尽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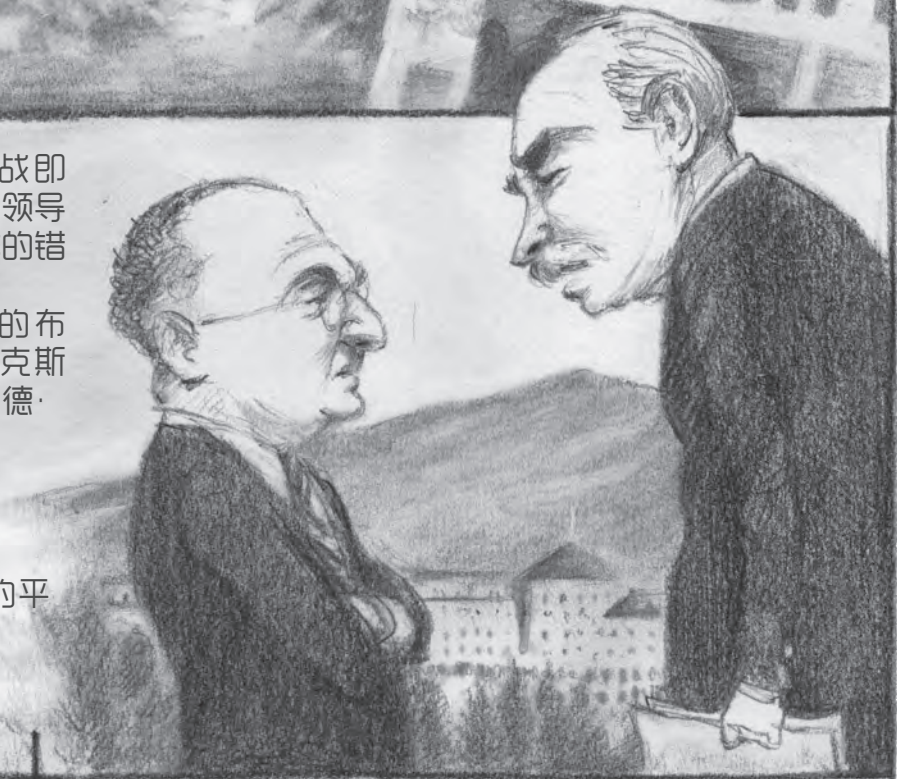
又一个十年，和平也失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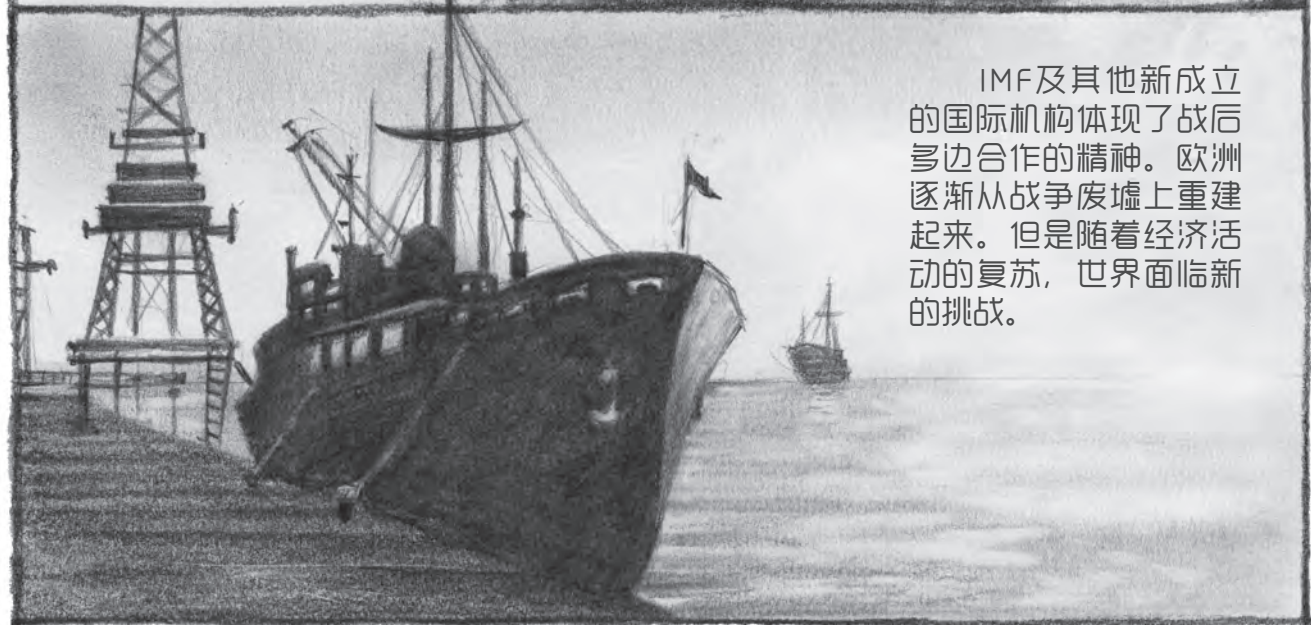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时，世界的领导者们决心不再犯这样的错误。

在新罕布什尔的布雷顿森林，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缔结协议，很快IMF便诞生了，其旨在促进国际货币合作、贸易以及全球资本的平稳流动。



IMF及其他新成立的国际机构体现了战后多边合作的精神。欧洲逐渐从战争废墟上重建起来。但是随着经济活动的复苏，世界面临新的挑战。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独立的非洲主权国家加入到IMF当中，充满希望，但其基础设施很差。

这些国家寻求能力建设方面以及政策专业知识方面的支持。

由于非洲经济体的发展，IMF的措施也在变化……

……以帮助非洲领导者们解决债务和贫困问题。

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增加对越南战争的开支，使美元被高估的这一情况进一步恶化，固定汇率备受压力。



到20世纪70年代，促进经济稳定原始框架崩溃。在IMF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各国的汇率必须钉住美元。但当美国摒弃金本位时，世界主要货币间的汇率开始浮动，不再钉住美元。



即使IMF为了应对这一问题开发了新的工具，但其他挑战随即浮出水面。私人部门资本流动甚至更为自由，但一体化程度更深的全球经济波动很大，在20世纪80年代一系列的债务危机逐渐增多。



全球化的风险和缺点开始显现，抗议声四起。这并不是第一次出现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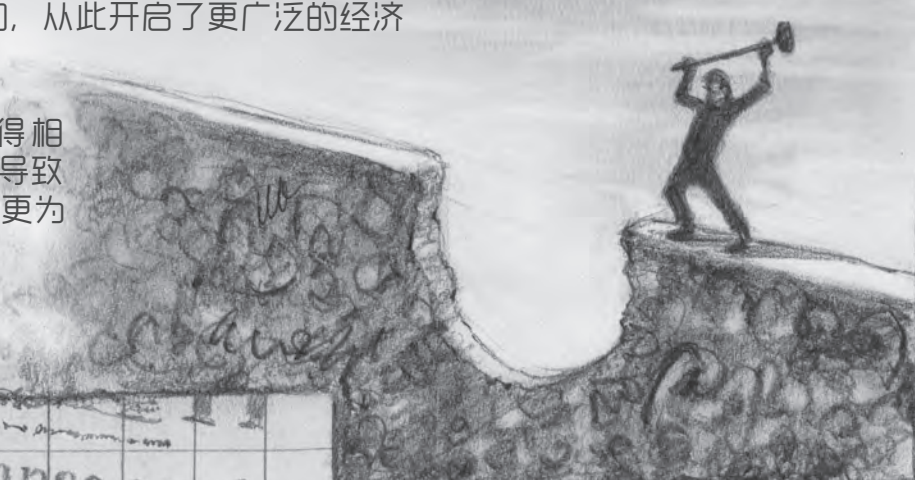


紧张的关系常常会阻碍国际合作。当战后敌对的双方演变为冷战的敌对方时，IMF早期拥有广泛的成员的初始希望破灭。



最终，中国加入IMF。接着，随着柏林墙的倒塌，IMF的成员迅速增加，从此开启了更广泛的经济合作的新纪元。

然而，一体化使得相互间的依赖性大增，这导致2007年爆发的那场危机更为严重……



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传遍世界。2008年出现恐慌，大衰退的范围使得任何国家都无力承受其产生的累积效应。这一伤害可能更深、更严重，威胁着全球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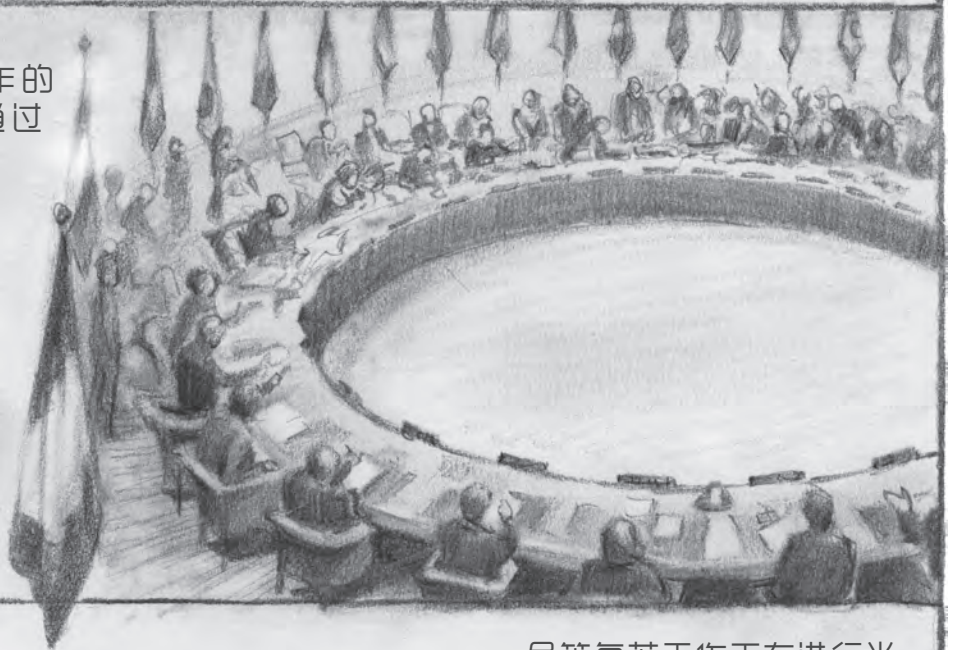
IMF的建立就是为了阻止这种悲剧的发生。





此时，全球领导者们面临这样一个选择：各国要么联合起来，要么分道扬镳。

幸好，展开合作的观点占据了上风。通过IMF，国际社会行动起来，避免大衰退产生毁灭性的后果，确保重组和重建的空间。



尽管复苏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国际社会重申IMF当前的任务：促进全球经济稳定。未来充满挑战，但是多边主义模式已再次被证明是非常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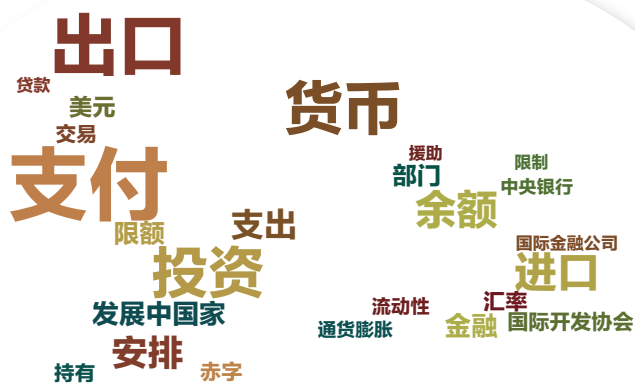
# 金融与发展的五十年

时代在改变，《金融与发展》的焦点在过去半个世纪中也在改变，至少从杂志中出现的高频词就可以看出

《金融与发展》1964年6月号是我们的创刊号，如今我们已经走过五十载。《金融与发展》五十岁生日引起编辑们思考在过去几十年里在内容上有什么变化。以十年为单位，我们列出了每十年中出现频率最高的25个词，并以字的大小来显示出现的频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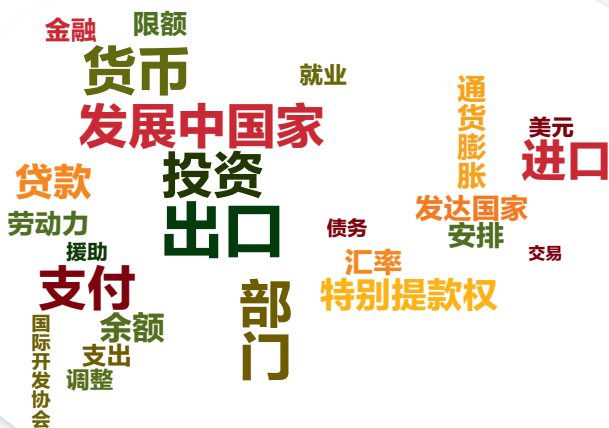
## 20世纪60年代末：

《金融与发展》是IMF与世界银行共同努力的结果，直至1998年。其旨在解释这两家机构是如何运作的。逐渐地，其关注点从这两家机构转向全球经济与金融问题。



## 20世纪70年代：

与美元挂钩的相对固定汇率体系崩溃，导致国际通货和国际收支危机，汇率也从固定转向浮动。在这十年间还经历了两次石油价格的大幅波动。





## 20世纪80年代:

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其中大多为拉美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是这一时期的“主题”。这些国家处理国际收支问题和衰退，同时调整经济以偿还债务。



## 20世纪90年代:

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前成员国国家从计划经济转变为某些形式的市场经济。爆发于墨西哥的金融危机随后席卷了亚洲的主要国家。这一时期也在危机中画上了句号。



## 21世纪头十年:

新世纪之初的经济相对稳定，被称为大缓和，但这一好景因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出现的最为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而终结。IMF快速成长，以帮助全世界应对这场危机。



## 21世纪早期:

金融危机之后，发达经济体的就业和GDP复苏缓慢，中央银行采用非传统政策来对抗衰退。



# 用声音赚钱

现场音乐会作为一个重要的出口创汇产业

2014年2月，在华盛顿特区市中心的一个普通的空旷的仓库举办了一场音乐盛会，纪念50年前英国摇滚乐队甲壳虫乐队在此进行的美国首演。然而，今年的这场演出也标志着现场音乐会作为一个重要的创汇产业已登上历史舞台50年了。

在1944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IMF和世界银行也是此时建立的），1964年时的主要汇率都是固定的。IMF的建立是为了帮助保持汇率稳定，主要经济体也通过汇率管制来维持其货币的价值。这些管制意味着企业和个人必须得到政府的许可才能兑换外币，并且只能在法定限额之内兑换。

## 保护其价值

维持固定汇率对于主要经济体的贸易平衡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出口赚取的硬通货或者进口支出的硬通货有效地设定了汇率水平。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由于持续的贸易逆差，英镑下行压力巨大，而当时的英国政府努力维持1英镑兑换2.8美元的价值，避免成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内出现货币贬值的国家。



## 拥有魔法的歌手

对于很多人来说，甲壳虫仅仅是一个乐队而已，但对英国政府而言，他们则是一台神奇的美元印钞机。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主要的流行音乐演出通常只能赚取本国货币。例如，美国歌手猫王从未在北美和夏威夷之外的地方演出过，他的演唱会收入全都是美元，除了在加拿大举办的四场之外。



1964年8月，甲壳虫乐队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演出。



## 美元、德国马克、日元

相反，甲壳虫乐队在1964年、1965年和1966年在美国巡演，赚的都是美元，创下了世界纪录。媒体报道说，他们在1965年时的演出每秒钟赚得的金额相当于现在的650美元。此外，1966年甲壳虫乐队还在德国和日本举行了巡演，赚取了大把德国马克和日元。与此同时，由于英国的消费旺盛导致进口增加以及旷日持久的水手罢工导致出口受阻，英镑面临的压力日益增加。

## 音乐的力量

用硬通货结算出场费，甲壳虫乐队成为精英组别英国“无形”出口商中的一员，这是指商业企业不通过制造和转运有形的实物产品，而是通过无形的信用和收款赚取外汇。20世纪60年代中期，英国的经常账户本应处于长期赤字，因为缺少来自金融服务、保险、专利以及版权的传统的英国无形出口。而甲壳虫乐队以其从演出门票、出场费、音乐版权、特许商品及演出权获得的收入为其注入了资金。



1966年7月，甲壳虫乐队在东京准备上台演出。



1966年6月，甲壳虫乐队在德国汉堡演出。



## 奖励出口商

20世纪60年代中期，时任英国首相的是备受赞誉的、在牛津接受教育的经济学家哈罗德·威尔逊。以其敏锐的职业眼光，他很快注意到甲壳虫乐队对国际收支的贡献，而那时他领导的政府正在为保卫英镑而奋战。1965年11月，威尔逊及时提名甲壳虫乐队获得大英帝国勋章——这一国家级的荣誉通常授予杰出的实业家、企业家和发明家。

## 英镑的秘密武器

前去看甲壳虫乐队演唱会的人越来越多，演出场地变得混乱，公共秩序受到影响，因此在1966年8月甲壳虫乐队停止了所有的现场演出。一年之后，英镑贬值到1英镑兑换2.4美元，并且英国在1967年和1969年向IMF申请贷款。如今，主要的汇率是浮动的，主要的国家政府不再需要通过外汇管制来保卫固定的兑换价值，或者通过争夺无形出口来支撑其恶化的贸易平衡。但在50年前，甲壳虫乐队历史性地赚取硬通货，是英国三年努力避免英镑贬值的秘密武器。

本文由《金融与发展》高级编辑西蒙·威尔森（Simon Willson）撰写。



# 在舞台中央

阿蒂斯·雷克斯·戈什

在过去70年里，国际货币体系已经经历显著的变革，而IMF亦依此进行了相应调整

70年前，44国的代表出席在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举行的联合国货币及金融会议，他们的目的是想设计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来整顿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济混乱——20世纪20年代的恶性通货膨胀和令人痛苦的通货紧缩，金本位制的瓦解，以及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

货币与金融专家们所面临的挑战是要制定出一个体系，能让成员国调整其外部失衡，而不会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采取自我毁灭式的竞争性贬值和限制贸易政策。盈余国与赤字国之间调整的责任需要公平合理，同时需要充足的流动性去促进世界贸易和收入的增长。在大量的准备工作基础上（主要为英国财政部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美国财政部的哈里·德克斯特·怀特），代表们仅仅在三个星期内就取得了达成战后货币秩序共识这一非凡成就。美国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在会议闭幕时说，虽然公众会觉得会议的议程似乎有点神秘，但新秩序其实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他说，我们在布雷顿森林取得的成果是“全世界各个国家为了共同利益和所有人的福祉而在经济发展上互助所

迈出的第一步。”

新秩序的关键——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建立相对于美元的固定但可调整的各国货币平价，而美元的价值则与黄金挂钩。IMF的成立就是用来管理这个制度。在会议上协商的《IMF协定》（很多国家提供了有价值的建议）难免反映出主要提倡者的相对谈判能力。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将成为主要的盈余国，反对凯恩斯提出的“国际清算联盟”。这个联盟会对称地惩罚有着大盈余和大赤字的国家，此外，因为这是基于一种虚拟的结算单位（称作“班格尔”），所以能用以调节全球的流动性。但新秩序起码可以约束国家从不公平的贸易优势中牟利。只有在“基本面失衡”的情况下才容许贬值，而那些收支平衡经受短期不足的国家则应维持平价，可向IMF贷款（IMF的说法是“购买”）以克服困难。

## 一展身手和濒临瓦解

伴随着30个成员国通过其国内必须的立法程序，IMF在1945年12月正式运作。到1947年3月1日，成员国数量已增至40个，之后数量激增，





从饱受战争洗礼的欧洲国家和前轴心交战国成员到很多新独立的发展中经济体，最后是在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的各个共和国和中欧及东欧国家。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美国持续的国际收支赤字把战后的美元短缺转变为美元过剩，致使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变得脆弱。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在美国看来主要问题是让盈余国（当时主要是德国和日本）去调整。对于世界其他国家而言，困境在于美国的赤字是这个体系的流动性来源，但大量美元积存在外国的中央银行会削弱对美国以黄金支撑美元的能力的信心。

IMF的解决方案是特别提款权（SDR）——一种虚拟的储备资产（有点类似凯恩斯的班格尔），其能够提供流动性且不需要储备货币国有相应的赤字。但它太少，也太晚了。尽管用尽了方法去修补这个体系，包括20世纪60年代的中央银行间的互换协议和在美国停止美元储备与黄金互换之后并于1971年尽最后的努力去重组各国货币的史密森协议，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还是宣告瓦解。1973年后期和1974年受到石油价格冲击的大规模破坏使主要货币之间难以重返固定汇率制。对于IMF而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凸显了存在的危机。IMF旨在管理布雷顿森林体系，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一夜之间已不复存在，因此，人们开始质疑IMF是否应存在。这一点并不奇怪。一首该机构的模拟安魂曲在沮丧的IMF工作人员之间流传着。

## 伸出援手

但IMF向国际贸易收支有困难的国家提供贷款的职责在国际货币环境中不可或缺，特别是在石油价格冲击之后。初期，从IMF的提款（第一个是1947年的法国）是“直接购买”，这意味着一国能立刻提款。然而，早在1952年，预防性贷款——向一国提供备用金以重建信心和促进私人资本流动，可能无需实际用到IMF的资金——以备用安排

的方式得以实现。在1963年，察觉到主要商品价格的波动常常是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收支问题的主要原因，IMF设立了出口波动补偿贷款。而在第一次石油冲击之后，除了石油贷款之外，秉承帮助成员国改善收支失衡而“无需用到会破坏该国或国际繁荣的手段”的精神，IMF在1974年为那些面临更持久贸易收支问题的国家设立了中期贷款（EFF）。

## 对于IMF而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凸显了存在的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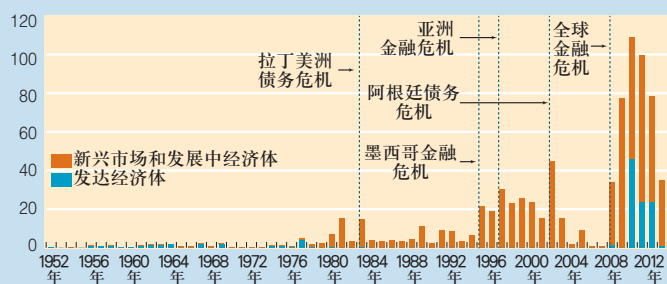
这些新的贷款工具，特别是中期贷款，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中经济体债务危机中是贷款工具的重要补充，当时IMF已承诺的贷款从1979年的20亿特别提款权上升到1983年的150亿（见图）。连同扩充后的贷款组合，IMF需要去制定、修订和调整它在有关拖欠、限制条款和方案设计方面的政策。对于低收入国家来说，最重要的创新是1986年的结构调整贷款——1987年加强的结构调整贷款的前身，和1999年的减贫与增长贷款（现在称为减贫与增长信托）——和重债穷国的债务免除动议，两者都是意在帮助国家实现更为有利于增长的外部调整——虽然这些方案通常会有更大的结构性条件制约。

如同债务危机——及与其相关的IMF贷款——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逐渐平息，而有关该机构的实质作用的问题再次出现，IMF努力重返舞台中央，这次是协助苏联以及中欧和东欧转型为市场经济。部分援助为直接稳定宏观经济，但在这些国家的方案设计通常需要IMF提供建议（1990年至1996年间的技术援助差不多翻倍），甚至施加条件——比如，针对定价政策、私有化和治理——远远超出它的标准授权。

IMF贷款在20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资本账户危

### 在困难时期

IMF已根据历次经济危机调整放贷，全球金融危机时达到高峰。（IMF安排，已批准的总金额，10亿特别提款权）



资料来源：IMF，基金安排监督数据库。

注：1952—1971年的金额以10亿美元计，1972—2013年的以10亿特别提款权计。



机中又一次大幅增加，这集中体现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但同时也跨越了这十年期的大部分时间——从1994年12月墨西哥的货币贬值到2002年1月阿根廷货币发行局的崩溃。

除了所涉及的融资规模，这些危机给IMF（甚至是整个经济学专业）造成巨大的分析挑战。IMF也被卷入了有关适当的政策响应争论当中，同时需要建立新的工具并把金融与企业部门纳入它的宏观经济分析和技术援助中。

## 严格的，或不那么严格的监督

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初已不复存在，国际货币体系仍面临许多与该体系设计者相同的问题。在1974年6月向IMF理事会递交的最终报告中，比如，二十国委员会（于1972年7月成立的部长级会议，旨在考虑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列出“达成所有国家义务上的对称，例如债务人和债权人”和“更好地管理全球流动性”，并将其作为改革后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目标的一部分。

再次证明，协议让人难以捉摸。除了重返布雷顿森林体系（但需要更多的对称调整），修订后的《IMF协定》要求IMF去“监督国际货币体系，以确保其有效运行……[同时]对成员国的汇率政策实行严格的监控。”监控包括两个部分：双边的，确保个别国家履行《IMF协定》（修订版）所规定的义务；以及多边的，监督体系的运行。这就是1980年IMF《世界经济展望》的源起。

然而，修订后的《IMF协定》和1977年的附加的监督决策都没有为如何进行监督提供大量指导，并且随着经验的不断增加，其流程不断变化。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比如，很明显需要超越汇率问题，对其成员国实施定期健康检查，以免金融危机蔓延而威胁到整个体系的稳定。

在21世纪初期，主要经济体的经常账户巨大失衡（称作全球性失衡）的出现使不对称调整这一老生常谈的问题成为重点。而这都是在IMF监督范围内，因为它们涉及成员国的汇率政策，并且都对体系的稳定性造成潜在风险。尽管2006年的“多边协商”和2007年的理事会决议加大监督力度（其后于2012年合为整合监督决策），IMF在说服主要成员国采取能收窄失衡的政策时，在很大程度上都不成功。同时，由于新兴市场国家改善了其宏观经济政策和强化其机构，危机变得罕见，到21世纪中期，IMF贷款跌至近几十年来的最低点。IMF似乎再次变得有点多余——这次转折是它的收入（主要来自提供贷款）不足以收回监督和技术援助的成本。

## 回到原点

当然，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的倒闭和一连串的全球金融危机平息了所有对IMF应否存在的疑虑，因为它很快通过特别提款权分配向全球经济注入流动性。它加大放贷——首先贷款给欧洲和其他地方的新兴市场国家，后来给欧元区的几个成员国，以更长期的融资（以中期贷款办法的方式）去应对其持久的国际贸易收支问题。考虑到全球日益相互依赖和风险不断蔓延，在备用安排的理念的基础上，IMF制定的工具更明确地带有预防性（例如灵活信贷额度），以增强信心。为回应人们对它错过危机的责难，它建立了一系列分析工具以更好地识别、避免、减轻和解决金融危机以及跨国外溢问题。

## 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的主要挑战大致上还是和70年前一样。

今天，IMF的贷款组合和一系列的监督和技术援助（是1990年的近三倍）——以扩大的研究和分析工作作为支撑——比任何时候力度都大，而它的融资更加可持续并减少了对放贷的依赖。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的主要挑战大致上还是和70年前一样，但这些挑战是如何体现的，尤其是私人资本流量的增长，已经变得让创建者们几乎无法想象。

货币及金融会议的真正贡献不是设计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而是它建立了一个能够并愿意不断做出调整的机构，以满足其成员国不断变化的需要——惠及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阿蒂斯·雷克斯·戈什（Atish Rex Ghosh）是IMF研究部门助理主任。





# 什么是凯恩斯经济学？

这个学派的核心思想是政府干预能够稳定经济

沙娃·贾汗、艾哈迈德·萨比尔·马哈茂德、克丽丝·帕帕耶奥尔尤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期间，既有的经济理论已无法解释导致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崩溃的原因或提供适当的公共政策方案去快速刺激生产与就业。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带头掀起了一场经济思想革命，推翻了当时认为自由市场会自动提供充分就业的主流思想——也就是说，如果工人的工资需求有弹性的话，任何想工作的人都能找到工作（见专栏）。以其名字命名的凯恩斯理论的核心主张是总需求——以家庭、商业和政府的总支出来衡量——是一个经济最重要的驱动力。凯恩斯进一步断言自由市场没有自我制衡的机制以促进充分就业。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们辩称，政府通过公共政策——旨在实现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的干预是合情合理的。

## 革命性观点

凯恩斯认为，总需求不足会导致长时期的高失业率。一个经济的商品和服务的产出是四个部分的总和：消费、投资、政府采购和净出口（一个国家向外国卖出和买入之间的差额）。任何需求的增加都源于这四个部分。但在经济衰退期间，随着支出的下降，强大的力量往往会抑制需求。譬如，经济下滑时，不确定性会侵蚀消费者的信心，导致他们减少支出，尤其是在像房子和汽车这些非生活必需品上的支出。由于消费者削减开支，企业为应对其产品需求的减弱，减少了投资支出。这样，增加产出的任务就落在政府肩上。依据凯恩斯经济学，为了调节经济活动的繁荣与萧条（也称为商业周期），国家的干预是必需的。

凯恩斯理论描述经济运行有三个主要原则：

- 总需求会受到很多经济决策的影响——公共决策和私人决策。私人部门的决策有时会引致不良的宏观经济后果，诸如经济衰退期间消费者支出的削减。这些市场的失灵有时需要政府的积极政策，诸如财政激励方案（见下面的解释）。因此，凯恩斯经济学支持

一个主要由私人部门引导，但部分由政府经营的混合式经济。

- 价格，特别是工资，对供给和需求的变化反应缓慢，造成间歇性的短缺和过剩，尤其是劳动力。

- 总需求的变动，无论可预计的或不可预计的，对实际产出和就业而非价格有重大短期影响。凯恩斯理论认为，由于价格有一定程度的刚性，任何支出组成部分的变动——消费、投资或政府支出——都会引起产出变动。譬如，如果政府支出增加，而所有其他支出组成部分都不变的话，产出会增加。凯恩斯理论的经济模型也包括一个乘数效应，即产出的变动是导致该变动的支出增加或减少的若干倍数。如果财政乘数大于 1，那么政府支出增加 1 美元，进而使产出的增加大于 1 美元。

## 大师凯恩斯

凯恩斯经济学的名称、理论和信念来自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 年），他被尊为现代宏观经济学之创始人。他最有名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于 1936 年出版。但其前身《货币论》（1930 年出版）通常被认为对经济思想而言更为重要。在这之前，经济学只分析静态情况——本质上是对快速移动过程的快照做详细分析。在《货币论》中，凯恩斯创建了一个动态的方法，将经济学转变为研究收入支出流。他打开了经济分析的新局面。

在《和平的经济后果》（1919 年出版）中，凯恩斯预言为了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签署的《凡尔赛和平条约》加之于德国的毁灭性条件可能会引致另一次欧洲战争。

当他带领英国的代表团出席 1944 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时，他汲取了凡尔赛和大萧条的教训——该会议制订了各种规则来保障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以及帮助那些受到二战战火洗礼的国家重建家园。美国财政部官员哈里·德克斯特·怀特与凯恩斯一同被视为是根据布雷顿森林会议建立的 IMF 和世界银行的智囊之父。

## 稳定经济

单从这三个原则来看，没有任何政策处方。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和其他经济学家的最大区别是他们相信激进政策能降低商业周期的幅度，他们认为这是最重要的经济问题之一。

凯恩斯主张依商业周期的反方向操作的所谓反周期的财政政策，而不认为不平衡的政府预算是错误的。譬如，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提倡在经济下滑时采用赤字支出，用于劳动密集型的基础设施项目，以刺激就业和稳定工资。当需求增长太高时，他们会增加赋税为经济降温，从而预防通货膨胀。货币政策也可以刺激经济——譬如，降低利率以鼓励投资。然而，出现流动性陷阱时除外，因为那时增加货币存量没法降低利率，因此不能促进产出与就业。

凯恩斯认为，政府应该在短期内解决问题，而不是靠市场的力量在长期自我修复，因为，正如他所写的，“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这不代表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主张每几个月就调整政策去维持经济的充分就业。事实上，他们认为政府的认知不足以成功地微调经济。

## 凯恩斯主义的演变

尽管凯恩斯在世时他的观点被广泛地接纳，但也有众多当代的思想家审视这些观点并提出质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论争，他们坚信衰退与繁荣是正常的，而政府的干预只会破坏复苏过程。

凯恩斯经济学在二战后一直主导经济理论和政策，直至20世纪70年代，当时很多发达经济体经受通货膨胀和缓慢增长（这种状况被称为“滞胀”）。由于凯恩斯理论对滞胀没有任何适当的应对政策，它受欢迎的程度因而减弱。货币学派经济学家怀疑政府用财政政策调节商业周期的能力，而辩称审慎的使用货币政策（主要是控制货币供给，以影响利率）可能会缓解危机（见“什么是货币主义？”，《金融与发展》2014年3月号）。货币学派的学者也认为，短期来看，货币能影响产出，但相信从长期来看，扩张性货币政策只会导致通货膨胀。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大体上采纳这些批评，并将长短期情况更好地整合以及对货币长期中立性的理解添加到原有理论中——这个观点认为货币存量的变动只影响经济的名义变数，诸如价格与工资，而对就业与产出等真实变数毫无影响。

当新古典主义学派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兴起时，人们开始审视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新古典学派认为决策者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个别市场参与者能预测政策的改变而提前采取应对措施。20世纪70年代和

80年代兴起的新一代凯恩斯学派学者认为，尽管个人能预测正确，但总体市场不可能瞬间明朗；所以，财政政策在短期可能依然有效。

## 凯恩斯经济学在二战后一直主导经济理论和政策，直至20世纪70年代。

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凯恩斯思想再次兴起。这是美国和英国等很多政府为应对危机而采取的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当2008年年末出现全球衰退时，哈佛大学教授N. 格里高力·曼昆（N. Gregory Mankiw）在《纽约时报》上写道，“如果你为了解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只打算向一位经济学家请教，毫无疑问的，那个经济学家就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虽然凯恩斯离开我们已有半个多世纪，他对衰退与萧条的诊断仍然是当代宏观经济学的基石。凯恩斯说过，‘讲求实际的人自认为他们不受任何学理的影响，可他们常常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在2008年，没有哪位已故经济学家能比凯恩斯本人更为赫赫有名。”

但2007—2008年的危机也显示出凯恩斯理论最好融入金融体系的作用。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正将实体经济与金融业整合，以纠正这项遗漏。■

沙娃·贾汗（Sarwat Jahan）是IMF战略与政策检查部的经济学家；克丽丝·帕帕耶奥尔尤（Chris Papageorgiou）是该部副处长。艾哈迈德·萨比尔·马哈茂德（Ahmed Saber Mahmud）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经济学副主任。



#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传奇

艾德·康威

布雷顿森林会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战役——闭门密战

利特尔与布朗出版社，伦敦，2014年，863页，29.95美元（精装）。

本书讲述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作者生动地刻画了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山中一家偏僻饭店入住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与会者。在晴好的夏日，饭店里一派丰饶，还有数不清的美酒，这对经历了近五年战争的与会者们来说是久违的景象。本书中的两位重量级人物，一位是来自英国的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虽才华横溢，但个性古怪，当时他的健康状况欠佳，这大大影响了他的权威，在他身边照顾他的是妻子莉迪亚·洛普科娃（Lydia Lopokova），她曾经是非传统芭蕾舞团的首席女演员；以及来自美国财政部的哈里·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他是一位意志坚定的国际经济学家，依靠自己的奋斗白手起家，他精力旺盛，干劲十足，还曾与前苏联情报局打过交道。他们面临的挑战是达成一致的货币制度，这个制度应能消除经济局势的不稳定和大规模失业带来的祸患。尽管论题复杂，起草会议一片混乱，他们仍然达成了一项协议，这项协议至今仍然是国际合作的代名词。虽然凯恩斯对这一结果表示失望，怀特也对部分主要功能提出了质疑，但无论如何，这一结果创造并资助了两个机构，70年来这两个机构一直将自身植根于国际经济合作的中心位置。



本书作者是天空新闻台的经济学编辑艾德·康威（Ed Conway）。他以热情生动的文笔为我们再现了这个伟大的故事。本书参考了各位与会者的回忆录，并从世界各地档案馆搜集了引人入胜的趣事。若本书侧重布雷顿森林会议中人物的戏剧性事件，读者也可以了解到存亡攸关的重大问题的背景情况，以及这些问题对与会者的重大意义和协议的后续进展状况。

康威突出了谈判代表所承受的压力，分别来自别有用心国内政治家，他们对会议涉及的问题尚未完全掌握，以及处心积虑想要独占赚钱方法的金融部门。后来两份协议得到批准，由此创建了IMF和世界银行，鉴于其他机构（如国际贸易组织）的命运，这一结果似乎更加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讨论的主要国际经济和货币合作问题在今天的政策制定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财政盈余和财政赤字国家是否应该共同承担调整的重担？确保汇率稳定的同时不会导致制度过于死板，也不会带来无法承受的调整负担的最佳方法是什么？国内经济政策应享有多大的自主权，资本流动应享有何等程度的自由？如何管理一个国家难以继之的巨额债务？康威对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的饭店中与与会者对这些问题的处理进行了生动的叙述，为当前危机中的问题提供了敏锐深刻的见解。

布雷顿森林会议通过谈判达成

的协议条款中对IMF使命的表述非常复杂，晦涩难懂。考虑到混乱的谈判局面，这并不令人意外。凯恩斯抱怨美国的协议草案看起来像是用彻罗基语书写的，但怀特及其代表团却坚持协议维持原样。他们在法律传统方面有更丰富的经验，其基本文本可理解为让这些条款适用于起草人认知之外的情况。结果就是它为IMF提供了适应及响应不断变化的世界经济需求所需的灵活性。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规则设计是模糊的。精明的起草人认识到只有其他国家准备对规则的违反者进行制裁，规则才有可能持续下去——而当违反者是强大的财政盈余国家时，其他国家则几乎不对其进行制裁。如规则制定得更加具体，第一项挑战就足以使协议破裂。实际上，规则的执行情况并不严格，还相应产生了规避不便规则的方法。

布雷顿森林会议设计的货币制度直到上世纪50年代末才开始实际执行，1971—1973年逐渐被废除。但这段时期是国际经济史上相对比较繁荣和稳定的一个时期。我们很难弄清楚地将多少功劳归于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协议的具体规则，将多少功劳归于其他因素（如，战后恢复，或美国的需求冲动及其提供所需流动性的意愿），但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和金融市场迅速增长的压力破坏了这项制度，国际货币制度的潜在改革者仍在继续呼吁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如果国际货币制度规则的持续如此短暂，那么在新罕布什尔州这几周中实现的主要成就究竟是什么？

答案是以推进国际金融合作和经济发展为使命的两个机构的创建和出资。它们在推动共同目标方面的有效性已经验证了凯恩斯、怀特及其同行70年前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提出的设想和决策。

马克·艾伦  
(Mark Allen)

前任中欧及东欧高级区域常驻代表、  
前任IMF政策、发展与检查部主任



## IMF 内部探究

里亚克特·艾哈迈德  
**金钱与严厉的爱**

IMF 纪行

Visual Editions, 伦敦, 2014年, 208页,  
 40.00美元(平装)。

在《金钱与严厉的爱》一书中，里亚克特·艾哈迈德(Liaquat Ahamed)描述了IMF经济学家及其国际团队的职业生涯，同时也讲述了该组织的成立与发展简史。要了解这些幕后信息并非易事，因为IMF工作的敏感性使得该组织非常谨慎。

本书通过分析IMF基层员工的日常活动和文化，使该组织及其工作任务为人所理解和接受。艾哈迈德并没有对整日泡在棋盘数据表中的政策专家的工作夸大其辞，他只是交待了IMF的工作人员是如何默

默地为重要全球公共商品的创造贡献着力量。

在揭开这个座落在华盛顿19大街上的神秘机构的面纱时，艾哈迈德避开对金融危机的压抑的纪实性叙述和对高级管理层谄媚奉承的描述。作为一个局外人，他幸运地避免了人为的再现型对话和那种为身经百战的英雄所做的回忆录式的虚假的无所不知。与其说他的书是《压力测试》(Stress Test)的再现，不如说该书是宏观经济领域的《萨摩亚人的成年》(Coming of Age in Samoa)。

艾哈迈德曾多次访问IMF总部并于2012年年末参与了其员工的工作行程，他的课题非常具有时效性。2007年，认为金融危机已接近尾声的各方认为IMF已经落后于时代，将它视为一个毫无作用的机构，但在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后，IMF再次返回世界舞台的中心。自那以后，在IMF成立70周年这一年，它几乎每天都能登上新闻头条。

曝光度的增加并未能增进人们对IMF工作的理解。而艾哈迈德的著作有助于弥补这一差距。

这本专著以IMF活动的四个方面为中心：华盛顿总部的日常生活；2012年10月在东京举办的IMF——世界银行年度会议的强大影响力；2012年10月的爱尔兰“任务”，或者说是员工访问，爱尔兰是近年来从IMF借贷的少数“发达”经济体之一；2012年11月的莫桑比克任务，莫桑比克是IMF连续借贷国，是严重依靠援助的贫困国家。这些事件为艾哈迈德提供了一个平

## 学习以求成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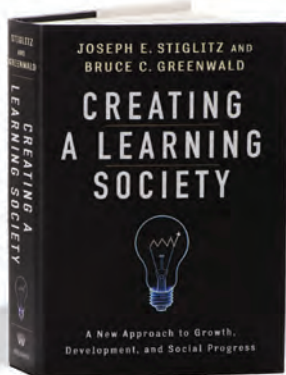
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

布鲁斯·C. 格林沃尔德

**创建学习型社会**

经济增长、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新途径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纽约, 2014年,  
 680页, 34.95美元(精装)。



他们靠近并扩大了这一边界，虽然有人会认为在企业和经济依靠学习实现增长的世界中，边界的限定存在着弊端。本书最起码以全新的视角阐述了政府在刺激经济增长和福利中的作用。知识是一种公共产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中，缺少政府的干预将会出现知识供应不足的局面。然而，政府干预到什么程度才能带来大量的知识，这一点尚不明确。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和布鲁斯·格林沃尔德(Bruce Greenwald)认为，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观点——垄断产生创新——并非在任何环境下都是正确的，不过他们承认其对立观点——竞争对于创新具有更大的激励作用——也有道理，但也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竞争条件下的企业规模相对较小，因此承担固定创新成本的能力较弱。本书为激励国内企业创新和学习并将知识保留在国内的产业政

成功与不成功经济体的标准是能让企业、部门及最终整个经济实现其真正潜力的学习过程。

学习决定经济成功的观点与文献中的多个观点联系在一起，并对其他观点提出了质疑。对基于生产因素相对优势的标准概念(在资本流动的世界里)是否仍具意义的质疑充实了界限模糊的“动态比较优势”。作者提出，大多数企业都被困在生产可能性的边界内；学习让

这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其最初设想是做成一部纪念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 间接提及鲍勃·索罗[Bob Solow])的演讲集，而最终它将阿罗“边做边学”的经典文章和索罗的经济增长模型相结合。本书提出技术变革是学习的过程，以及企业成长和国家发展是通过三种学习方式——发明、创新(使发明适用于生产过程)和“学习方法的学习”。作者认为，区分



台，详细阐述了IMF员工活动的广泛工作范围及其与全球经济的联系。

艾哈迈德既表现了IMF工作的单调乏味，也呈现出只有多数IMF成员才会体会的坚定的使命感，即便在承认这些工作让他感到厌烦时。在他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IMF的专家们仔细琢磨全球经济细节，因此其他人无需再做这样的工作。

## 艾哈迈德以一个局内人的视角讲述

有可能的话，艾哈迈德可以赋予IMF员工更丰富的色彩——单调、一成不变的黑色西装领带以外的色彩。我希望看到更多的故事和人物，他们使IMF成为富有质感的工作环境：比如，IMF的桑地诺出纳员在小酒馆中发表他的市场建议；芬兰事务主管酒量奇大，超

越了历任前苏联财政部长；伊朗执行董事声援扩大同性夫妇的婚姻福利，远远早于IMF的其他多数成员国。

艾哈迈德指出IMF员工共代表了150个国家，但除护照上的基本信息外，他似乎并未深入扩展他的多元化观念。众多少数群体生活的改善记录了机构本身的发展进程，并把一些精辟的见解转化为IMF的机构文化，其中不乏一些悲喜交加的故事。

与此同时，艾哈迈德认为IMF员工体现了全球范围内的合众为一：训练有素、所见略同。但他没有解释其中的原因：他们读相同的研究生院，听同一批教授的课，写相同主题的论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思维方式是相同的，但确实意味着他们使用的是同一种职业语言，并且对待复杂问题能够深入挖掘。

这种同一性在外交上的体现就是它不可思议地激发了IMF黑色玻

璃门背后的辩论。一般内部审查会以“基金组织三明治”的形式进行：强调研究论文的精彩文笔；进而不断驳倒所提出的每一个有实质意义的观点；最后以对所采用的计量经济技术工具的赞美而结束。IMF与世界银行一类的其他机构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政策上的血腥争斗都在其办公大楼内进行：一旦争论结束后，员工即结成统一战线面对世人。

这个原则意味着在众多家银行中，只有一家金融机构已成为全球经济的核心，它被简称为“基金”。在《金钱和严厉的爱》一书中，艾哈迈德以一个局内人的视角讲述了IMF员工如何创造了超越其2500名员工总和的巨大成就。

布雷特·豪斯  
(Brett House)

国际治理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  
作家、麦吉尔大学珍妮·索韦基金会  
高级研究员、  
IMF前工作人员

策提供了有力的事实依据。但是书中提出的产业政策类型与最近复苏的“挑选赢家”（尤指建立在相对优势基础上的赢家）的实践有很大不同。

这些观点与其他相对复杂的观点均以一种直观、系统的方式呈现出来。有时，采用简单的模型（在阿罗—索罗惯例中）会让直觉更加敏锐、结论更加清晰。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是用于向经济学者（但不一定是专家和读者）展示新的观点的模型。第一部分从学习的重要性开始，描述了企业的学习方式，呈现了市场结构问题，最后是福利及对整个经济的思考。第二部分对更为复杂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包括封闭经济环境下的学习、长期动态，但仍然以直觉和简单模型为基础。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是在指导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使用专业工具解决我们这个时代最引人注目的问题：如何帮助

社会实现可持续增长。斯蒂格利茨和格林沃尔德对于此课题的热忱极具感染力。

但是，第三部分“学习型社会的政策”有些令人失望，部分原因是它缺乏前两部分的严密性和直观性。这部分开始长篇累牍对“华盛顿共识”和全面贸易自由化的批判。无论这是不是偷换概念，这些评论没有从作者的“学习型社会理论”中揭示出任何政策影响。本书的前两部分为政府干预高级远程学习提供了可靠的理由。难点在于如何对这些干预方式进行设计，其干预方式不会出现以往干预尝试中出现的各种政府失灵（如上世纪90年代前非洲误入歧途的产业政策）。斯蒂格利茨和格林沃尔德在他们简短的政治经济章节中提到了这个难题，但并未提供任何指导性意见（除了一句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视国情而定”）。然而，这正是政策制定者，尤其是那些被出于好意但最终具有

破坏性的政策建议所累的政策制定者提出的问题。这也是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在他最初演讲的讨论者评价中提出的难题，在演讲中，他提问产业政策的论点是否是比强大的政治经济反论点更“有力度”，并最终提出理性建议：“先试行，并在确保实际证明政策无效时能够停止干预”。

这本书非常强大，写得很精彩。对于本书政策章节的失望并不是一种批评。更确切地说，它是对后续著作的邀请，一本正面应对学习型社会的政策设计和实施及其背后的政治动机的著作。”

尚塔亚纳恩·德瓦拉贾  
(Shantayanan Devarajan)  
世界银行中东和北非地区  
首席经济学家



## 金融与发展

# 剖析 50 年来 全球经济情况

《金融与发展》杂志自 1964 年以来为您提供有关国际金融体系、货币政策以及经济发展的深入研究和分析。由于世界经济仍在不断变化,《金融与发展》还将继续帮您进行分析。



- 查看《金融与发展》往期内容, 请登陆 [elibrary.imf.org/fd50](http://elibrary.imf.org/fd50)
- 查看《金融与发展》最新内容, 请登陆 [www.imf.org/FandD](http://www.imf.org/FandD)



Finance & Development, September 2014 \$8.00



MFICA2014003